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历史教学的艺术与技巧



历史教学的艺术与技巧

第一章 一个人类古老而闪烁时代光辉的课题——历史教育

第一节 历史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一、人类最早的历史教育

远古时代，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曾经历过漫长的无文字的时代。但是，我们却仍然能够窥见其时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即是当时的历史大概。这一方面是由于考古工作者陆续地发掘出了那时一些人类生活的遗址、村落、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是由于从那时候起，人们将自己的奋斗事迹一代一代地以口头的方式传将下来，一旦有了文字便将其加以记述，成了我们常说的“远古传说”。这些传说固然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后人的意识、想象成份，但是，它们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勾勒出那个时代我们祖辈的生活情景。

从文献记载的远古传说中，可以看出其很大的部分是在描述当时一些受到人们敬仰的英雄们的事迹。有的是在向自然界斗争中建功立业的英雄，如中国古代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补天”、“造人”的女娲，“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与日逐走”的夸父，“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的精卫，“上射十日而下杀猼狵”的后羿，以及《韩非子·五蠹》中所记载的发明“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发明“钻燧取火”的燧人氏，等等。有的则是在处理部落内部事务或在部落与部落之间战争中出现的英雄，如中国古代关于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的传说；西方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关于希腊的英雄人物阿溪里和奥德赛的传说等。

远古时代的人们为什么要记忆并且世代地传颂这些英雄们的业绩呢？很明显地是要后代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处理与自然斗争和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不屈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性、聪明才智，供后人效仿以为楷模。中国古代儒家便有“法先王”的说法和教诲。这里，我们应该说它已经包含了历史教育的最早萌芽。

至于，那时候的人们直接地拿历史来教育群众的情景、场面，在文献记载和其它诸如民族调查中也是不乏其例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里就记录了美洲易洛魁人的一种古老仪式。他们每遇新的首领授职或什么哀悼的会议上，都由一位专门司巫职的首领用一种由紫色和白色贝珠串成的带子，把上边各种图案所包含的本部落的历史向与会部落成员讲述一遍。显然，这种场面和情景就是易洛魁人进行历史教育的一种活动，那位专司巫职的首领便是执行教育的“老师”，而那个珠贝串成的带便成了本部落进行历史教育的特殊教材。在中国，这种情形同样地可以从《诗经》中得到清晰的反映。

参见徐整的《三五历纪》。

参见《淮南子·览冥训》和《太平御览》卷78引《风俗通》。

参见《淮南子·天文训》。

参见《山海经·海外北经》。

参见《山海经·北山经》。

参见《淮南子·本经训》。

《诗经》中“颂”的部分大多是商、周时代举行重大典礼和祭祀祖先时的舞乐歌辞，其中历史内容占据了最大的成份。《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句的意思是说，传说商族部落的祖先契是因其母简狄吞食玄鸟（燕子）的卵而降生的，这是上天的安排。契后来便在殷这块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居住下来，一代一代地繁衍了商族。后来，传到了成汤时，受天帝之命，不仅灭掉夏而且把商的疆域大大地扩展及于四方。这里十分概括地讲述了一部先商的历史。《诗经》中“雅”的部分，特别是“大雅”，大多是当时贵族们宴饮聚会的舞乐歌辞。这里也不乏关于祖先业绩的讴歌。《诗经·大雅·生民》即讲述了周族部落始祖后稷的出生：“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礼克把，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段把姜嫄如何履了上帝的足迹而怀孕生下后稷的传说，很形象地作了描绘。同篇和《大雅·公刘》、《大雅·绵》等篇中还具体地叙述了“后稷之穡，有相之道”，他如何地务农有方和公刘带领周族迁于泾水中游的豳，在那里大力发展农业、营建居邑，使得“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周本纪》），以及古公亶父为避戎狄侵扰毅然地放弃豳地，率领周族来到岐山之下膏壤沃土的周原，为周族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这里，同样地勾勒出了一部先周的发展史。

重大的典礼和祭祀祖先也好，贵族们彼此聚会酬答也好，那时候的人们始终是把讲述先人的英雄业绩、本族的光荣历史放到了一定的重要位置，并且用这些来鼓舞人们、教育人们。我们看，在这些特定场合中，古人的历史教育活动，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由以上的史实中不难看出，当世界上有了人类，便开始有了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实践活动，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教育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

二、历史教育的发展、兴旺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从此人们结束了“结绳记事”或口口相传的原始状态，进而发展到以文字为媒介和交流工具的崭新时期。在这以后，人们便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随时随地地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对于后人来说无疑地便是历史了！也正是在此时，史书亦产生出来，并且日益得到发展，成为向当时人或后人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工具。

我国最早的史书，据文献记载主要有两种体裁。《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又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当时，史书一种是记言体，最早的是《尚书》；一种是记事体，最早的是《春秋》。就这两种史书的目的而言，一是为了让“古之工者”即统治者谨慎自己的言行，一是为了向广大的群众“昭法式”，即彰明、树立“王者”的榜样，以让世人仿效。这里，显然都明确地揭示出了它的历史教育作用。直到春秋时期，人们仍然牢记着这些史书巨大的历史教育功能。《国语·楚语》记载，楚国的大夫申叔时向楚庄王讲述如何教育太子时，就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孔子教育弟子的“六艺”就有《尚书》和《春秋》。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尚书》）”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后来，史书的体裁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编年体的《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体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和典制体的《通典》等，此外，还有会要体、学案体、纲鉴体、图表体等等。在我国，史书的数量、卷数之多，也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仅被清代乾隆定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有3229卷，约4500余万字；《资治通鉴》有294卷、《明实录》为2909卷、《清实录》为4355卷；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所收入的图书竟达79070卷。史书编撰的繁荣，同时也就带来了我国历史教育的兴旺发达。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还逐渐地形成了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编写不同层次史书，借以更有针对性地施教的情况。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明确地是供帝王们阅读的。在《进资治通鉴表》里，他说：臣“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他还说：“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很清楚，在司马光看来，帝王们是需要了解历史的，然后从中可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资于治道，但是，由于帝王们“日有万机”，政事繁忙，无暇周览自《史记》、《汉书》以来“文字繁多”的浩瀚史书，于是乎便专门地“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他们编写了该书。梁启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治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

反之，清人吴乘权等撰的《纲鉴易知录》，则是根据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摘要删繁，编成的一部从传说中的盘古到明末的史书。因其内容简要，故名《易知录》。这部史书明确地是为青少年学习历史入门使用的，照吴乘权自己说，编写该书就是为了“以课童子”。很显然，无论从历史教育的对象或是其层次高低来看，《纲鉴易知录》与《资治通鉴》都是不同的。

童蒙教育一向受到我国古代人们的重视，因此一批异彩纷呈的蒙学教材便也应运而生了。这些教材有的是综合性的，兼收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和道德伦理的说教、熏陶，有的则是专门性的，以某一个方面的专门知识为其内容。综合性的童蒙教材，里边往往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字经》和《千字文》即是如此。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王应麟最早编撰的，后来不断有人为之增补，直至民国初年。王应麟，淳祐年间的进士，历任南宋政府的西安主簿、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郎、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尚书兼给事中等官职，是个非常博学的学者。在《三字经》里，关于历史教育的内容，大致

《礼记·经解》。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的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年伦敦版，第1卷，第2页。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有两类。一类是把历史知识与品性教育融汇在一起的，如，书中写的“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孟子的母亲），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昔仲尼（孔子），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赵普），读鲁论（《论语》），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指汉代的温舒编蒲草抄书和公孙弘削竹简抄书）。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指东汉时孙敬吊起头发和战国时苏秦用锥刺腿刻苦学习的事）。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指晋朝人车胤用萤火虫光照映读书和孙康借屋外雪光看书）。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指朱买臣边砍柴边读书和李密骑牛走路时仍在牛角上挂着书本）。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指宋代的梁灏82岁时考中进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指南朝的祖莹8岁作诗和唐朝的李泌7岁时写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韞，能咏诗（蔡文姬，东汉人；谢道韞，东晋人，都是才女）；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指唐朝的刘晏7岁时即考中“神童科”，做了官）；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等即是。这里讲的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写出他们品德上的一个故事，既给了儿童历史知识，又经过画龙点睛的评议，潜移默化地向儿童进行了教育、熏陶。

另一类则是专门讲授历史发展进程的。民国初年增订本的《三字经》，就很系统地把我国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做了简要的勾勒。书中写道：“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伐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国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九十载，国祚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奄肆，寇如林，李闯叛，神器焚。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开海禁，交互市。继粤匪，创天理，民遭殃，如汤沸。有良弼，国再造，靖寇氛，疆土保。同光后，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传九帝，满业没。革命兴，意气雄，废帝制，效大同，立宪法，政共和。愿同胞，勿操戈。古今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自。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这里，仅仅用了500字左右，就象是写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小纲鉴”。毋庸置疑，在其字里行间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诬蔑，但是，必须肯定，它既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有读史方法的启迪，又押韵上口，便于记忆，无疑地是非常适合于当时儿童历史教育的教科书。

《千字文》系由南朝梁武帝时（约公元6世纪初）的周兴嗣编写而成；全书都用四言韵语，总共1000个字，亦是旧中国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部影

响很大的童蒙教材。书中涉及到的历史知识颇多。如，书中讲了我国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以及后世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龙师指伏羲氏，火帝指神农氏，鸟官指少昊氏，人皇亦为传说中的古‘帝王’），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指舜和尧禅让）。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指周武王姬发和成汤建国）。”“磻溪伊尹，佐时阿衡（指在磻溪垂钓的吕尚和伊尹，他们曾分别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和成汤）。奄宅曲阜，微旦（指周公旦）孰营？桓公匡合，济弱扶倾（指齐桓公称霸诸侯）。绮回汉惠，说感武丁（指绮里季帮助汉惠帝保住太子位和傅说辅助商王武丁中兴）。”“晋楚更霸（指晋文公、楚庄王相继称霸），赵魏困横（受困于连横）。伪途灭虢，践土会盟。何（指萧何）遵约法，韩（指韩非）弊烦刑。起翦颇牧（指吴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指秦始皇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在这里，也像《三字经》一样，既讲了历史知识，简单地勾画了自远古到秦王朝建立的历史，又寓教于史，在讴歌一些历史人物的同时，渗透进了儒家的忠君、仁爱，建功立业的伦理教育。《千字文》还很注意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特点。书中先后提到的有“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嵇琴阮啸”；“恬笔伦纸，钩巧任钧。释纷利俗，并皆佳妙”等等。既有思想家孟子、嵇康、阮籍，史学家史鱼，也有科学家蒙恬、蔡伦乃至发明翻车的马钧；书中肯定他们或是给人以有益的教诲，或是便利了群众的生活。显然，这里也是意在教育儿童要学习这些古人，利国利民。

专门性的一些童蒙教材有的就是专讲中国历史的，如，北宋玉今撰的《十七史蒙求》等。这些书的历史教育目的和实际作用，更是再明显不过了。

在西方，历史教育的发展、繁盛，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史书的大量编纂而同步进行的。

古希腊被人们誉为“历史之父”，同时也是欧洲第一位大史学家的希罗多德，生活在约公元前484—前425年。他编写的《历史》（亦称《希波战争史》）一书影响很大。究其编写目的，即是要向世人施以历史教育。他从因果报应、宿命论的角度，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要告诫人们，像一些专横的帝王如克洛苏斯、大流士、薛西斯等，都是以兵败身死而告终，但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人，却永远受到了大家的尊敬、怀念，正是通过这些，希罗多德借以奖善贬恶，让后人知所取舍，从历史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另一位古希腊的大史学家修昔底德，约生活于公元前460—前400年，著名的史著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书中更少有迷信的色彩，教育人们不要把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自然界的现象，看作是什么人间吉凶的征兆；甚至，他引导人们看待历史发展要注意经济因素，说：“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在自述中，曾经明确地表示，他写的史书不求以词章见重于一时，而是要垂鉴于后世，着眼于对于孙万代的历史教育。

古代罗马的史书著述不但十分丰富，而且往往更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历史教育目的。还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的波里比阿，写过一部40卷的《通史》。他在书中就十分注重历史的因果关系，指明对人的教育作用，应该是历史的价值所在。著名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在其写的《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中明确地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

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他的整部书中，都贯穿了追述罗马建国的艰辛和对以往罗马历史辉煌的讴歌，其目的即在于要唤起罗马人的爱国热情。另一位同样属于罗马帝国时期大史学家的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曾编写有《年代记》（或称《编年史》）、《历史》和《日耳曼尼亚志》等多部史著。在其史书中，着力点却是要暴露罗马专制政体的黑暗，因而对于后世反抗罗马专制斗争的影响颇大。他曾阐明自己编写史书的宗旨，说：“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在世界中古时代，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历史学及历史教育亦然，它们也成了神学的“科目”和工具、手段。如，当时，世俗的史书倍受压制，不是束诸高阁，就是被付之一炬，与之相反，所谓的“基督教史学”则受到了青睐。基督教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公然地说：一部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恶魔“撒旦”的信徒之间的斗争史。“上帝”的信徒要建立人间天堂，“撒旦”的信徒则是要把人间变为地狱。一切世俗的国家都是罪孽深重的，只有基督教会才能带来和平与幸福，要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的“上帝”之国。这些当然是非常荒诞的！

但是，即便如此，它们要用历史教育人们的目的还是十分明白的。尽管这种“教育”已是被歪曲了的和不科学的。圣·奥古斯丁力图通过他所写的史著，向人们证实，应该拥戴教会，使教会的权力高于一切世俗的权力；教会应该统治全世界。

14、15世纪，在西欧的封建社会母体里，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少数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而后是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逐渐地成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也悄然兴起了。史学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起到了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思想、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普遍地反对基督教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应当是“人世”的历史而不应该是什么“天国”的历史，把以神为中心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变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历史。他们纂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拥护新兴的资本主义，并为其蓬勃发展寻取历史的营养、教益。如，生活在1469—1527年，被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时代“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军事著作家”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潜心研究了李维的《罗马史》，并写成《论李维》一书。在书中，他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事，一一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的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年伦敦版，第1卷，第2页。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塔西佗全集》，丘奇与勃罗德里布的英译本，1942年纽约版，第137页。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

地与当时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现实情况加以比较。他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在古代罗马的历史中受到启发，进行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他在另一部史著《佛罗伦萨史》中，还把古罗马与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作了对比，希望人们能够从中找到像古罗马那样，由佛罗伦萨统一意大利，建立起一个强大国家的道路。《论君主》（一译《霸术》）是他的又一部史学名著。这是马基雅弗利专门写给君主们读的，和前述我国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很相似，是给君主们提供历史教育的“教科书”。书中着重地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等。“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君主论》风靡一时，但在五十年代末被列为禁书，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进而风靡世界，四百多年来，《君主论》在西方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君主论》被西方国家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还撰有《改变世界的书》的小册子，而《君主论》即其中之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近代的历史教育。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进程。尔后，列强纷至，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一个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亡国灭种”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通过一切方式，展开了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一方面是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将士拒侮抗敌、血洒疆场，广大的中国人民掀起一次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则是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地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理和道路，千方百计地要使祖国摆脱掉灾难、屈辱，走上富强的道路。他们著书立说，翻译、介绍国外的新学说、新书籍，出版报刊，大力地传播先进思想，进行宣传教育，旨在对人们振聋发聩。在这其中，史学革命和历史教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1902年时，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好。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攸攸万事，惟此为大。”虽然，他在这里对历史教育的作用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的先进人士为了救国图强，对于历史教育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正像马克思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明显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目的十分明确，“经世致用”；为民主革命，用历史教育民众。近代前夕，统治着我国史学领域的是“乾嘉学派”。这个学派导源于明

引自姜义华等着《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末清初的顾炎武，而盛行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他们继承我国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加以条理发明，研究的重点在于整理古籍和考究史料。虽然，这个学派开始时也以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进而达到“明道救世”作为自己的目的，但是，后来实际上却陷入了故纸堆中，从“经世”转入“避世”，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现实的一切斗争。

早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衰，给了中国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先进的人们开始抛弃烦琐考据的乾嘉学风，转而使其研究与著述能够“经世致用”，以图有补于挽救已经出现了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在这些人中，魏源是佼佼者之一。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1794—1857年）就已经厌烦了那种支离破碎，专“以考博为事”的乾嘉学风，斥责其“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出于无用之一途”。他认为史学犹如“药物”，应该“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能够医治社会的弊端。道光六年（1826年），魏源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即是他这个思想的具体体现。该书专选道光以前凡于治政之道、国计民生有益的经世论文，分成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部，编辑成书，旨在使一些历史资料，转化成为当时的“治术”，发挥历史的经验、借鉴作用，以教育当世。鸦片战争后，魏源先后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重要的史著，使他的经世致用宗旨在史学和历史教育中有了更新、更高的体现、贯彻。

《圣武记》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书中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历述有关清朝建国、平定三藩、戡定回疆、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处理蒙古、西藏事宜等史实，并且从中总结了清朝的兴衰原因，建议应采取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驭夷之略等项重大措施。光绪四年（1878年）申报馆排印时，又增补了他所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该书专一地记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其中揭露了道光帝的昏聩、琦善和耆英的腐败无能及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丑态，对于广东三元里及沿海沿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行了颂扬。《圣武记》的写作用意十分清楚，是在通过清王朝的盛衰，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强弱对比，给人以历史启迪，要求国人振奋精神，使中国国富兵强，称雄于世界；并从中求得当前御夷、反对外来侵略的良策。在书中，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把外国之长技变为中国之长技的警世主张。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的嘱托而写的一部世界史地名著。它最早刊行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到咸丰二年（1852年）又增补为一百卷。书中利用了林则徐所编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并采集了历代史志和明以来岛志中的资料，编撰而成。它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尤其详于英国本上及其作为侵略中国基地的印度、新加坡等的情况。书中也讲了西方国家船舰、枪炮、蒸汽机、火车、银行等知识及东方民族和美国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经验。《海国图志》继《圣武记》中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很显然，魏源这部史地著述的目的就是要以世界历史的知识教育当时的中国人，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寻出解救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道路。

《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魏源集·明代食兵工政录叙》。

与魏源同一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的著名史书，还有夏燮（1800—1875年）撰的《中西纪事》、何秋涛（1824—1862年）撰的《朔方备乘》和姚莹撰的《康纪行》等，它们都和魏源的著述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旨在用历史呼唤国人，反抗侵略，御侮图强。如，《中西纪事》记述了列强侵略我国而发动的两次鸦片斗争的史事，对于英、美、法、俄等国家的侵略罪行，进行了揭露；给清政府的一些投降派以无情谴责，同时，也歌颂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朔方备乘》所述为有关我国蒙古、新疆和中亚、东欧等地区的大事；在其卷首列有“圣洲”、“圣藻”和“圣武述略”等，用心在以唐、元和清朝初年的功业激励清政府，反对侵略，抵御外侮。书中特别注意中俄关系问题，寓意颇深。《康辅纪行》是作者数次赴西藏的见闻杂记。书中除了记述我国西藏的史地外，还涉及到了英、俄和印度等国的情况，敏锐地指出，英国阴谋侵略西藏，提醒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到了上世纪末，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及继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更是大大地加深了一步。戊戌变法运动即是在这个时候掀起的一场力图挽救祖国危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的志士们是怎样比以往更加“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甚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很好的例子便是，这时候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假托孔子改制，用孔子的旗号、学说，宣传变法思想，以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他还注重世界历史，用世界各国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事件，教育维新派，为光绪帝寻求维新变法的经验、教训。康有力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为此，他在变法期间亲自撰写了《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日本书目志》等有关世界历史的书著。其中，康有为尤着力于对与中国相近、也有相似情况的日本历史的研究。《日本变政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定稿并进呈光绪皇帝。这部编年体史书，记述了日本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1868—1890年）期间的维新变革过程，对于日本当时的议会、宪法、官制、选举等方面的改革尤详。康有为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时，条理虽多，但其要点则为“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纾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等等。这些对于在“百日维新”中光绪帝所颁的上谕，有极大的影响。《日本书目志》以《汉书·艺文志》的形式，把康有为早年收集的大量日本人著译的介绍西方和有关明治维新的书籍，编为简目，并对每书撰写了提要。它是与《日本变政考》相辅相成、彼此配合的一部了解日本近代史的目录书。

在维新变法酝酿时期，类似的史学名著还有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法国志略》以纪事本末的体裁，搜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法国历史的资料如日本冈千仞著的《法兰西史》，日本监辅著的《万国史记》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等和报刊有关资料，编撰而成。书中记述了法国开国纪元、王朝递嬗、路易十八复位、新建议院、法英姻盟和战、法英助土攻俄、法奥战和始末，以及关于法国的疆域、首都巴黎、

郡邑、藩属等等史事、情况，目的是让国人以法国的强盛道路为鉴，求得自身的富强之道。《日本国志》是一部典制体的日本史，除简略地介绍了日本的古代史外，重点在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历史情况。它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值戊戌变法前夕；书中详细地征引日本原始资料，包括维新以来的政令、图表、条例等，其目的十分清楚，“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正因如此，此书一出对当时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梁启超还写了一篇《波兰灭亡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载于《时务报》上。该文专述波兰两次被瓜分灭亡的历史，旨从反面教训告诫清朝政府，如不变法图强，便会灭亡。该文对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才是解救中国危亡的良药。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而起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革命派人士更是十分注意利用历史这一得力的手段和工具，展开思想宣传活动。

章太炎（1869—1936年）是当时最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之一。他在1903年5月27日于上海《苏报》上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轰动中国，在革命派中一时广为传诵。在这篇驳斥康有力反对革命，强调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的奇文里，章太炎大量地征引了中外历史上的事实，作为自己立论的有力证据。他用清朝历史上经济剥削、掠夺，政治上行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等史实，说明其残酷乃“万国所未有”，必须将其推翻，中国方能进步、振兴。他针对康有为说的“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因而不能革命的谬说，征引西欧和日本的历史，论述了“流血”并非只是革命才有，改良和行立宪照样要有。“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乾劲弯飞丸发变也？……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他还引述了中国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史实为例，说明只有革命才可以启迪民智，驳斥了康有为所谓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不可以进行革命的荒谬言论。他说：李自成开始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于是革命的思想、口号便也毅然地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章太炎曾经计划过以革命的“新思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约之百卷”，目的是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其欲以历史启迪、教育民众的用心是良苦的！

为了使革命思想能够深入民众，这一时期，革命派很注意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尽力地使历史教育通俗化、大众化。这应该是当时历史教育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1875—1905年）做得最为突出。他在《猛回头》一书中，用十分浅显易懂的文字和唱词形式，列举出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事实，教育人民必须起来推翻清朝政府，进行革命，同时也要铲除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奴役和掠夺。如，书中警告人们说：如不进行革命，使国家自立自强，“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该书一经刊印，影响颇大，可以想见，其中所讲印度、波兰、

非洲、南洋等国家、地区的近代悲惨历史，对于我国人民的迅速警醒，当是多么的切肤和贴近！

此时，革命派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投身于革命运动，在历史教育中于详今略古外，尤其注重于有关革命史的教育。其中陈天华写有《中国革命史论》。从现存的该书《绪论》和《秦末之革命》两篇看，该书极力地歌颂、赞美了中国的秦末农民战争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中外历史事实论证中国的前途必是国民革命。马君武编译的《法兰西近世史》影响亦很大。该书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分为六个部分，介绍了近代以来法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意在教育人民从法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各方面的进步、发展，得到激励和启发，奋起革命，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此时，还有刘成禹撰写的《太平天国战史》。书中对这次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战事记之甚详，并且做了一定的总结，如指出太平天国在林凤翔、李开芳失败以后没有再继续派军北伐是一个严重的失策。作者的意图很清楚，希望用太平天国的失败为辛亥革命提供历史借鉴，包括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十分重视这部书著，专为其作序，并称它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十三年一代信史。”

第二，历史教育的视野极大地拓宽，内容大大地为之丰富。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史书著述和历史教育的内容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史的范围。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中外关系的史实或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述，但是，一是少得可怜；一是始终也未能够突破中国史的框架。基本上只是中国史教育的这个局面，一直没有根本的变化。应该说，这种情况是与人类古代社会各个国家、地区大体上都是独立发展的，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历史实际相符合的。

但是，从15世纪开始的西欧一些国家对新航路的开辟及随之而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广大地区、国家的殖民掠夺，整个世界的联系被大大加强了，从此，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要想使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近代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英国用炮舰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从此便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漩涡之中。这种客观情况，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猛醒。他们非常敏锐地看到，再像从前那样只了解中国，只从中国历史上“列祖列宗”们的功业中去汲取营养是远远不够了，必须“睁眼看世界”，或是出于“知己知彼”，先了解侵略者然后可以对付之；或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期望能够从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近代史中寻求医治中国沉疴的良药。当然，也有的是要从世界历史上遭受殖民者凌辱、奴役而致亡国濒于“灭种”的一些国家、民族那里，得到惨痛的教训，以激励国人，避免中国蹈其覆辙。这样，研究世界历史，把世界历史也做为历史教育的组成部分，便成为近代先进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现有的材料看，鸦片战争以后，有关世界历史的专著、译著，简直就象是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来，呈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最早注意世界历史的人，当推林则徐和魏源。前已述及，还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于广州禁烟时，即已命人将英国人慕瑞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中文，然后亲加润色，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简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

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等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充分地利用了《四洲志》，同时又参考其它的资料，撰成后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方唯一的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巨著。它不仅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接受世界历史教育，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影响及于日本。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使日本人扩大了视野，从中了解到西方各国的情况。尤其是在明治维新前后，人们从该书中获得了有关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等的知识，这对明治维新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后，一批各种各样的世界历史书著或译著即在中国相继问世、出版了。其中，著名的属于世界通史性质的有：清末上海作新社译自日文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世史》及《世界文明史》。它们都被收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作新社印行的《政法类典·历史之部》。这套译著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上起世界各文明古国的起源，下迄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及西方殖民主义者势力东侵，是一套贯通古今、较为完整的世界通史。其《世界文明史》则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分别讲了原始民族“非文明史”的时代、东洋文明、欧洲文明等，宗旨在于阐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变迁的轨迹，探究各个国家、民族文明发展的特征及兴衰原因。当时，还有以“万国史”冠名的世界通史，如《万国史纲》（日人元良勇次郎等著，邵希雍译，1903年出版），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世界的上古史（公元476年以前的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史）、中古史（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末）和近代史（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万国历史》（作新社编译，1902年印行），亦是把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旨在说明人类历史进化的道路，其中尤其以史实揭露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掠夺，并对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深一日的状况，深感忧虑。《万国史略》（作新社编译，1903年出版），分上古、中古、近世、现世四个时期，记述了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史事，文字简略，颇似一部世界史大事记。《万国通史》（英国李思与清末蔡尔康、徐草臣、曹曾涵合译，光绪末年印行），特点是分编分国叙述世界历史，如，续编专述英、法两国历史；三编专记德、俄两国历史等。《万国史记》为日人冈本监辅用汉文编著，成书于1879年。其书特点系分洲编纂，记述了世界各大洲内各国的历史与制度、地理、风俗及人情；书中于各国的政治利弊和国家兴亡十分重视，尽力地探究其因果规律。该书曾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较大。

属于国别史的书著和译著，较为重要的除了前边已经提及的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外，此时还有：沈敦和撰、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印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俄罗斯国志略》和《德意志国志略》四篇，叙述了欧洲这几个主要强国的历史、疆域、政治、军事、物产、风俗等诸多方面。梁廷楠著、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合省国说》，叙述了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时的美国历史，为中国人最早编写的美国史。《俄史辑译》，徐景罗译，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书。它从俄罗斯国家的兴起一直记述到清咸丰六年（1856年）时俄国的历史，是当时我国能够见到的较早较全的一部俄国史。《俄罗斯国纪要》，系林则徐在禁烟运动被革职后谪戍新疆伊犁时所辑，光绪十年（1884年）刊印。书中对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它向外扩张、侵略的历史，均有简略记述。从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对俄国侵略的

严重性，已有警觉，并深感忧虑。《德国合盟纪事本末》，徐建寅撰，光绪年间刊行。书中叙述了从莱茵联盟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有关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为中国较早的德国近代史。《日本源流考》，王先谦撰，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以编年体裁记述了日本自开国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 年）的历史。《日本地理志》，原为日人中村五六等编纂，王国维译，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出版。该书以日本的畿内、东海、东山等道为经，以叙其各道的地理、历史等情况为纬，编辑成书。书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颇有记述。

此外，一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专题史或重要人物传记，也在这时不断地出版问世了。其中，关于政治的，如《万国近政考略》，邹弢编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出版，其中有《沿革考》、《军政考》等部分，是一部有关近代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沿革的专史；书末还附有世界历史大事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译编，初载于《民报》，专一记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各次世界性的大会以及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派别的斗争，等等。《欧洲列国变法史》，法国赛那布原著，许士熊译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书中专记近代英、法、意、俄、德、葡、荷等欧洲国家的政体革新及政治得失。《欧洲族源流略》，王树楠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该书简述了欧洲一些古今民族的源起、种属、分支、分布、风俗及其迁徙兴亡情况，强调旧而愚的旧民族敌不过新而智的新民族，旧族只有复兴才能生存发展，提出中国必须努力自新，方可避免遭受列强的侵略瓜分等。关于军事的，如《欧洲列国战事本末》，王树楠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按照希腊、罗马、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俄国等国，记述其古今的主要战役，是当时一部罕见的世界战争史。在军事上，日本一直为那时的中国人所注意，沈敦和所撰《日本师船考》和姚文楨所撰《日本地理兵要》两书是其代表。前书光绪二十年（1894 年）出版，专一研究日本的海军情况，对日本战舰如“吉野”舰等的装备、马力、炮位、排水吨位等记述甚详，书中还附有日舰的照片。后书光绪十年（1884 年）刊行，以“道”为单位，重点介绍了日本的山川、港湾、岛屿、关卡要隘等军事地理方面的知识，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较为详细的日本历史地理尤其是军事地理的专书。关于世界名人传记，这一时期突出的有黎汝谦等译编、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华盛顿传》，林纾等译的《拿破仑本纪》（有清末京师学务处官书局校印本），此外，还有王树楠撰、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成书的《彼得兴俄记》（专记俄国彼得一世执政以后的事迹）和梁启超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出版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的生平事迹为主，兼及意大利资产阶级复兴运动的始末）。

必须说明，以上所列的只是从 1840 年以后到本世纪初（清末），我国关于世界历史研究、著述或译著、译编的一个大致情况，当时还有不少是以游记、类编等形式出版的世界史书著，此处不再赘记。仅此，我们亦不难看出，这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认识已经是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这一变化足以给中国人的历史教育注入完全崭新的内容；它确实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从历史教育的角度“睁眼看世界”上，是向前迈开了多么大的步伐。

第三，人们开始接受了新的史观，历史教育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

史观如何，一直是决定史学和历史教育质量、水平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古代的史学在史观上，也有过某些进步的表现。如《左传》中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天道远，人道迩”的近乎人、神并重，实则重于人的反天命、带有唯物成份的史观；《史记·货殖列传》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等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方面着眼分析历史问题的唯物主义因素，以及韩非把人类社会分作不断发展、进步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辩证观点，等等。但是，笼罩着整个我国古代史学的史观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静止、凝固的或循环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英雄尤其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观点。这里还包括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神化帝王的观点。

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使得中国民族危机日深，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史观；只有“变”才能够跟上世界潮流，才可以使图强救亡的思想被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掌握。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等人就已经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并且提出了变革中国的主张。龚自珍（1792—1841年）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衰世”，“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喑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如何改变这种局势呢？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变革的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于此时也大声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认为社会改革、人类进步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势日衰，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更加强烈了。它不仅表现在戊戌变法的实际运动中，而且在人们的历史观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化论的史观取代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史观和历史发展循环论的史观，成为近代中国史学和历史教育的主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深刻地指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八年。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高祖本纪》。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

《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魏源集·筹鹺篇》。

《魏源集·治篇五》。

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并加了29条按语，取名《天演论》。该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出版，阐发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将其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这部译著一出，便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持的理论基础，即是这种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直截了当地提出，“法何以变”？变法的道理何在呢？在于“天地之间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还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规律，分析中国社会，认为中国要想“保国”、“保教”，乃至“保种”，就必须变法。

前边提及的康有为所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鼓吹变法的著作，都是以历史进化论为其思想核心的。他在该类书中，根据东汉何休注《公羊传》阐发的所谓人类社会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把它与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推演出了人类社会进化须经“君主立宪”阶段的道理。康有为在《论语注》一书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很显然，康有为所要持的是历史进化论，所不同的是他巧妙地给进化论穿上了一件古老的中国圣人的外衣，而且是在19世纪末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维新变法的新剧。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在中国宣布破产。一场以推翻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在史学领域里，与之相适应的则是，“民史”观点逐渐地取代传统的“君史”观点；旧史学和历史教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创造历史的思想，受到了越来越激烈、深刻的批判。

章太炎针对改良派把光绪皇帝吹捧成自尧舜以来中国未有之“圣明之主”，要中国人把扭转历史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帝王史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荒谬绝伦的。章太炎轻蔑地直呼光绪皇帝不过是“载小丑，未辨菽麦”。反之，如前所述，他却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

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中，不仅热情地称秦末农民起义为“秦末之革命”，完全把旧史书污蔑农民起义为“盗”、为“寇”的历史颠倒过来，而且在论述中尤其重视这次起义中众多群众的参与作用。他说：“这次起义‘未数月而遍及天下’，‘亡秦之功，不得以归之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而必以之归于多数之共亡秦者’。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对‘民史’观更是作了痛快淋漓的发挥。他专门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盛赞太平天国英雄们反抗清政府的赫赫功勋。他十分重视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且又‘人数最多’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断言他们‘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进行革命’。在关于英雄与时势、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

以上均见《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孙中山也有着很正确的看法。他以美、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指出：“（华盛顿与拿破仑）二人之于美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抗英之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工人之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很明显，在这里孙中山是把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归之于时势和人民群众，而不是归之于某些个人或者英雄的。

历史教育在史观上的更大改变，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前后，因为正是此时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在史学领域里，人们不仅系统地接触了唯物史观，而且开始用这种科学的史观指导历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李大钊同志是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还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同志即在其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总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众积，则英雄无势力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编写了《史学要论》专著，更加系统、全面地宣传唯物史观。

尤其需要提出的，李大钊同志此时明确地指出了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育，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改造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他曾经深刻地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转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地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

必须看到，史观的进步、科学，使得我国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进入了完全崭新的阶段。

第四，近代学校开办，中小学历史课程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途径。

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公布了我国近代的第一个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包括有《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等具体文件。按照这个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 9 年，中学教育为 5 年，总共 14 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有历史课程：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另外，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亦设有“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对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53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李大钊选集》第 48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李大钊选集》第 506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1912年9月，颁布了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其中小学7年，中学4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均设有历史课。另外，在以造就小学教员为任务的师范学校，也设有历史课程。

这样，历史教育在青少年中，便以完全正规的课程形式进行了。当时，中小学的历史课虽然还处在创立时期，但是，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教育目的、任务，有固定的课时，并且配有相应的专门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师。历史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日新月异，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三、新时代赋予历史教育的伟大使命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史学研究及历史教育也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像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的那样：此时，“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新的时代赋予历史教育以崭新的历史使命。

还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那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即运用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谬论。这场斗争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使无数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含着唯物史观的教育，更多的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观察、分析中国的现实。

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反动文人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文化“围剿”。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反动文人打着研究中国历史的旗号，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肆意歪曲，提出了种种的谬论，如，有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有的说：“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有的干脆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等等。尽管说法不一，但是其目的都是明确的，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抹煞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的这些谬论立即遭到了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驳斥和反击，并以其胜利而结束。郭沫若、吕振羽、邓初民、侯外庐等老一辈史学家在这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以他们的宏观史学巨著，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并且说明了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这是一场思想战线上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战线上的论战。它还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通过这次教育，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了科学的历史知识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用历史教育党的干部和全体军民，把历史教育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阶段。

第一，通过历史教育，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全民族奋起反抗帝国主人的侵略，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为此，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作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历史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教科书。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同志概括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讲到近代，毛泽东同志说：“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还列举了十个方面的史

实，说明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地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压迫手段，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接着，他讲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是怎样以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党干部和广大的革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增强民族自信心，同仇敌忾，拯救祖国，并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历史的和革命的课本以及当时革命史学家们的许多历史著作，在当时对我国人民所起的巨大教育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历史教育有利于更好地认清我国国情，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抗战初期，原来犯“左”倾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都是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更是如此，其损害也最大。为了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便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接着，从1942年春天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学风。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学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实事求是”，“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种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实际的“的”的“有的放矢”学风，才是正确的学风。

毛泽东同志曾经极其深刻地阐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学习、研究历史与了解、深谙国情的关系。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能不能够注意学习、研究

以上均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6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

历史，是能不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学风的重要态度问题。他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则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因此，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当时的情况，在研究历史方面，“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他提出具体的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并且明确地宣布：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干部和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全党和全体革命人民的历史教育工作也获得了丰收，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第三，通过历史教育，为现实的革命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十分注意借鉴历史，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教育全党和革命人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以弱胜强，毛泽东同志援引了不少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以为借鉴，教育党和红军。例如，在1936年12月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左传》关于‘曹刿论战’的全文——引者按）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7、75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5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6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60页。

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地援引了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以为经验，用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如，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中，他针对如何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指出：“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箝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为了阐明在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的重大作用，援引历史上的中外战例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等等。

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为会议所作的法论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和中国党内的陈独秀、张国焘的投降主义，以及它们给党和革命造成的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都是中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它对于全党同志更加深刻地认识王明的错误及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有着莫大教育意义的。

另一次意义深远的全党历史教育是在1944年进行的。1944年，郭沫若为了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300周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论著。书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由于骄傲自满，一些领导人生活腐化，而最终导致失败的过程及教训。该书脱稿于3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从3月19日开始分4次连续刊载。当时，延安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4月12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87—18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9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台订本，第4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林伯渠同志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郭沫若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史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像党和毛泽东同志将其发展到如此的深刻程度，使之教育全党和革命人民，实在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通过历史教育，澄清人们的错误观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人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现实，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十分清楚地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宣传革命的文化，历史教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里，毛泽东同志对《逼上梁山》这一历史剧的肯定、赞扬，寄托了对一切历史教育的期望，要通过历史教育把被以往旧史学家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来面貌。

1944年前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士绅李鼎铭，把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修改稿推荐给毛泽东同志评阅。毛泽东同志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然后给李鼎铭写了信。信中热情地鼓励作者李健侯，说他“费了大力”，自己读后“获益良多”，请李鼎铭向他表示“深切之敬意”；同时，亦委婉地表达了不能够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的观点，指出“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而“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最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议，“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殷切地期望用唯物史观教育人民，并把这一点作为历史教育重要作用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是在党中央指导和毛泽东同志的具体关怀下，当时解放区的史学家们

以上均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46—14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55页。

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78—17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编写出了一批运用新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的通史和专史。它们在用历史教育人民和干部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例如，此时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史学巨著和何幹之准备写的《中国民族战争史》等，都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关怀。

1940年秋，范文澜在延安讲授中国经学简史，毛泽东同志亲自去听课。后来，范文澜将其讲义的提纲，送请毛泽东同志审正。毛泽东同志很快地在9月5日给范文澜回了信。信中鼓励他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关怀下，范文澜发表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并根据毛泽东同志信中提到要重视对近代史研究的建议，下决心研究近代史，先后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等许多史著。《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后开始着手编写的，当时，曾就这部书的写法，请示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建议他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写作，这部书写作中完全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同志读过很满意，“《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建议以后可以写得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1939年1月，何幹之把他想编写一部《中国民族战争史》的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于1月17日及时地给何幹之回了信，加以鼓励，“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对于他的具体设想，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特别是要他注意在书中痛斥历史上的民族投降主义者，赞扬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并说这“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于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继续给予极大的重视；我国的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早在1950年，毛泽东同志即向史学界提出了“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的意见和要求。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领域掀起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这无疑地为新中国的历史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质量的坚实保障。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史学著作、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博物馆、各种历史刊物、历史名胜古迹，或是大批出版、建立，或是得到了维修、保护，其工作量之大和数量之多，都远远地超过了旧中国。这些就为我国的群众历史教育工作，创造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使我国的历史教育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昌盛局面。

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仍然始终把党内历史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托他将《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基本经验总结，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参加会议的代表学习、研究、讨论。1958年，我

以上均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69—17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9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全国即将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向全党发出“学点历史”的号召，在党内和全国掀起了学习历史的新高潮。在建国后许多党的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都讲到历史，使用了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事实教育全党，启迪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和党所承担的艰巨任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毋庸多论，这些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历史教育，一方面拨乱反正，对“文革”前和“文革”中在史学领域和历史教育中“左”的思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加以澄清、批判，使历史教育牢固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一方面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时代高度，加强历史教育工作，增加中小学历史学科的课时，提高历史教育的地位。

当前，我国的历史教育正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各种形式繁荣、发展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发挥着自己特有的作用。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0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本节内容中涉及中外史学史部分，多参考《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和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节 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我们决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是现实赖以存在的基础，现实则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开、不可逾越的鸿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样的话，恩格斯也讲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

很清楚，人们的一切现实活动，都“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必须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实际上，现实已经而且也必然地包含着历史，它们之间是分不开的。

正因如此，人们学习历史，接受历史教育，必将大有益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深谙国情和面向世界，从而可以更自觉地参加现实中“创造历史”的活动。

恩格斯曾经就这个问题谈到马克思。他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中说：“《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和“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因此，他才能够深深地把握法国的现实。现实发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的事变，不仅“没有使他感到意外”，而且能够从“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中，揭示出“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卓越的理解”、“透彻的洞察”了“当前的活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历史”，勾勒出“忠实地反映了现实”的“精妙”的“图画”。

同样，前面谈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国情之间关系的深刻论述，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事实。毛泽东同志认为要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参加中国改造现实的斗争，就决不可以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由于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此，要想很好地参加、指导当前现实的伟大斗争，就“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十分坚定地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明确地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学习、研究历史，进行历史教育，并将其与研究现状、国情紧密地结合起来，即能够大有裨益于人们参加现实的斗争，这是已经为中外历史所证明的一条真理。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

二、懂得规律，展望未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规律，亦称法则，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带有普遍性和重复性等特点。一般来说，人们通过学习历史所认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样地适用于认识现实。按照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层次性特点，有的规律只适用于某一个社会历史阶段，而有的规律却可以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对于后者，如果能够通过历史教育予以认识的话，那么它对于洞察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意义就更为重大。

通过学习历史，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然后将其用于观察和指导现实的活动，古人已经懂得。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朝代的更迭是人们尤其是封建统治者们非常关注的大课题。不少人都在寻求这其中的规律，以求为当代找出能够长治久安之道。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8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72—773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0页。

西汉初年，刘邦的谋士陆贾即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在奉命说服赵佗归顺朝廷，接受赐封南越王并回朝后，被刘邦任命为太中大夫，接着，便与刘邦讨论如何才能得以长治久安。“（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在《新语》中，陆贾集中地阐述了历史上统治者如何处理好“德”与“刑”的关系：“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并把它上升到规律，解剖“秦所以失天下”的道理：“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正是据此，他建议刘邦“尚德”，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的“无为而治”的方针与治道。

唐初，唐太宗与魏征等“君臣论治”，亦是很好的例子。从总结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中，唐太宗君臣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君与民的关系，以及民心归向才是统治稳定与否之关键的规律。“贞观六年，（唐）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帝王创业与守成的历史规律。一次，唐太宗询问群臣：创业与守成何者更难？魏征回答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唐太宗自己也得出结论：“（房）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魏征和太宗所总结的这条政治规律，正是从无数王朝兴衰的历史中得出的。

君臣们认识到以上这些规律后，便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唐初现实，追寻如何使唐王朝得以长治久安的道理。关于君、民关系，唐太宗就明确地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纵逸。”为此，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关于如何守成，魏征说得好：“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君臣不骄不傲、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基本上与贞观年间相始终，

《汉书》卷43《酈陆朱刘叔孙传》。

《贞观政要·政体》。

《资治通鉴》第195卷，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贞观政要·君道》。

《贞观政要·政体》。

正是因此，才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里少有的大治局面。

当然，真正全面深刻地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其中有些属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的规律，不但适合于人类历史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而且适合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同时也适合于现实。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规律，即是如此。“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条规律，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十分适用。我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践，即是这一规律的绝好体现。

“述往事，思来者”、“彰往考来”、“总括前踪，贻海来世”等，一直是我国古代史学和历史教育所阐述的目的、宗旨之一。正是由于人类历史“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历史规律带有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因此，学习历史就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熟知现实，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人类的未来，预见将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孔子只是从“损益”、增删的很肤浅的层次上来预见将来的“百世”，同时也带有孔子对历史的发展只看到量变而忽视其质变的思想印记，但是，他毕竟认识到学习历史，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可以展望未来，“虽百世可知也”。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此，人们通过“鉴往”而“知来”便真正地能够成为现实。“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

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尤其青少年能够认清人类社会的前途，如李大钊说的“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地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这对于树立人们和青少年的远大理想，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以古为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0页。

《李大钊选集》第50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

《论语·为政》。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1—212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李大钊选集》第50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

历史不能够重演和再现，这是由人类历史具有的一度性特点所决定的。它一经消逝即不可能再行复返。但是，历史上非常相似的现象却又是经常存在的。于是，人们便可以把历史作为镜子，对于现实的某些现象，用历史照一照，从中获取启示，这便是所谓“借鉴”了。

史鉴作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在我国古代特别盛行。早在西周初年，统治者即反复地告诫周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要周人以夏、商的灭亡作为历史借鉴，不要重蹈其覆辙。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解决军粮，“得谷百万斛，……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在《置屯田令》里，曹操清晰地说明了他的这一举措，原来源于借鉴历史：“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唐太宗更是非常注重史鉴，并常常以历史上的鉴戒告诫教育群臣。后来，当经常与他谈论历史教训、论政谏诤的魏征逝世时，太宗十分难过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一直成为被后世人们所传诵的佳言。司马光编写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被称为“绝好之皇帝教科书”，从书名便可见其“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要旨。该书原名《通志》，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上宋神宗时，神宗以其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读了《资治通鉴》后，深有感触地说：一部历史，“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毛泽东同志很喜欢读《资治通鉴》，称赞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还曾经深刻地指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算起，是由于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里，《资治通鉴》的“鉴”，被毛泽东同志发挥得淋漓尽致！

前边已经述及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利用历史以为借鉴，教育全党和革命人民，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无数生

《诗经·大雅·荡》。

《尚书·召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资治通鉴》第196卷，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读通鉴论·叙论二》。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新创造》第1期。

动事例。在建国后，他仍然十分注意史鉴，借鉴历史来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心内容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举了楚汉战争的历史，让党的干部从中引为鉴戒，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段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又非常深刻，引起与会者的笑声。他的用意即是以这段历史作为借鉴，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的人“戳得痛一点”，以期改正。

张贻玖的《毛泽东读史》中还记了一段毛泽东同志用三国时期的吕蒙为鉴，要我们的军队干部和公安干警成为文武兼备人才的生动事实。“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家都很熟悉的，毛泽东同志以我国战国时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事实作为借鉴，要人们注意子女的教育问题，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国策》的《触誓说赵太后》一文，讲了秦国攻打赵国，触誓劝赵太后送她最喜欢的小儿子长安君去齐国作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援助抗秦的故事。其中，触誓说的很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这样，赵太后才是真的深爱长安君，让他力国立功，日后长安君才可以保住在赵国的地位。这比赠给他好的封地和金玉要强得多！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推荐《触誓说赵太后》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毋庸多述，史鉴在历史教育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功能。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4—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四、“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地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很明显，学习、继承我们的历史遗产，应该是历史学习、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功能。

历史遗产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就文化而言，它既包括了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包括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人文科学的成果，如哲学、文学、史学、军事、艺术，等等。同时，它也包含了自己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优秀的民族传统。这些如果能够通过历史教育予以继承、发扬的话，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教育功能。

我国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在《史通》中，即以总结的口吻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劝诫”、“风声”说的都是道德情操的培养、熏陶，它们是史学、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功能。他还以孔子的《春秋》为例，指出“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意也”，“《春秋》之教，以惩恶劝善为先”。阐明了历史正是通过歌颂优秀的人物及其品德，贬斥那些丑恶人物与其行为而给人以劝惩和施教的。

李大钊也明确地讲了历史在人们品德情操培养上的作用和途径。他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可以看到，李大钊的话无疑就是他本人和无数革命前辈、先烈们通过学史而成就、陶冶自己高尚情操、革命品质的生动体验和很好写照。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光辉照人的伦理道德典范和优良的民族传统，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以中国史为例，前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话：“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里，毛泽东同志讲的“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和“酷爱自由”，“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等等，无疑地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而这些又往往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地表现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的身上。因此，如果能够

《易经》。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通过历史教育，生动形象地把这一切告诉给人们和广大的青少年，对于他们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熏陶、培养，必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关于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形成的伦理美德情操，还有许多。如，关于如何做人，即如何处理个人与阶级、民族、国家以及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就很突出。如儒家讲的对国家、民族要忠，子女与父母要“父慈子孝”，对他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先立人，己欲达先达人”，“仁者，爱人”；在义和利的关系上，要先义后利，如果遇到“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义和利不可并取时，则要“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在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上，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先“正己”而后“正人”；在个人修养上，要能够“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等等。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教育、陶冶下，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兢兢业业，“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而“天下归心”的周公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于自己事业的诸葛亮；“尽忠报国”的岳飞；身为郡太守，“子孙常蔬食、步行”，“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清廉为官的杨震；持法公正、刚直不阿的张释之、董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高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支《正气歌》的文天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等优秀典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灾难时，为了反抗外来侵略，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更是有无数的爱国将领、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爱国思想和情操，更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和传统。

凡此这些，同样也应该是我们通过历史，教育人们净化思想，抵制腐朽意识侵蚀，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好教材；它对于一个人的做人，处理好个人与阶级、民族、国家关系乃至创造好的家庭环境、教育子女、和睦亲情，增强民族、社会的凝聚力，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功能的。

最后，要说明一下，历史教育对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所起的作用，还有侧重的方面。前边提到的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所著的《史学导论》一书，就将其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国家统治者或领导者的重大决策的参与”；“第二，是对于社会成员中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某一群体变革现实社会的要求的参与”；“第三，是对于社会教育的参与”。

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以对“国家统治者或领导者的重大决策的参与”来看，该书举了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唐初魏征主编的《隋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等为例，加以说明。美国著名的国际事务活动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通晓历史背景，那么对外交事务的研究，即对整体的国家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他这里讲的是制定外交方面的决策和策略问题，其实国家的任何决策的制定，都是要以历史为依托，都要“通晓其历史背景”的。

《史学导论》第60—6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基辛格：《重建世界》，转引自上书第49页。

第二章 历史教育的特点、途径和方法

第一节 历史和史学——历史教育的源泉和依托

一、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

从前章关于历史教育现象的起源和发展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根溯本，历史教育的源泉及其内容是历史；如果没有了这个源泉和内容，也就没有了人类的历史教育。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正是历史教育与其它教育现象有所不同、互相区别的最根本所在。因此，在研究、确定历史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时，有必要先明确一下有关历史的某些基本特点。

什么是历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如果单单谈到“历史”的话，它是指的一切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既包含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自然史，同时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以往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紧接着就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很清楚，我们常说的历史，应该指的是人类史，也就是人类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正是这个人类史，构成了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与世界上其它现象比较，有着自己的一定特点：

第一，有了人，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类以往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是历史存在的前提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已显然，如果把人，把“有生命”、“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个人及他们的活动，从历史上“抽”掉，那么，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便也不复存在了。

第二，只能够是“一度性”。

正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类历史犹如江河一样，一旦东流入海即一去不复返了。它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历史是不能够再现和重演的。

第三，与自然史相比，有其复杂性的一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名的书中曾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正是这样，在自然史上一切“活动”受着规律的支配，但是，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在无意识、无目的地进行着，因而相对地表现为“简单”一些。而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却不同，它除了受着规律的支配外，还要受着“有意识的”、有“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所左右，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与自然史相比，人类社会历史会给人以更多的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感觉，要显得复杂得多。

第四，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

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千差万别，纷坛复杂，而没有任何的雷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得十分深刻。他说：“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关于历史发展的这种多样性，列宁曾经以帝国主义各国和各国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作了具体的说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致需要的托拉斯和银行，甚至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至于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人类历史又具有统一性。这就是说人类历史尽管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表现出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但是，它们却同时又存在共同的一致东西。其实，这即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当然，如果细分的话，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即规律性，又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能够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发展阶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规律；人类历史总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规律；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规律，等等。第二种，仅仅适用于某一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却并不能够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如，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规律，就只在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中起作用，却并不能够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第三种，只是适用于某一个社会或者某一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例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规律，就不一定适用于其它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

历史的多样性都寓含着历史的统一性，同样，历史的统一性又只能够通过历史的多样性才得以体现。如果抽去了历史千姿百态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便无从谈起了。它们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哲学上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矛盾的“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每一种物质的运动形式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

第五，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受到一定的必然性所支配的；这种必然性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点正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的：“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但是，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进程又是始终充满了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诚如前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总是受着历史的必然性所支配的，历史“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又必须通过历史的偶然性作为其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讲到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时，对这点论述得十分精辟。他说：“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 1850 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然被发现。”

在这段话里，恩格斯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历史的必然性始终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另一方面，历史的必然性又总是要通过那些“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历史人物才能够体现出来，要“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不仅如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还不仅仅是历史必然性“消极”的表现形式，它对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还会起着加速、延缓、或好、或坏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 1871 年 4 月 17 日》的信中所说的：“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正是因为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一些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曾经起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另一些历史人物却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点就成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六，时空观念。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人类社会历史亦然；它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同样是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了时间和空间，历史亦将变为“非常荒诞的事情”。

时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表现为历史的年代，即世纪、年、月、日。正是这个“时间”能够把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以及现象，联结起来：或是纵的联系，前因后果；或是横的联系，“同年共事”，互相影响、制约，然后构成历史的整体。

为了很好地表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时间观念，在历史教育中除了坚持叙述历史要严格地按照时间发展先后次序外，还要注意使用一些年表，如《历史大事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对照年表》、《中国朝代顺序表》、《帝王世袭表》等等。

空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则表现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和历史现象所赖以发生、发展和存在的地域，即地理环境。也正是这个“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6-50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1 页。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一个因素；同时也使得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在空间上得以彼此联系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因此，研究、认识历史，进行历史教育，一刻也离不开地域观念，离不开人类历史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

要想很好地表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体现出历史存在的空间观念，很重要的手段便是历史地图。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中，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明确地指出，史书必须“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史书记地，最好附以必要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者近年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对史学工作很有用处。现在的历史书，一般多不附历史地图，这是史书记地方面的一个重要缺陷。”白先生这里主要谈的是史书编纂，其实就整个历史教育而言，同样地需要“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如，下边章节中将要谈到的历史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参观、仿古、凭吊”就应该有历史地图与之相配合，现在有的叫“旅游图”或某地“名胜古迹图”，这样可以使参观者对历史遗址、遗迹有一个清晰的地理概念，加深理解历史，而不致于昏昏然。其中的“历史读物”，更是须要附以相应的历史地图了！下边章节讲到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主要途径——历史教学时，无论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历史课堂教学，亦都反复强调了历史地图（或是教科书的插图、地图册、填充地图册，或是历史地图挂图）运用的重要性，究其原因，都是依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特点，考虑到“空间”乃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规律。

在历史教育运用历史地图时，依据人类社会历史的特点，应该注意一些问题。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从史书记地的角度概括了几方面，很精辟，我觉得对于我们从事历史教育、编著历史读物和运用历史地图，同样是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这几个方面主要是：“首先要注意历代建置的变化。汉州、唐道、宋路、元省，这是大的变化；其下，或含郡、县，或含州（府）、县，有二级制，也有三级制，都应有所交代。其次要注意常见的地理概念。山东、山西、山左、山右、关中、关内、关外，关东、关西、关左、关右，河东、河西、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等，都是史书上常用的地理概念；沿用这些概念，必须注明其原意，才不会给今天的读者造成误解。第三要注意同地异名与异地同名。如今天的北京市，春秋战国称蓟，辽称燕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称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又改称北京。这是同地异名。如就‘北京’这一地名来说，唐、五代指太原府，北宋指大定府，金先后改称临潢府和大定府为北京，明初以开封府为北京，旋又建顺天府为北京，即今天的北京市。这是同名异地。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不应相互混淆。第四要注意古今地名未变而管辖范围已有很大差别。如上海，在宋仅是一镇，元设为县，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为上海市，而现在的上海市则辖十区、十县。如扬州，相传为古‘九州’之一，泛指我国东南地区；汉唐时期为州名，辖境相当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与河南的少数县份；隋唐以后改为州、路、府名，辖境相当今江苏扬州市、泰州市、江都、高邮、宝应等县；1949年析江都县城区置扬州市，此即今天的扬州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史书记地时应有所说明。第五要注重实地调查。以往史书上记载的地名，实指何地，

在解释上有时含混，有时有错误，须经过实地调查，加以核实。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北宋与西夏大战于永乐城，双方兵力总计不下50万。历来有关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永乐村。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调查，认为永乐村是一个狭窄、缺水的小山沟，不可能是几十万大军决战的地方，而米脂县的马湖峪才是永乐城故址。……可见实地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以往史书记载的错误和疏漏，还可以进而认识到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第六要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最后，我们今天在史书里记地，应当比古人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不只是从地理沿革上要求，而且还要把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条件。马克思重视自然条件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他在讨论劳动过程的时候，把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规定为：‘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劳动生产的自然条件；劳动资料，也是离不开自然条件的。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他在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马克思的这些话说明了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说明了控制并利用自然力的必要性，这对我们的史学工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重大问题。如广大国上的统一，各民族间不平衡的发展，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南方北方经济地位的消长等，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中得到启发，从而作出科学的说明。”

第七，人类史与自然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面我们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但是，就在同一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正是这样：

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脱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自然界的现状和变化影响着人类史的进程。尽管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但是，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众所周知，正是一些大的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哺育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文明古国。可是，有时一场地震或火山爆发而毁灭了一些很繁华的古老城市或文明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并不是罕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专就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具体到自然条件影响及于一些古代国家政权的特

以上所引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1卷》，第202、560、561-562页，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168-17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点，马克思也曾经做过具体的说明。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同时，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也对自然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特别区分人和动物对于自然界的影响：“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他还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这里讲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积极影响，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着自然界，使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然而，人类对于自然界还有着另一种影响，即破坏自然界，对其施以消极的影响。例如，滥伐森林、捕猎某些动物，造成水土流失，使良田变成沙漠和造成自然界的生态的不平衡；人为地使河流决堤，造成河道破坏、泛滥成灾等等事实，在历史上就屡见不鲜。恩格斯在 1853 年 6 月 6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就英国侵略者占领印度后，给印度自然条件造成的巨大破坏做了透彻的阐说，指出在印度的英政府把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使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地区成了不毛之地；并指出这一事实说明，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

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呢？

正如前面谈到的，应该说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有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但是，这种人类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却“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5-5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5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 页。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作用，乃至对自然的征服，其表现出的能力是生产力。人类的社会关系，就是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很显然，正是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发展变化和交互作用，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可以看到，所谓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首先是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力，同时是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然后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及竖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即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因此，我们常说历史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它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有生产的、物质的、科学技术的，也有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的。

既然，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就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弄明白了人类历史的特点及其内容，在认识和进行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就会有好的放矢，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历史教育的凭借和依托——史学

从历史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史学与历史教育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一门学科，而且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关系。

首先，历史教育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即可明晰。一般说，史学研究的成果要想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益，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整理出资料或论文，提供给国家决策机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另一种则是撰写成论文或编著成史书将其发表、出版，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从而发挥自己的功能。第二种方式是更为经常和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从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同时，一切历史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要凭借史学，并以史学作为自己依托的。历史教育说透了不过是把史学的研究成果，以一定的方式，转化成为社会教育的活动。

例如，史学研究的视野、观点和史实的辨析，就决定了历史教育的视野、观点和选材。《春秋》作为史学成果在当时是很大的，它开创了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但是，囿于孔子对历史的看法，《春秋》大抵只能算是一部政治史，而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等丰富的内容，则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不记。有人对于《春秋》的内容作了大体的统计，“其中征伐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灾异（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陨石）占百分之十”。而其史观，又是出于维护西周以来的统治阶级等级秩序“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它要做的是把已经“礼崩乐坏”的现实，重新以“正名”的手段，恢复到西周的当初。其选材由于受到了列国纷争、分裂割据的局限及其“寓褒贬，存善恶”笔法之约束，显得十分简要，以致需要后人之为作“传”，才能尽达其历史的本来面貌。像这样一些情况，在孔子把《春秋》作为六艺之一以教育弟子的时候，显然是要受到影响的。《春秋》的成就与不足必然地决定着当时历史教育的功效与不足。毋庸赘论，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和以后，史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革命，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他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如上对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势必同样地也会作用于历史教育，使历史教育在吸收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上，产生质的根本变化。

李宗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史记·太史公自序》。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必然带来历史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再如，史学研究的一切新的成果，都会及时地被反映到历史教育中，使历史教育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更新。

拿历史分期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广泛地开展了中国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目前虽然仍是众说纷坛、意见分歧，但是，较为公认之说是分界于春秋战国之际，于是在历史教育中基本采纳了这一说法。关于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期，以前人们是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界，现在则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大多数人都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们看到，这两种意见及其变化，都曾经在历史教育中得到相应的反映。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曹操、左宗棠、刘步蟾等不少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史学界的评价都有过较大的发展变化，先是贬多于褒；而后则是褒多于贬，充分肯定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功绩。这正反映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众所周知，对于这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发展、变化，都是同样地被及时反映到历史教育的领域中，不论是历史书著还是历史题材戏剧、电影，都莫不如是。

有时，则表现在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上。较大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本世纪 20 年代周口店“北京人”骨化石的发现及其遗址的发掘、本世纪 60 年代的距今 170 万年前云南元谋人骨化石的发现等等，都曾经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同样也使我国的历史教育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较小的例子，如 1972 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孙臆兵法》的简牍，1987 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麻纤维纸（其时间当在西汉文景时）等，也都充实、更新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亦为历史教育工作补充了新的史实。

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明确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以后，就要更加自觉地把历史教育的工作牢固地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最充分地吸取史学研究的成果，使历史教育更加科学化，确实保障历史教育能够在高水平、高质量上。一般说，历史教育与史学研究相比，是一种普及性的工作，但是，要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普及工作应该在提高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第二节 史论结合——历史教育的原则和必由之路

一、历史教育必须坚持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同样地，它也是历史教育的一条根本性的原则。

史，我们一般指的是史料；论，则指的是理论，也即是我们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处理好历史教育中的史与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历史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前边讲过，历史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活动。因此，它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严格地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而不能与之相违背。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这个认识规律和过程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人们的正确认识都要经过两个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又说：感性阶段要解决的是认识事物“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而理性阶段才解决对于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的认识。

历史教育同样地要遵循着认识的这两个阶段，而且要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于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历史教育的感性阶段，即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由于历史所具有的“一度性”的特点，是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靠实验或观察等手段进行的；因为无论如何，历史是不能够重演或再现的。它唯一“感觉”、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办法，只有依赖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的或多或少的痕迹，即史料。如，人类历史遗址、遗迹。像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通过对其考古发掘，不但了解了当时北京人生活的地貌环境、同生的动植物，而且通过发掘出的北京人遗骨化石，他们制造和使用的旧石器以及用火痕迹，认识了北京人的体型面貌，当时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等。再如，历史的文字记载，像历史上的史书、档案、文集等等；它们不仅数量庞大，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且往往能够详细、具体、生动地通过文字记述，把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现象栩栩如生地反映在今人的面前。这部史料对于我们感性地认识当时人类的社会历史最为重要。此外，还有口头史料，即限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闻者还停留在口口相传的历史资料；民族调查资料，即对于仍然处于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进行调查而后整理、记述下来的材料。像摩尔根所写的《古代社会》，就是他对于印第安人的调查材料，其中所记述的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生活情况，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段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正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的：“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历史教育所必须经过的感性认识历史的阶段；翔实的史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同时，进行教育包括历史教育，也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但是，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历史教育并没有完成它的认识过程，还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认识才行。“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是因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很显然，我们要在历史教育中，引导人们把片面的、零碎的史实联系起来，“由此及彼”地揭示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要想让人们能够透过史料的表面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由表及里”，就非得有理论的指导不可。对于历史教育，详尽地占有史料是重要的，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同样也是重要的。而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史论结合，既坚持在历史教育中运用翔实的史料，让史实说话，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对史料做出应有的分析，引导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在历史教育中单纯地堆砌史料，为趣味而趣味，或者是脱离丰富、具体、生动的史实，只是空喊口号、“贴标签”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应该予以坚决的摒弃。

二、学习一点搜集、鉴别史料的方法

既然史料对于历史教育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事历史教育工作，就必须学会一点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懂得一点关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考据等的知识和技巧。

1. 目录。目，指书名或书中的篇目名；录，又叫叙录，是对这本或这部书籍的说明、介绍。这些再加上按照一定的方法对书籍加以分类，便形成了目录书。目录书是我们查找、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工具。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著名史学家、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与毕业同学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更加具体他讲了目录学对于明了书籍情况，并从中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作用。他说：“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著作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目录学就好像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我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容易地找到了。”

目录书大致可以分作综合性的和专题性的两种。综合性的目录书较为主要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如，清代乾隆年间由永瑢领衔纪昀实际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它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收入乾隆及其以前的图书约 3400 种、近 80000 卷，尚有“存目”图书 6700 多种、90000 多卷。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乾隆及其以前的我国重要书著。经、史、子、集四大类于每类下又分成许多小类，更便于人们查找。每部书还都有著名学者写的对该书介绍、评价的提要，便于读者对该书了解。以其史部为例，其下就分有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证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書類、目录类、史评类这 15 小类。我们通过这部目录书，据类查找所需图书，再依该图书搜集需要的史料，十分方便。

再如，《中国丛书综录》是又一部大型目录书，成书于 1959—196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分三册，收入我国 41 家图书馆所藏丛书 2700 多种，共有著录图书近 40000 种。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有“汇篇”、“类编”和《丛书书名索引》等部分，其后还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系根据第一册所收丛中几万条子目编成。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一般地使用该目录书，都是先查阅第三册，根据找出的页码，再查第二册，了解某书的卷数、作者和收入何种丛书，最后查阅第一册，了解该丛书的收藏图书馆，从而惜阅使用。

专题性质的目录书，如，由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该书收入了从 1900 年到 1975 年出版的有关史学著作共 9000 余种，包括了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通史、专史以及史料学等各种史著，是查阅本世纪史学书著的一部很实用的目录书。此外，属于专题性的目录书还有戏剧史方面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共八编，如《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等），音乐史方面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自然科学史方面由刘铎编的《古今算学书录》、王雍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搜集某一专题的史料，了解此一类古书情况，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与目录书相近似的还有一种索引书，对我们搜集历史资料，也十分有用。有人把索引书细分了一下，又有“书语索引”、“书名、类目索引”、“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几种。

书语索引类的书，著名的如叶绍钧（圣陶）编，开明书店 1934 年出版的《十三经索引》。该书 1957 年又由中华书局重印。它是一部查找十三经中所有语句的工具书。所谓语句并不是按我们理解的一句话加句号为限，而是以“讽诵时之一停顿为一条”，更加细致。如《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即析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条。

见《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6 期。

参见吴小如等：《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每条均按其第一个字的笔画多少编入卷首的笔画检字表。我们按此“表”即可查出该句在《十三经索引》书中第几页，然后即可在该页中见到此句出自十三经的某书、某篇、某章，甚至于其下的某节。我的一友人为了弄明白《诗经·伐檀》中的“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句中“稼”、“穡”二字在先秦经典中的真实涵义，查阅过《十三经索引》，于是二字都在何经书中出现过，当时的原句，出在何书何篇，一目了然，便很容易明白所谓“稼”、“穡”乃是务农或经营农业的意思，并非是“体力劳动”之谓。在先秦时期，体力劳动是“力”字，所谓“君子务心，小人务力”是矣！这个“力”字的涵义也是从《十三经索引》中查到的。

书名、类目索引书，如钱亚新编的《太平御览索引》。

《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由李昉等编，共1000卷；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四部丛刊本（精装四册），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百科性类书。全书分55部、4558类，引书较多（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统计，为2579种），大多整篇整段地征引原文，内容丰富，不但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了很大方便。其55部卷目如下：天部、时序部、地部、皇王部、偏霸部、皇亲部、州郡部、居处部、封建部、职官部、兵部、人事部、逸民部、宗亲部、礼仪部、乐部、文部、学部、治道部、刑法部、释部、道部、仪式部、服章部、服用部、方术部、疾病部、工艺部、器物部、杂物部、舟部、车部、奉使部、四夷部、珍宝部、布帛部、资产部、百谷部、伙食部、火部、休征部、咎征部、神鬼部、妖异部、兽部、羽族部、鳞介部、虫豸部、木部、竹部、果部、菜部、香部、药部、百卉部等。

阅读、使用《太平御览》一书时，《太平御览索引》能够给我们提供参考。该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太平御览》的书名、编者、年代、取材、部类、版本等；一部分为《太平御览》全书的总目、类目和子目名称的卷数索引，为查找、使用《太平御览》所需资料提供便利。

篇名索引书，如把史学论文篇目分类编成的索引书，就对我们查找自己需要的论文资料很有帮助。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曾提到22种这类索引书，值得参考。兹选几种，予以介绍：

（1）《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下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全书选用定期刊物1300余种，收入论文篇目30000多篇，均属从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夕（约从1900年1937年7月）发表的。

（2）《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全书选用杂志960多种，收入论文篇目30000多篇。均为1937年7月—1949年9月发表的。

（3）《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室合编。全书收入1949年—1974年期间发表的论文篇目约30000余篇。

（4）《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论文索引》（1949年12月1980年10月）、《隋唐五代史论文索引》（1949年12月—1979年12月）、《两宋辽金夏

元论文索引》（1949年12月—1980年12月）、《明清（鸦片战争前）史论文索引》（1949年12月—1981年6月）。以上四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的论文索引书，均由云南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编。

（5）《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年—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该书引用期刊杂志184种、报纸50种，收入论文篇目7000多篇（以上均见该书）。

关于人名索引的书，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1956年中华书局再版。该书收入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五史的列传、附传中的全部人名，以四角号码编排而成；每个人名之下均注有见于某部史书、某卷和开明书局版二十五史的总页数。《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张忱石等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该书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四角号码为检索，在每个人名下均注有见于何部史书、何卷、页数等。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一个历史人物常常见于多传之中，甚至见于多部史书中，如《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就多有重传现象，我们了解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时，如果能够使用以上等类的人名索引书，只须一查，便可将其有关的史料、记载尽览于眼前，这比起一部书一部书、一卷一卷地尽去翻阅，显然不知要方便多少了。

2. 版本。在隋唐之际发明雕版印刷术以后，书籍的刊行、流通方便多了；一部古书可以一般再版，可以在不同的机构（如政府、私人、书商等）、不同的地方（如四川、南京、福建等），以及不同的时间、朝代，一刻再刻。这样就出现了每部书的众多版本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许多的版本在其纸张、墨色、字体大小、装帧，尤其是书籍的内容是否完整，文字是否经过了精勘、精校，尽少讹误等许多方面，都会有高下优劣之区别。因此，我们在搜集史料时，就不仅要找对书，还必须尽量选择好的版本，这样才可以确保史料的质量。

关于如何识别版本的优劣，前人有过许多的见。如，清代张之洞在其《辅轩语·语学》一书中说：“善本（即好版本，引者注）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旧本。”他所提的这些标准，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选择好的版本古籍使用时，有些专一研究历代版本的工具书可兹参考。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重印出版。该书为邵懿辰、邵章、邵友诚一家几代人陆续编著而成。它依据清人纪昀所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一书所收的书目，对于每部书均罗列其各种版本，并间或加以评注。前人称该书于版本上之精细，“如数家珍”。这样，该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古籍的众多版本及其优劣的一些线索，可供我们选择使用时加以参考。

3. 辨伪。这是鉴别史料真伪的一项重要工作。“辨伪”的含义可以很广，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说：“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伪书。据近人张心澄写的《伪书通考》统计，伪书经部的有73种，史部的有93种，子部的有317种，集

部的有 129 种。伪书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有内容伪的，如全部伪的，像《孔子家语》，就根本不是春秋时孔子所作，纯系魏晋时期的经学家王肃为了与其他学派论争时得势而伪作的；有部分伪的，像《庄子》名为战国时庄周著，实际上只有其中的《内篇》是出自庄周本人，而《外篇》与《杂篇》皆为庄周后学所作，如果用其内容研究庄周的思想，显然就不恰当了；也有在时间和作者上是伪的，如《黄帝内经》原说是距今四千年前的黄帝所写，但是，经过今人研究，大致意见是其成书于西汉初年，且与传说中的黄帝并无瓜葛。

可以想见，如果对于历史上的古籍，不加辨别地区分其真伪，随便使用，必然会难辨正误；倘若把伪书当作真书使用，所搜集到的史料只能够是错误的，据此得出的历史结论亦自然难以真实而无法使人信服。不言而喻，辨伪工作对于搜集、鉴别史料，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辨伪的方法，前人已有所总结，应该加以学习、借鉴。

明代的胡应麟在所著的辨伪专书《四部正讹》中，较系统地提出了辨别伪书的 8 种方法，即“辨伪八法”。具体内容为：

(1)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七略》是西汉刘歆写的一部我国最早的目录书，后亡佚，但是，其基本内容被保留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核之《七略》”，即是看一看《汉书·艺文志》中有无著录，用以判断其书的真伪。

(2)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群志”指二十四史中有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它们都是历代的重要目录书。“核之群志”，即是查看一下这些《艺文志》或《经籍志》中对于某书是否有所著录，借以了解某书历史上的保存、流传情况，判定其真伪。

(3)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看一下同时代别的书著或者人物的言论中是否提到或引用过某书，借以明辨该书的真伪。

(4) “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查看一下在后世人的著述或言论中是否提到或引用过某书，借以从中判断某书的真伪。

(5) “核之文，以观其体”。文指书中的文字，“核之文”即是看一下某书所用的文字、语词是否当时的文体，通过这点定其真伪。

(6) “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通过某书中所述之事，看看它是否合于历史的实际，借以判断该书的真伪。

(7)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这是对某书作者的考察，看看是否有误或是否假托于古人以自重。

(8) “核之传者，以观其源”。查一查传播该书的人，用以明辨书籍真伪。

近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提出了“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即所谓的“辨伪十二法”。其内容与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可互为补充、发展，并且多举例以兹说明。在我们辨别伪书时，值得参考。

一些前人于具体辨伪上曾经做过很多的实际工作，写有辨伪专书。这些都是前代学者辛勤劳动成果。我们在辨别伪书时，如果能够对其加以使用、参考，是可以事半功倍而少走许多弯路的。

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所辨古书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达 70 余种。张心澄的《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出版），更充分地吸收了前人的辨伪工作成果，无论其说法异同，都给予全录或做节录，并一一注明出处，最后则以“按语”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意见。该书所辨

之古书，遍及经、史、子、集、道藏、佛藏等六部，达 1105 种。

4. 校勘。古人又称校讎，西汉刘向对此解释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由于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版本日多，其中难免在古书文字的刻版上版版出现问题，不外乎脱、衍、倒、讹几种情况。这就需要经过校勘予以纠正，否则以错传错，很难保证选用的史料是正确的。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曾经引用陈垣发现的由于古书版本不同而出现文字错误的两个实例，很能给人以启发。该书说：“近代学者里，陈垣先生是很重视校勘的。他曾指出沈刻本《元典章》的《新纲目》中有‘颁行四方已有年矣，一语，据元刻本，‘颁行’系‘板行’之误。‘颁行’，应指朝廷颁行，而‘板行’则是地方上刻版印行。这一字之错，关系到《元典章》全书的法律地位。陈先生说，这是‘一字之误关系全书’。陈先生又指出《通鉴》胡注对韩偓的评语：‘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韩偓其人也。’‘而不能’，元刻本作‘而不行’。全文应是：‘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行。究于行，韩偓其人也。’这可以说，一字之误关系到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上举两个例子虽都属于比较少见的，但可反映出校勘在文献研究上的重要性。”关于校勘工作的重要，陈垣也明确地指出：“校勘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校勘是否精细，实则关系到我们鉴别史料工作的优劣。

应该说，前人于校勘上下过不少的功夫，有些版本的史书业已经过了“精校细勘”，如中华书局标点本的二十四史，即是都经过了专家学者的校勘，其成果斐然。拿《史记》来说，中华书局在标点时，就先认真地分析了现有的各种版本：“现存最早的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有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和清乾隆时候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其中武英殿本最为通行，有各种翻刻或影印的本子。”但是，最后他们还是选定了“用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简称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所以如此，是考虑到“这个本子经张文虎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在《史记》全书的最后，中华书局还专门写了一篇《（史记）点校后记》，“把关于点校方面应当向读者交代的分别说明如下”。这次标点的工作是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做的，并经过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整理加工”。

像这样，我们在搜集、鉴别史料时，只要是注意选择好的本子，充分利用前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即可以省却自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尽管如此，自己直接了解、掌握一些校勘工作的知识和方法，也还是必要的。

现在，人们常常使用的校勘方法是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所提出的“校法四则”，亦称“四校法”。兹摘要于下：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

《昭明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

白寿彝：《史学概论》，第 10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出版。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

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出版说明》和《点校后记》。

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数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决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句字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低语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曰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5. 考据。又称考证，是指对史料、史事的全面鉴别真伪的工作，唯此才有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史料，使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建立在信史的基础上。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郭沫若在讲到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时也说过：“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据古籍。此较之埋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对于搜集、鉴别史料而言，考据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毋庸置疑的。

那末，如何对史料或史事进行考据呢？

首先，前述的目录、版本、辨伪、校勘等工作，都包含了考据的工作在内，且又都为考据工作做了准备，或者说是考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目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详尽的书籍。供我们阅读，从中搜集更多且有用的资料，而避免由于孤陋寡闻，闹出笑话。赵光贤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举了一个陈垣纠正梁启超考据史实上的错误，即是很好的例证。书中说：“过去讲玄奘法师西行之年，一般都说在唐贞观三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举出很多理由，证明玄奘出行在贞观元年秋。其主要理由是史书载玄奘出行的第二年，路过现在中亚细亚的西突厥，见过西突厥国王叶护可汗。而《新唐书·薛延陀传》说：‘贞观二年突厥可汗见弼’。故梁认为玄奘首途当在贞观元年，否则到西突厥见不到叶护可汗。梁觉得他的新说‘殆成铁案’。陈先生举出许多理由，对梁说逐条辨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法师所见的叶护是肆叶护而非统叶护’。他引《通典》

和《册府元龟》：‘贞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能，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啞利特勒（按：勒字当作勤，‘特勤’是官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河钵罗肆叶护可汗。’据此，陈先生认为：贞观元年统叶护已被杀，即令法师在贞观元年出游，到西突厥也不及见统叶护。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所以玄奘三年秋出游，第二年见到的正是肆叶护。问题在于贞观元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所见的是其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这个例子说明，考证务要谨慎小心，能够找到的书，一定不要遗漏。”

“版本”的作用，前边已有例说，此处不再赘述。“辨伪”与“校勘”，一个是辨析书籍的真伪，一个是纠正书中文字的正误，其本身就都直接关系到所用史料、史实的正确与否，是考据工作的重要环节与手段，更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所以很好地运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掌握其方法、技巧，并把其运用到辨别史料、史实的工作中去，自然也就是在做考据工作了。

其次，是要搜集掌握尽量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材料，并要有一定的逻辑修养。其实，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考据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翔实材料与正确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赵光贤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讲了他考据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荥阳大会”，便是一例。他说：“《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曾大会于荥阳，商讨如何抵挡官军。李自成在会上提出了‘分兵定向’的策略，从而取得了此后的一系列胜利。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为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所津津乐道。但是此说是很可疑的。《明史》的这一记载，采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这部书是吴伟业根据他所见到的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公私记载，综合、整理而成的，并不是他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记录，就是说他的书不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的，而是抄录第二三手材料而成。因此我们不能到此止步，草草下结论。当时还有两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书，作者都与吴伟业同时。一位叫郑廉，曾参加过农民军，他写的《豫变纪略》，记录他在军中的见闻，可是只字未提荥阳大会，这样的大事难道他竟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戴笠，他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也未涉及荥阳大会一个字，这是很可奇怪的。《绥寇纪略》中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颇有可疑之处，如书中所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与当时情况不符。焚烧皇陵的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以及闯塌天等著名将领都不在十三家之列，而名声不大的横天王、革里眼、左金王等反在十三家之列。而且，该书所记根据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策略，各家出师活动的方向，也与诸书所记不合。……荥阳大会的主要人物是李自成，要解决荥阳大会的疑难，必须从李自成的活动着手。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当时官僚给明帝的奏疏，这些都是第一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李自成从崇祯七年入陕之后，一直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直到崇祯十一年冬以前没有出关，所以不可能在崇祯八年初到了河南和安徽。据此可以断定，所谓‘荥阳大会’是不可信的，崇祯八年农民军焚皇陵，九年与卢象升大战于滁州等战役均与李自成无干”。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同上第142—143页。

赵光贤先生的上述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其详细论证还可见于他写的《明末农民起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当时，我也参加了搜集、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资料的工作，与赵先生在一起搞，也从明末清初人彭孙贻所撰专一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史事的《平寇志》（亦名《流寇志》）一书中查到，崇祯八年率领农民军焚烧安徽凤阳皇陵的是扫地王张一川，与《明史》所记系李自成、张献忠等所为，决无干系。

从上述关于“荥阳大会”这一重要史事的考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资料必须翔实，假如单单依靠《明史》或《绥寇纪略》，就会得出错误结论，而多掌握些资料尤其是可靠的重要的资料，如《豫变纪略》、《怀陵流寇始末录》、《平寇志》以及大量当时官员向明廷的奏疏（此类资料多见于文集中）等，反复排比，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第二，要有较强的逻辑推理的功力。如赵先生考据这个问题至少是从三个方面做了推理，一是为何当时许多重要书籍不记荥阳大会；二是据《明史》所说由于荥阳大会才有了“分兵定向”，而后则有李自成等焚烧皇陵，可是事实上焚烧皇陵的不是李自成等人，反而是没有参加荥阳大会的扫地王张一川等所为。三是，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李自成等人当时都在陕西与明军作战，根本没有过河进入河南，那么又怎么会出来个十三家七十二营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呢？我觉得这个第三点尤其有力，也就应是逻辑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

再次，要有广博的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地理等的知识。例如，有的学者考据武王伐纣的时间、赤壁之战的地点、春秋时楚国“云梦”泽的情况，以及中西交通史所记海洋中的岛屿、地名等等，常常都是要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运用广博的知识，最后才给予解决或提出新见的。

最后，需要有理论修养。理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分析史料，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在考据史料的工作中也是非常必要、不可或缺的。如有的学者在讨论北宋历史一些问题时，提出：北宋的记载要比南宋的记载可靠，因为是当时人所记，并将其作为一项原则用来衡量北、南宋的史书与其他文献的真实性。我们姑且不说具体史书的评价，仅就上述“原则”恐怕就很可商榷。恩格斯讲过，当历史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对此往往很难产生明确的认识，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处于“潜在活动状态”，“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对其明确的认识。北宋发生的历史事件，限于信息传递手段的落后和其它种种原因，当时人的记载未必能够全面、准确，许多情况也可能鲜为人知，未及披露出来，有的则可能正以讹传讹，尚未得到澄清，这些恰是因为其尚处于“潜在活动状态”；反之，到了南宋，已是“在事后”了，倒是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材料”并给予“鉴别”。南宋的记载不但不一定不如北宋当时人的记载可靠，反而有可能是相对地全面和准确的。其实，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很普遍的常识。看来假如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即便是考据工作，也是会出问题的。

再如，有些搞考据的学者一味地相信“第一手材料”，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假如对一些与农民军直接作战军官的奏章或者某些人的墓志铭这些“第一手材料”过于迷信，也就难免会上当受骗。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观点去看这些奏章或墓志铭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往往掺杂了“胜利”时，标榜自己、美化死者，而在“失败”时推

诿责任、解脱罪责的言辞，因而其所记史实也就难免会有失真之处。不然，曾国藩何以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来篡改李秀成的供状原稿，以致于今天我们对《李秀成自述》所记史实部分，仍然有许多的疑问而不敢贸然全部相信呢？！

三、掌握运用理论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

前面已经谈及，要想让我们的历史教育不只是停留在对于历史表面的现象进行认识上，有一定的深度，使受教育者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并且能够运用理论去分析历史事实，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运用理论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下面择其主要的，作些介绍：

首先，要学会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的最基本方法。

由于在“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于是我们就需要找出一个理论，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些事实，而对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这个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和分析人类的阶级社会，就会发现：

第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1888年，恩格斯在英文版上于此加注，指出：‘确切他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引者）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这种情况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改变，“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上内部阶级和阶层的称谓不同，且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人类社会被划分为阶级，阶级内部又有阶层，以及阶级斗争等内容，是适用于整个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中外咸同，无一例外。因此，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无论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还是现象，都要用这个观点作指导进行观察和分析，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透过“迷离混沌”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历史的本质。

第二，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正如恩格斯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之所以如此，恩格斯讲得也十分明白。他说：“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显然，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包括由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个更高阶段的经济形态的转变，如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等，同时也包括在一个社会形态历史进程内部的不断前进更新，如中国封建社会里旧的腐朽封建王朝的覆灭和接着新王朝所产生的社会“大治”等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它既是这一切重大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同时亦是其“伟大动力”。

运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即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这些思想为我们历史地看待与分析一切历史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指针。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同样地为我们作出了楷模。

对于奴隶制，人们一般地都出于义愤谴责它的残忍性，从现代的条件看，认为它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事情。但是，恩格斯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奴隶制，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充分地肯定了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他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力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他又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须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关于战争这一历史上的现象，列宁对之所作的历史的分析，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说：“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很清楚，我们在历史教育中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观点，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生活过的历史人物，以及存在过的各种制度，都坚持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里，还它们以历史的科学的地位，这样才能既不盲目地崇古，也不是简单地用今人的标准菲薄古人。

其次，学会历史比较方法。

从 80 年代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在史学领域里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并且出现了比较史学的分科。

说到底，所以需要运用同时也可能有历史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如前所述，历史自身存在着统一性和多样性。因此，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便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个性、普遍规律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

正像有的同志所说的，在古代史学中人们已经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只是这时还缺乏系统理论的自觉指导。以《史记·李将军列传》（卷一零九）为例，其中就多次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

其一，比较了李广所处的几个时代。书中说：“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秩八百石。尝从（文帝）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讲了两个“时”，即时代，一个是汉文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内外战争很少的时代，因此不能够充分地使用李广“善骑射”及勇猛格杀的才干，“惜乎”！另一个则是“高帝时”，即秦末刘邦起兵、楚汉战争及汉初剪平异姓王之时，这个时代不同于文帝时，基本特点是战争频繁且十分激烈，按刘邦的话说“乃公居马上得之”的天下，靠的就是武力、争战，因此，他期望的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很明显，在那个时代李广若是能够施展才干，自然是“万户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68 页。

岂足道哉”。同一列传后边接着又写了孝景帝和武帝时，由于与匈奴开战，李广遂又显露其“才气，天下无比”，“以力战为名”，“（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汉初几个时代的比较，我们不仅看到了刘邦、文帝、景帝、武帝几个时代的特殊性及李广在其时的不同活动特点，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时势造英雄”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其二，列传中突出地比较了李广与程不识两个将军的不同治军方法。“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五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傅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快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为人廉，谨于文法。”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偏爱李广的，但是，通过比较方法，程不识与李广治军的不同特点十分明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谁也不能够否认程不识在治军上严谨而有方。这一点在《资治通鉴》里，就得到了司马光的充分肯定。

其三，列传中实际上从与匈奴的战术、战绩及其后果等方面，比较了李广与当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人的不同，尤其联系到当时的时代特征，指出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但最后结果是“引刀自刭”且终生未能封侯的原因。通过比较，既给了李广以评价，也隐约地从时代和李广个人主观上寻觅了其“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在其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中，就从英国“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比较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并且通过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根本不同特点的比较，解开了“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通过这个比较，我们还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共性、统一性，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两国则各有各的道路和方式，各有各的特殊性。

列宁十分注意比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和特点，然后据此确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同政策和策略。他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任务的典范。”

关于历史比较的类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从以上征引的例子中，我觉得有以下两个思路，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历史比较的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

第一，分作侧重寻找相异点的比较，侧重寻找相同点的比较和既寻找相同点又寻找相异点的综合比较。

第二，从时间与空间，整体与部分出发，分作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

应该看到，历史比较方法如果在历史教育中能够加以很好的运用，其效果将会更佳。如马克思指出的“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我们要使广大的青少年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光辉成就，就必须与旧中国做比较，让他们了解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济是如何地残破不堪，民不聊生，中国人民蒙受着怎样的屈辱和灾难。这样，青少年们才会真正地体会到新中国得来不易；真正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才能够使中国走上富强康庄大道的真理。同样地，我们要使广大青少年认识为什么今天我们比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落后，也只有通过近 300 年的中外历史比较，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比较了这段历史，青少年们就会看到，是封建制度长期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中国从十四五世纪以后逐渐地落后于西方，特别是 1840 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财富资源，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一方面养肥了他们自己，使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一方面则使得我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道路。以 1895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为例，仅赔款一项即为 2.3 亿两白银，规定年息 5 厘，必须在 3 年内付清，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才只有 8000 多万两，于是只好向各帝国主义国家以极高的利息和其他各项附加条件借款。这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是一种资本输出和赚取高额利润的大好机会，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俄、法、英、德等国争向中国“借款”的一幕幕闹剧。这一切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经济更加落后乃至陷入万劫难复的深渊。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利用中国这笔巨额赔款及利息，大量地投资到国内的钢铁工业和军火工业，一跃而富强起来。这只是近代列强强加给中国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例，像《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辛丑条约》等等，那一个不是强迫中国向其“赔款”，又有哪一项“赔款”不是巨额的？！如果再加上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其它侵略和掠夺手段来作历史的比较，那么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而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发达起来，不是就很清楚而昭然若揭了嘛！

参看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第 434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

参看姜义华等著：《史学导论》第 201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1 月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287 页。

第三节 历史教育的手段和方法

一、历史读物

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进行历史教育，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由来已久的。前边引《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在位期间，大夫申叔时在向他讲述如何教育太子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申叔时明确地提出，让人们阅读史书，可以“戒劝其心”，使之受到教育。三国时期，蜀主刘备在兵败猇亭退归白帝城后，临终时遗诏给后主刘禅，特别叮嘱他要读《汉书》，用以“益人意智”，也是强调阅读史书以增才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酷爱读历史书籍。阅读这些史书，对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说得十分好：“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现在，由于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出版社的不断努力，供历史教育的历史书籍、读物，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来说，都是十分丰富而兴盛的。总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史书原著。如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地重印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原著。现在，这些史书不但大多数都有了标点本，而且有的还有选本、注本，对于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便。最近，有些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今译或白话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虽然在质量上还有待斟酌、推敲，但是却可以供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亦不失为一种普及的手段。进行历史教育，阅读一定的史书原著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同志就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历代兴衰治乱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二类，历史专著，包括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等等。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历史纲要》、周一良和吴于廑的《世界通史》，以及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等。这些史学专著中有的不但是各类大专学校历史系的指定教材，而且是自学高考一些文科专业或某些单位干部升级考试的用书。它们在各级历史教育中，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类，历史通俗、普及读物。这类史书的读者对象更多地是广大的青少年或者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干部、群众。它具有更大的普及性，种类也最为繁多，文字通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往往是其特点。如有的以“常识”、“问题”等形式写成，像中国青年出版社70年代出版的一套《中国历史常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11页。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3、29页。

识》和《世界历史常识》；有的是以“史话”形式写的，像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中国古代《史话》；有的是以通史或人物传记形式写的，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五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有的以侧重镜鉴的形式编写，像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治政纲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国史镜鉴》；有的是以丛书形式编写的，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龚书铎主编）的一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其中包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旧中国》、《当代爱国主义浅说》、《华侨爱国心》、《中国传统文化漫谈》、近现代爱国诗词选注》、《现代爱国文选》、《当代军魂》、《他们为祖国拚搏》、《中华精神》、《近代爱国者的足迹》等）；还有以连环画等形式编写的，像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画库》即是由《书法家的故事》、《思想家的故事》等许多本连环画册组成，其中每册围绕着主题选取8个著名历史人物，每个人物又由12幅带文字说明的画面予以表现。此外，还有以“故事集”、“演义”等等形式编写的，这里不一一枚举了。

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和文化层次的不同，可以选择适合于个人的历史读物阅读，“开卷有益”，从中汲取历史知识的营养，获得历史教育。

二、参观、访古、凭吊

通过参观历史遗址、遗迹，寻访古迹，凭吊古战场等，一向是我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手段、方法之一。司马迁著《史记》的材料之一即来源于他的访古所得。已故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对此专门做过描述。他说：《史记》材料的“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北宋大词人苏轼在蒙遭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里，他于元丰五年两次畅游黄州西北的赤壁矶。虽然这里并不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但是，看着那大江汹涌、激浪飞溅、山壁嶙峋的自然景观，苏轼仍以其为真战场予以凭吊，先后定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词中虽然流露了苏轼的几多愁情、几多消极情绪，但是，也不难看出，在凭吊、访古中，“故国神游”，追忆历史，英雄豪杰的建功立业，对他仍然有莫大的鼓舞。他在黄州曾带头出钱救济因贫穷而溺婴的人家，一年即救了婴儿百十个，革除了当地的溺婴陋俗。后来，朝廷重新起用他时，他在政治上又有一番作为。同样地，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也是一边靠着“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一边则靠着遍游全国各地，尤其

柴德赓：《史籍举要》，第3—4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是“名山大镇、庙宇古迹”，“往来曲折二三万里”而获取了渊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这使他不但著述甚丰，而且激扬起了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精神和情操。

今天，无论是通过参观，还是通过访古、凭吊，从中受到历史教育，应该说比起古人来，不知道条件要优越多少。

第一，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关于历史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有的陈列着全国性的通史，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内主要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有关历史文物等的中国通史陈列；又如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辽宁省博物馆”，除展览一些辽宁地区的重要文物外，也以“中国历史陈列”为基本内容。有的以展览本地方的历史为主，如山西太原市的“山西省博物馆”，原址为文庙，其中的东西厢房陈列着“山西革命史”，大成殿和东西庑则陈列着带有山西地方特色的一些珍贵文物；再如在山东济南市的“山东省博物馆”，是解放后最早建立的省级博物馆，馆内收藏有大量关于山东历史的文物，包括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发掘的各种器物 and 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臆兵法》及其他古代兵书的竹简等，设有“山东历史陈列”等地方性的展览。也有大量陈列专题历史的，如北京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馆”，收藏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文物和党史文献，其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陈列，展品有3300多件，另外还经常举办与党史有关的专题陈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展览等；再如，江苏南京市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原为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王府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的衙署，馆内主要是太平天国历史陈列，包括革命背景、金田起义、建都天京、政策制度、坚持斗争、抗击侵略、保卫天京和前仆后继等八个部分，勾勒出了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

类似以上的历史博物馆在全国许多的省、市都有，尽管规模有大有小，展品亦有多有少，但是，它们无疑地都是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和比较直观的重要场所。

第二，我国各地的历史遗址丰富多彩，深含底蕴。有些遗址属于考古发掘的成果，如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和山顶洞人遗址，陕西西安东郊滹河东岸的半坡遗址、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西北的殷墟遗址，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地下宫殿”，等等。有些遗址则一直保存完好或基本保存完好，如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北京八达岭的明长城、河北承德的清代“避暑山庄”、山西云岗石窟、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北京丰台区的卢沟桥，以及上海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贵州遵义会议会址，等等。有的历史遗址虽已被毁，但是意义重大，今日仍将其修复（或部分修复），如北京西郊的圆明园，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现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要求于1997年把圆明园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包括“一，要把圆明园围墙全部修起来，保护遗址、园林；……三，完成三园（按：指圆明、绮春、长春三园）微缩景观建设；四，原有的160个景点要全部清理出来，每个景点配上原貌微缩景观模型；五，编印一本画册，对160个景点的今昔进行强烈对比；六，拍一部圆明园今昔对比的电影，让人们了解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了解过去，了解今天和明天，充分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有的历史遗址还更带有系统的性质，如大运河、陆上丝绸之路等，对于这些遗址都是可以进行系统参观和考察的。

以上所举这些，只是我国各地现有历史遗址的一些例子，可谓是挂一漏万。对于各地丰富的历史遗址，如果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旅游）组织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参观、考察、访古、凭吊，不但可以使其获得关于祖国历史的生动知识，而且使其从中看到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进而受到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传统等的思想教育。

第三，现在，随着旅游业和历史教育的发展，有些地方还通过人工建筑，把中国的或世界的重要历史遗址加以集中、缩小，并园林化，使人们能够用时不多，亦不必跑更多的路，便可以领略这些历史遗址的面貌。虽然，它们并不是原来的“遗址”，但是由于经过了史学家们的考据和建筑师的精心设计，同样可以十分逼真，给人们以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时代熏陶。如北京市昌平南口建有一座旧北京城的缩景，其中有旧北京城的城墙、牌楼、纵横胡同……等各种景点，使游人仿佛又见到了旧日明清时的北京。北京的“世界公园”现在也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公园内仿真地建有埃及的金字塔、法国巴黎的铁塔和凯旋门等等世界各国著名的历史遗址，游览一园犹如走遍世界，起到寓教于游的效果。

有些重要的历史遗址，现在还往往被人们配以当年的历史模仿活动，其历史教育的意义更是显著。如北京的天坛、地坛和山东曲阜的孔庙等遗址，都时常配以当年帝王们举行祭祀大典时的“表演”。人们穿着当时的服饰，用着当时的祭器，行着当时的祭礼，虽然一切都是今人“表演”的，但是由于严格地考证了历史记载，其真实性极强，能够给人以仿佛又“回”到了历史当年的感受。

应该提到的是，现在各地不少的历史遗址，当人们进行参观、游览时，都可以同时见到相应的有关文字资料，如各种“说明书”、“游览指南”，与遗址有关的历史资料、历史故事及传说等书籍，同时，一些遗址还配有印刷精美的历史地图、旅游图等。从历史教育的角度看，这种把实地参观遗址与阅读有关的“图”、“文”相结合的方式，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效果也就更好。

三、访问

访问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或者历史人物的亲属后人，既是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途径，同时亦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很好手段和方法。

例如，司马迁写《史记》，有不少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通过访问这种方式获得的。他在《李将军列传》中之所以把李广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并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亲自见过李广，并对跟随过李广的士兵广泛地作过了解。他在该传的“太史公曰”中写道：“《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在列传中又说：“士卒亦多乐从李广”，及广“引刀自刭”时，“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

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他在《游侠列传》中同样地写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看来也是与这位远近闻名的侠士颇为熟识的。有的则是司马迁与某个历史人物的后人交往友善，而从他们口中得知其先人的事迹。如，《田叔列传》中写了田叔历经刘邦、文景几朝，居高官屡次直谏、推举贤者，政绩斐然。在该传“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写道：“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给予他很高评价。并说之所以自己对田叔如此熟悉，是由于田叔的儿子由“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毛泽东同志更是十分重视通过访问、调查研究了解现实和历史的重要意义。他在 60 年代特别提倡搞历史的人要深入到工厂、农村，了解“四史”（包括个人史、家史、村史、厂史），并指出，“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 50 年代曾经组织师生去河北廊坊地区，深入访问仍然健在的当年义和团的团员，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很多义和团组织的内部情况及团员们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事迹，还观看了他们表演的当年练武情景，照了一些照片，收集了部分义和团使用过的刀、矛等武器，这些访问记录和文物、照片现在都保存在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文物室，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成为向师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内容。

现在，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但是，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过的老人，还有许多都健在，我们要很好地组织对这些老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访问，以期更加生动直观地了解旧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从中受到新旧对比和革命传统的历史教育。

四、讲座、报告会、故事会

这是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很经常的一种方式。它具有内容广泛、形式灵活多样的特点。现在，大致有系统性的讲座和专题性的报告等多种方式方法。如，“文革”刚刚结束的 70 年代，北京市的广播电台专门组织了一批专家和中学优秀教师，系统地在电台播出中国历史知识讲座，每次一讲，30 分钟，效果很好。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也经常地举办一些历史专题讲座，面向社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有的历史报告会则是更多地结合着国内外的形势和有关的纪念日举办的。如 1990 年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 150 周年之际，不少城市和单位都举办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报告会，揭露西方列强侵略我国的罪行，讴歌林则徐等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反抗侵略者的业绩，高尚的爱国精神、情操。

1994 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00 周年，许多地方也纷纷以历史报告会的形式，向人们讲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更加深重的灾难，歌颂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高度民族自尊和牺牲精神的北洋舰队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和丁汝昌、刘步蟾等一批以身殉职的英雄人物。

历史故事会更多地是给少年儿童们举行的。它们往往围绕着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个历史事件，主题集中，注重情节，语言生动，把科学性与趣味性相

结合，更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心理特点，常常既给他们以历史知识，又潜移默化地给予孩子们品德情操的陶冶和教育。历史故事会现在是各级教育机关、单位以及家庭，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五、历史文艺

历史以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们同样可以进行历史教育。由于它特有的文艺魅力，事实上往往影响面更为广阔，为各种各样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闻乐见，因而收效更佳。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1799—1850年）的《人间喜剧》（包括96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时，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前边谈到过的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关于《永昌演义》给李鼎铭的信中，也都充分地肯定了这些历史文艺形式可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现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形式很多，有历史题材的小说，如《李自成》、《三国演义》、《水浒》、《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岩》、《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等中外名著。有历史题材的影片，如《林则徐》、《甲午风云》、《巍巍昆仑》、《大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开国大典》、《周恩来》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影片；《列宁在十月》、《保卫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等世界历史的影片。有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如《努尔哈赤》、《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唐明皇》、《北洋水师》、《毛泽东与斯诺》、《大进攻序曲》、《百色起义》等。有历史戏剧，如《胆剑篇》、《文成公主》、《关汉卿》等；京剧和一些地方戏中的历史性题材更多，举不胜举。

谁都不能否认，凡此种种，对于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都是很现实且十分主要的形式。最近，我国在青少年中间开展观看100部优秀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影片的活动，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当然，历史文艺形式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影视片、历史戏剧，总会掺入一些文艺的夸张手法和虚构情节，有些则囿于当时史学研究情况所限，还会有观点上或史实上的讹误。例如，《三国演义》一般认为是“七分真三分假”，确实，只要是核对一下《三国志》，就会发现其中纯属虚构的地方的确不少。如史载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情同手足”，但是并无什么“桃园三结义”之说；关羽投降曹操后又离曹而去寻找刘备是事实，但是，曹操认为他是“义士”，下令不让手下诸将阻拦，因而也就没有“过五关，

斩六将”，“刀劈蔡阳”的事；董卓部将华雄是被孙坚所杀，并不是关羽杀的，更没有“温酒斩华雄”的故事；甚至关羽也不是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他杀袁绍大将颜良于今河南滑县时用的是长矛；至于后来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等情节更是完全虚构的了。赤壁之战中，史书上根本没有关于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等的记载；“火攻计”也不是诸葛亮想出来的，而是出自东吴大将黄盖之谋；黄盖诈降曹操是事实，但是没有事先的周瑜打黄盖等“苦肉计”；曹军战船用锁链联起来有记载，可是它并不是什么庞统献的“连环计”；蒋干过江欲劝降周瑜是事实，但是“蒋干盗书”就是纯属虚构了，等等，不一而足。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三国演义》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极力地贬斥曹操，把他描绘成好雄，更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曹操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是远远较当时的各派军阀要有所作为的，他对于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完全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再如，历史影片《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刻画成胆小畏敌甚至颇有些奸诈的“小人”，并把黄海战役的失败责任归之于他，其实这是受了英国教习泰莱所写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错误影响。事实是，刘步蟾一直对专横的英国教习泰莱不满，时常表现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极力不受其控制，因而招致了泰莱的忌恨，故而诬之。刘步蟾身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在黄海海战开始后，丁汝昌负伤，刘代为督战，应变沉着有方；后来，日军进攻威海卫时，刘步蟾亦进行了英勇抵抗，在定远舰中炮受伤后，军中英籍顾问勾结部分官兵要挟投降，刘步蟾见难挽大势，遂毅然沉舰自杀，以身殉职。显然，电影中关于刘步蟾的形象是不真实的。

诸如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就要注意在利用历史文艺形式进行历史教育时，适当地予以澄清，指出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文艺的虚构、夸张，甚至存在的观点、材料错误，避免以假乱真、以讹传讹，影响了历史教育的效果。

此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方法还有一些，如组织历史夏令营、历史知识竞赛等等。

1994年暑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等国家机关和一些单位即组织了这类的历史教育活动，收到了很好效果。为了让大家了解这种历史教育形式、方法的具体情况，现把有关这次活动《“中华五千年”历史知识竞赛及夏令营在京举行》的报导，转录如下：“由中宣部出版局、国家教委基教司、文化部少儿司、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团中央少年部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共同举办的全国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五千年’历史知识竞赛及夏令营近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有近百万名中小学生学习了由江泽民书记亲自题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五千年’大型系列音带，各地宣传部门、教委、团委、文化单位，组织学生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历史遗迹，观看了历史影视片后，进行了各种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并进行了书面答题。经过各地选拔、推荐，有几百名同学集中在北京参加了夏令营活动和现场抢答赛。最后，210名同学分获‘中华五千年’历史知识竞赛一、二、三等奖，10000人获鼓励奖。……为弘扬主旋律，把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生动、形象、直观，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近期推出一套与‘中华五千年’音带相配套的‘中华五千年’彩图本。”

第三章 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一门功课——历史教学

第一节 历史课程的设置

一、基本概况

历史课程，又称历史学科，是近代中小学课堂教学制度确立以后，在分学科授课情况下设置的重要学科之一。

一般认为，欧洲的班级授课制是由捷克的大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年）较为系统地提出来的。他明确要求学校“应该按年龄来划分班级。每年开学的时间应有统一的规定。教学的时间应作详细的划分，务使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有一定的工作。各个班级的功课都应该仔细地分成阶段，要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并按计划进行教学。教师的教课应同时面向全班学生，全班学生也都应该作同样的练习。每门课程只能有一种课本，等等。”这样，就构成了新的班级授课近代教学制度的基本内容。

按照这个教学制度，夸美纽斯设计了一个包括母育学校、国语学校、拉丁语学校和大学这样一个“四级”学校制。母育学校是6岁以前儿童上的，在此期间“必须把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当具备的全部知识的种子播种到他身上”，而这些“种子”中即包括历史。国语学校是夸美纽斯设计的初级学校，在各门功课中语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类学校按照规定也要学习历史。拉丁语学校共有六个年级，分别为文法班、自然哲学班、数学班、伦理学班、辩证术班和修辞学班。在这六个年级中，每个年级都开设历史课程，其内容依次为圣经史、自然史、艺术与发明史、道德史、各国风俗史和世界通史。

可以看出，自从产生班级授课的近代教学制度后，历史就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它从现代意义的幼儿园、小学直到中学，都有设置，而且越到高年级就越为重视，尽管学习的内容有别，但是在每个年级都有。

前边曾经述及，中国最早实行的这种近代学制是清朝末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即“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分为三段。首先是小学阶段，共九年，又分作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的教育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学业5年，设有“历史”课程。高等小学堂4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其课程中亦有“中国历史”一科。其次，为中等教育性质的中学堂，共5年，同样设有“历史”课程。关于它的内容和顺序，“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再次，是“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

戴本博主编：《外国教育史》中册，第52—5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参看上书第54—56页。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09—5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由于是为“预备”升入大学作准备的，故而分较细，有政治科、文学科、商科、工科、农科以及医科等。各科所学课程都视将来大学专攻之需要，亦有所不同。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其中的文学科大学历史课程仍然很受重视，在三年的修业期间，学生都要学习“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等课程。

辛亥革命以后，二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课程改革上，当时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小学阶段分作“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两段。其中，在高等小学校中设置有“历史”课程。中学校每学年均设置历史课程，每周均为2课时。第一、二学年为“本国史”；第三学年为“东亚各国史和西洋史”；第四学年为“西洋史”。

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学制，名《学校系统改革案》，即为“壬戌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小学阶段6年，其中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学阶段亦为6年，分作初级中学3年和高级中学3年。这种学制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划分方法，即小学与中学六六制，中学初高中三三制，可以说基本上一直延用到了今天。

在壬戌学制下，从初级小学一直到高级中学，在其所有的课程中均设有历史课一门。在初小和初中阶段，将历史与地理、公民、卫生等几门课合并为一门“社会”课讲授。

从1927、1928年确立起的国民政府统治，在学制方面虽然有过几次变动，如1932年以“过去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合并制度，足使设施混淆，目的分歧，结果中学固无从发展，而师范与职业教育，亦多流于空泛”，“驯至谋生、任教、升学三者目的，均不能达”的原因，废除了综合中学制度，中等教育分设中学、师范、职业三种学校，但是，基本上是延续实行了上述的王戌学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课程上虽然几经修改，如中学课程即经过了1929、1932、1936和1940年四次修订，但是，在高小、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均设有历史课程。

应该指出的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进行改革，从学制、课程、办学方式、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和更新，逐步建立起了为革命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区的各类学校中，历史课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2月苏维埃政府通过并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小学阶段为5年，分为前期3年，后期2年，分别称列宁初小和列宁高小。前期的课程有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而在国语课中就包含着“革命历史”的内容。后期专门设有社会常识课程，亦有历史的内容在内。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的教学制度逐渐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有的地区已经逐步地建立起了由小学、中学等阶段组成的系统化的普通教育体系。各级学校一般地都有历史课，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就是作为这些历史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第1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参看上书第116—117页。

参看上书第353页。

课的课本使用的。后来，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曾回忆说：“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指的即是这本通史。另外，像吕振羽编写的《简明中国通史》、华岗编写的《中国民族解放组织运动史》、东北书店印行的《初中临时教材历史》以及叶蠖生专为中心历史课编写的历史课本等，都是这时各解放区历史课的教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23—3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建设新中国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在课程上，提出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合理地调整、精简现有的课程。随后在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完全确立了有别于旧中国的新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设置，从建国以后直到现在，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历史课程基本上被取消外，作为中小学校的重要课程，历史课一直是设置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个时期历史课课时的多少和在小学、初中、高中等的设置情况，却时有变化。其大致情况，可以通过以下的表格，反映出来：

始设年份	小学五年级 (每周 课时)	小学六年级 (每周 课时)	初中一年 级(每周 课时)	初中二年 级(每周 课时)	初中三年 级(每周 课时)	周总课时	总课时
1953年	3	3	3	3	3	15	549
1955年	2	2	3	3	3	13	456
1963年	2	2		3	3	10	346
1978年			2	2		4	128
1981年		2	3	2		7	243
1991年	3		2	2	2	9	约300

以上只是小学和初中历史课程的变化情况，高中阶段更为复杂。例如，1953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中学暂行课程规定，高中三个年级均设置历史课程，每周3课时；高一开设世界近现代史，高二开设中国古代史，高三开设中国近现代史。

1960年以后，高中只有二年级设置历史课，每周2课时，开设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以后，曾实行初中高中直线设课；初中只开设中国史，高中开设世界史。现在，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初中开设完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高中一、二年级开设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均为每周2课时，高三文理分班，理科班不再设置历史课，文科班则开设中国古代史。

二、应该加强历史课程设置的研 究——兼谈建国后历史课程设置的经验教训

必须看到，课程设置问题包括历史课程，是一个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很缜密细致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只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实验，

才能够最终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课程体系，同时历史课程的设计也才能够更加臻于完善与合理。以下即结合对我国建国几十年来历史课程设置的经验教训，看一下历史课程设计中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并进一步认识今后加强对其研究的重要方面。

众所周知，在教育教学论里，中学历史课程的含义通常包括中学历史课的内容及其进程。诸如中学历史课应该传授些什么历史知识，用什么观点统率它们；教学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设置在那些年级；总时数是多少，各个年级的周课时数是多少；乡土历史教学怎样安排；历史必修课与选修课如何设置；学生课上与课下的历史学习应该如何处理，等等。在实践中，上述关于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通常是具体地体现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里。

必须看到，历史课程的问题，应该是历史教学法研究的核心部分，居于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培养目标、教学目的，最终都必须落实到课程上，才能够得以实现，而一切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又都要依据于课程来决定其取舍。总是内容决定着—门课的实质，同时，又决定着—门课所要采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而不是相反。

在我国，历史作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如前所述是从近代开始确立的。它最早见于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从那时到今天，历史一直都是以—门独立的课程在各类学校中设置。事实上，在这近百年间，历史课无论是在课程的目标、内容、时数上，还是在课程是否需要“循环”，即直线式或圆周式（又称螺旋式）的排列上，都是有着不少的发展和变化的。这些，都应该属于历史课程的设计范畴。只要认真地总结这些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历史课程的设计，并不是取决于什么简单编制技术的问题，而是一项有规律可循的复杂工作。例如，各个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设计，大体上都受制于如下的基本因素：（1）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教育培养目标；（2）历史学的知识结构和发展状况；（3）教育科学的成就，尤其是关于课程论的研究；

（4）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5）社会经济、文化水准；

（6）历史传统和对国外的借鉴；

（7）对与中小学其它学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8）设计、编制课程人员的组成和素质，等等。显然，如果能够研究透彻、认识清楚这些决定、制约历史课程的基本因素，设计中小学历史课程时，就会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从而使历史课程的设计更加臻于合理和科学；中小学历史教学的质量也就会得到保证和不断的提高。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历史教学方面的一些得失利弊，就大多数与对课程的认识有关。

以我国建国后的中学历史教学为例，它的设置较之于旧中国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由于新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努力做到史论结合，不断地吸收史学领域研究的新成果，所以能够给学生以科学的历史知识，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尤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在培养—代社会主

此内容曾以《论中学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与研究》论文，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史学论衡》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里在文字上作了修改。

义新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非常清楚，这种根本性质的变化和进步，主要的不是在什么教学方法上，而是在于课程的指导思想和课程的内容，即主要是在课程本身。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教育部和教委先后颁布过四个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并组织编写了相应的中外历史教科书；现在正使用着新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同时，按照“一纲多本”的原则，已经组织编写了几套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个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正是我国中学历史课程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这些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保证了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方向和质量，成为历史教学在发展中不断前进的一个个重要标志，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于历史课程的总体考虑问题。

毋庸讳言，新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在其前进过程中，也有过失误。这些失误，如果考其原因的话，主要的也还是出自对课程的理解和认识上。

1958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同志片面地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曾经搞过“历史课要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国内外的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大事，历史课就应该讲授些什么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学历史课程自身的系统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发挥历史课对现实应有的社会功能，反而使它的教育效果受到了削弱。那时候，有的学校为了使历史课“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课堂上大讲我国的冶金史，甚至把历史课搬到小炼钢炉旁边去上。后来，还出现过以学习、写作“四史”和“开门办学”代替正常历史课堂学习的做法，以致完全取消了学校的历史课程。

显然，上述这些情况，都是违背了历史课程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只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其实，这些做法如果从课程论的角度去看，都是在实际上受了“活动课程论”的影响。“活动课程论”根本反对学校设立各门固定的学科，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知识传授和教育，而主张“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以学生的社会需要和生活需要为中心，设计“活动课程”。它的代表人物最初是卢梭，后来是杜威。这种课程论是在解放前传入我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受到过某些批判，但是，谁能料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它却又冒了出来，影响我国的历史教学。

关于中学历史课程是直线式编排，还是圆周式编排，即“循环”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是个争论不定，反反复复的问题。

正如上边所讲过的，50年代前半期，我国中小学历史课程基本上采用圆周式的编排。小学讲一遍中外历史，初中再教一遍，高中还要开设中外两门近现代史课，采取了大“循环”。1958年，有些同志认为直线式编排课程是多快好省的办法，而圆周式的排课则是少慢差费。于是，小学历史课被取消，初中开设中国历史，高中开设世界历史，一遍完成。这种看起来的“多快好省”，实际上却违背了历史课程的自身规律，结果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我国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实行初高中“一贯制”，而是普及初中；一部分学生初中毕业以后，不再升入高中，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假如按照直线式的办法设计历史课程，这部分学生势必只能学习中国历史，而得不到世界历史的知识，结果便会造成他们历史知识的莫大缺陷，不符合“面向世界”的培养人才要求。即便升入高中的学生，由于中国历史是在初中一、二年级学的，到了高中毕业时也大多遗忘。结果，高考前准备考文科的学生，还要用一至二年的时间，重新复习初中所学的中国历史。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浪费。而那部分准备报考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则不再学习历史课。他们的中

国历史知识就这样停留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水准。显然，这也不利于这部分学生的成长，造成他们历史知识的严重不足。

其实，历史课程要不要“循环”，同样地要从课程论上去找根据，而不应该简单地以什么“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来定其取舍。对此问题，至少有如下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人的认识规律。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掌握历史知识亦然。从小学到高中前后 12 年，只学习一遍历史课，显然有违于人类认识要螺旋式上升和反复加深的客观规律。

第二，历史知识的特点。数、理、化的基本公式、定理，语文、外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都会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自然地出现重复，因而能够促使学生反复不断地去认识和加深，进而掌握。历史课程则不然。它的基本史实一般地只现一次，不再重复。除去讲授新知识时，偶尔联系一下旧知识，一般地，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知识的认识是不会自然反复的。

第三，学生的年龄特征。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其生理、心理的变化和差异很大。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以具体、形象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特征，到了高中，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开始有较好的发展。初中学生学习中国历史，大多停留在对于历史的形象掌握上，理解不会很深。假若高中不再学习中国历史，那么中学生对于祖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四，我国的学制。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后，有一部分要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再继续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实地保障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也能够获得比较完全的中外历史知识，而不受到削弱和影响，是一个应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前边谈到过的决定、制约历史课程的一些基本因素，如果给予注意，在设计历史课程时综合考虑，中学历史课程需要“循环”，必须采用圆周式的编排方法，就可以原则上予以肯定了。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课程“循环”编排以后，如何体现出历史知识的逐步扩大和加深，避免简单的重复，则可以在确定各个学龄阶段的历史知识内容时，再具体地斟酌、考虑。

在一段时期，我国历史课程的设置，还受到了“重理轻文”思想的影响，不但课时较少，而且被作为学校的“副科”，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应该看到，这是中学课程设计中的一个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同样地需要从课程论的高度加以检讨。

从世界课程论的发展史看，一直有着“基本课程论”与“实科课程论”的争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古罗马的昆体良等人，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天主教教士，都主张课程设置要以培养抽象思维、哲学家头脑、演说家口才和精通《圣经》文法、修辞的人才为主，而不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这种主张，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者和天主教神职人员服务的。“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在欧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一反“基本课程”学说，提出了“实科课程论”，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他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批判基本课程论的虚浮与不切实际，反

对所谓“装饰性”的知识，而提倡应该学习实用科学知识。因而，在他所设计的学校课程中，就明显地带有“重理轻文”的倾向。这是适应资产阶级培养生产、科技人员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教育思想。应该看到这种实科课程学说“重理轻文”倾向，一直影响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及其课程设计。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中等学校的课程安排，究其“流”而言，深受旧中国和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重理轻文”，重实用知识，轻思想教育，则是其突出的表现。正是这样，数、理、化和语文、外语等课的地位越来越重，而历史、地理等课则不断受到削弱。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性质和任务的。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就明确地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改革开放，一方面则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同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才能够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在教育上就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按照这个教育总方针，我们在中等学校的课程设计上，就应该全面地考虑，既重视理科，也重视文科；既重视知识实用的学科，也重视思想教育的学科，而不应该有厚此薄彼和孰轻孰重的倾向。此外，在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上，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如何适应教育结构改革的现状，通盘考虑普通高中、中师、中专、技校、职业高中的历史课程，以及它们与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衔接；如何更好地解决历史课程设计中学科逻辑体系和学生心理逻辑体系的矛盾；以及如何处理好历史课程与政治、地理、语文等课程的关系，彼此配合而又不简单重复的问题，等等。不难看出，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从课程论的高度去认识、研究和解决，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已有的经验上，就事论事。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课程论的问题。它们进行教学改革往往都是从课程改革开始，把课程改革放在教学改革的首位。毋庸讳言，我国在这方面起步是较晚的，但是完全可以迎头赶上。只要我们切实地重视课程问题，加深对课程包括历史课程的研究，并把它付诸于中学课程设计的实践，可以相信，中学各科教学包括历史教学的质量就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等学校的课程体系，也就一定能够更好更快地建设起来。

第二节 历史教学大纲

一、基本概念

历史教学大纲，又称“历史课程标准”。如前所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即颁布实行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现在，上海市实行的历史教学大纲，亦称“历史课程标准”。但是，由我国全国统一制定、由国家教育部或教委颁布实行的，一直是称作历史教学大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先后于1956年、1963年、1978年和1987年制定并实行了四套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92年，国家教委又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简称“新大纲”。

历史教学大纲是国家关于中学历史课程设置的具体体现，是关于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带有指导性的文件。它的内容明确地规定了中学历史教学在整个中学教育中的地位，教学的目的、任务，教学进度和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原则意见，等等。现在，历史教学大纲在我国是由国家教委统一制定并且颁布全国予以实行的。它既是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历史教学工作的依据，同时也是考查学生学习历史课程成绩和评估历史教师教学工作的依据。

关于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结构、组成部分和具体内容，目前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并不完全一样。如，美国的历史教学大纲常常在规定了须要讲授的历史内容后，还写有教法建议（包括参观以及使用什么教具等）；前苏联的历史教学大纲则于相应的章节，写有须要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台湾地区的历史教学大纲专有“因材施教”部分，规定了对优等生和差生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的施教办法等。我国国家教委统一制定的历史教学大纲，则依据实际情况，既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要求统一的大纲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也考虑到作为统一的大纲，既要对教学工作带有指导的权威性质，又不能够把具体问题规定得过“死”，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发挥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和广大历史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这些考虑和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地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历史教学大纲的模型和结构、内容。它已经日臻成熟，越来越为历史教学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科学的，也普遍地受到了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和广大历史教师的欢迎。

我国现行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一般地包括了如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1. 前言

这部分主要是以简明扼要的文字阐述中学历史课程在中学整个教育工作和课程结构中的地位。它从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角度；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角度；从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展望未来的角度以及从历史课对中学其它学科学习的关系和作用等四个方面，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了全面、准确的说明。

2. 中学历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根据我国的教育方针和总目标、历史学科的特点（主要是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特点）、教育科学的新成果，以及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等，原则上确定、规定了整个中学历史教学（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三项任务、目的，即传授历史基础知识，发展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该说，正是这部分内容明确了中学历史课程的方向。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时代，具体的内容和要求都是极不相同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特点。

3. 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

这一部分内容，所阐述的都是历史教科书编写和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和观点。这部分内容是我国历史教学大纲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它对于从根本理论上正确地指导历史课程的开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 教材的安排

这一部分具体地规定了中学各个年级历史课程的进度、内容和课时，包括了每周的课时数、每个学期的最高课时数以及中外历史课时的比例等。在这部分内容中，还涉及到乡土史和民族史教学的问题，具体地规定了乡土史和民族史的教学时数，如何使用这些课时以及关于乡土史、民族史教材的编写、审定等问题。

5. 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于中学历史课教学方法的要求和提示。“教无常法”，教学大纲不应该统一地硬性规定全国各个地区、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方法，以致于全国的历史教学都成了一个死板的模式。因此，在这里只是说“应注意的问题”，尽量留有余地，借以表示在教学方法上既要有一定的原则、准绳，同时又应该是灵活多样而不拘一格的。但是，这部分内容都是经过了反复推敲，是符合历史教学实际的，老师们在确定自己的教学方法时，完全应该从原则上予以遵循和参考。

6. 教学内容

这部分在历史教学大纲中是最具体的，它详细地规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应该教授给学生的全部具体内容。这里包括各段历史的基本线索、思想教育和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以及历史知识的内容要点。它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和进行历史教学最为直接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它不仅是各套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所应当遵循的蓝图，而且对于广大历史教师的备课和教学工作，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指导文件。但是，在现实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一部分历史老师并不是十分重视历史教学大纲的。我以前在中学教课时亦有过类似情况。究其原因，是我们常常觉得教学大纲的一切内容实际上都已经融汇贯彻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了，历史教科书才是我们备课和教学时必须真正依靠的本本，因此，只要认真地去钻研历史教科书就行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视了对于历史教科书还有个正本溯源的问题。

历史教科书如何地编排章节子目（或“课”），对于历史上的问题怎样进行分析，又是如何地选材，深浅难易如何处理，凡此一切，我们如果只是就教科书的自身去钻研、体会教科书，势必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流于一知半解，难以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了历史教学大纲，尤其是其中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教学内容”以及“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几个部分，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于诸如以上所提到的历史教科书的几个问题，就会了解、知道其所本所循，对其具体内容背后所包含的“潜台词”，亦能够一目了然、心明眼亮。因此，我们在备课和教学工作中，不仅不应该轻视历史教学大纲的作用，而且要把学习与钻研历史教学大纲放在首位，并且使之同钻研、体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从根本上确实地提高自己的备课与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二、学习、掌握历史课程新教学大纲的精神和内容

1992年秋季，国家教委在全国颁布实行了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即《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新大纲是从1987年开始制定的，中经国家教委两次认真审查，广泛地征询了有关专家和全国各省市历史教研人员及历史老师的意见，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而最后完成的。无论是从指导思想、史学观点、内容取舍，还是从结构、文字上，新大纲都较原大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目前广大教师、学生正在使用的现行几套历史教科书即依据这个新大纲编写的。因此，当前广大历史教师努力地学习、掌握好新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对于提高和保证我国历史教学的质量，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事实上，从1992年秋季到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历史教师们对新大纲进行认真的学习。鉴于此，本书于介绍历史教学大纲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以后，专门用一个题目讲述新大纲，希望对于目前历史教师们的学习，有所参考和帮助。

以下选录的四篇文章，有的是带有综合性的对于新大纲的介绍和说明，也有的是就新大纲中某些重要部分或新的发展，进行一些阐述。其中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介绍与说明》是我1992年夏季在全国师资培训教育卫星电视上的讲座（收录在1992年5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师培训手册》）；《谈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特点》是同年夏季我在宜昌市国家教委组织的历史新大纲、新教材全国各省市教研员一级培训班上的报告（1992年第8期《历史教学》发表）。此外，还有《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中关于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学科教育》1993年第1期发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的“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收录在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编、1993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学习指导》一书）。这里，个别处的文字有修改。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介绍与说明

新历史教学大纲制定和修改的简单过程

现在，我代表新历史教学大纲编订、修改小组，对国家教委公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作一个讲解。我想分四个问题给大家介绍和说明。国家教委现在公布、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是从1987年开始制定的。当时，参加大纲编写工作的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的历史教师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编辑人员。

1988年，经过国家教委初步审定通过。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又过了三年多了。在这中间，新大纲的修改和完善工作，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间经过许多专家和有教学实践经验的中学历史老师认真地讨论、提意见，经过国家教委组织专家们论证，经过反复地征求各省市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及广大历史老师的意见，还经过了国家教委历史学科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审定，这样，才最后出来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这个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归纳一下，有以下一些因素，是大家都要认真考虑的。

第一，几年来，国内和国际上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课是应该有时代感的，它总是要这样或那样地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现实。所以，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应该考虑这个因素。比如，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在修改中我们都不断地把它的下限往下作了延伸，现在都延到了90年代初；同时，在大纲的内容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补充。

第二，历史教学大纲必须受国家总的教学计划决定和制约。国家关于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的教学计划，在最近期间做了某些修订和变化。比如，在课程结构上，新的计划相应地加强了社会科学课程的比重，因此，历史课的份量明显地加重，课时也适当地做了增加。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中，有所反映。

第三，最近国家教委贯彻江泽民总书记致李铁映和何东昌同志信的精神，先后制定、发布了《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和关于这两个《纲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近代、现代史和国情的“两史一情”教育。两个“纲要”和“实施意见”的精神和它们的具体内容要点，都应该贯彻和体现在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中，这是进一步修订新大纲的重要方面。

第四，按照“一纲多本”的原则，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初步审查通过以后，各套历史教科书都开始了编写工作，并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实验。各套历史教科书的具体编写和实验，对新历史教学大纲的初审稿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也为我们进一步修订大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反馈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修订大纲，无疑地可以使之更加符合实际，也会更加趋于完善。

第五，从新历史教学大纲的制定、初审，一直到最后定稿、颁布实行，无论是从语言文字表述上的更加科学，还是某些提法上的更为精确，都要不

断地加以推敲和斟酌，这样才能够使之达到臻于成熟的地步。

所以，现在由国家教委颁布的这个历史教学新大纲是经过许多专家和中学有实践经验的历史老师和国家教委审查委员及各级领导反反复复、非常认真地制定的。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成熟和科学的历史教学大纲，这一点是应该首先向老师们说明的。

新历史教学大纲对我们历史教学工作的作用

什么是历史教学大纲呢？它是依据国家义务教育制课程的总计划而制定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关于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总体规划和具体规定。因此，这个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一经颁布，便带有了国家指令性文件的性质。它是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依据；是有关“一纲多本”各套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依据；是检查评定学生学习历史课程成绩的依据；同时，也是评估我们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依据。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个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努力认真地学习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很好地全面地领会、贯彻新大纲的指导思想、精神实质和其中的各项具体规定和要求，应该是今后我们每位历史老师搞好历史教学工作，不断地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根本保证，应该是对于我们每位老师教学态度和教学工作是否符合于国家和人民要求的一个很好的检验。

新历史教学大纲的总论部分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从结构上看，包括了“总论”和“分论”两个大的部分。总论部分讲了历史课在义务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初中历史教学的目的、要求，处理历史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教材的安排和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内容。分论部分则分别讲述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基本线索、思想教育、培养能力要求以及内容要点等等问题。“分论”部分明显地比原大纲精细和具体了，这也是新大纲的一个很大特点。下面我分别给老师们作具体的介绍。我们先看新历史教学大纲的总论部分。

第一，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开始时有一段话，实际是前导，集中地阐明了历史教学在义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段话说：“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起着积极作用。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学好历史有利于学好其他学科。”

这里，我觉得有四点需要我们深入地予以认识：

1.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把我国青年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他们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既能够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情操；既是优秀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又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高度发展，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历史学科属于社会科学，有着很强的思想性、科学性。从历史学科的丰富内容和自身特点出发，通过历史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获得历史上的有益借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加深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和认识，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学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实现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目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一代新人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充满聪明智慧的民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产生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艺家、理财能手和科学家，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革命领袖：我们的祖先创造过举世闻名、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教学如果运用这些丰富的史实，向学生进行教育，就可以极大地提高青年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他们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民族，为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并且决心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祖国和维护民族尊严。历史教学在提高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素质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

3. 历史和现实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展中的历史，未来则又是将来的历史。正像李大钊同志所说的：“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选集》第94页）。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同上，第708页）“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是前天和昨天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为了认清中国今天的现实，也就是国情，我们就必须了解和认识前天和昨天的中国即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因此毛泽东同志总是谆谆地告诫全党：“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历史教学正是这样一门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了解和认识国情和世情，同时，也能够向学生展示人类的未来，使他们认清人类社会的前途，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伟大思想和信念。

4. 历史教学对于学生学习中学的其它学科还有帮助。这是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它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的，要想深入地学习和掌握这些科学，就不能不具备必要的历史基本知识。例如，语文课中所选择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章，无论哪一篇都有其反映的时代背景和产生的历史条件，只有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够加深理解文章的内容及其作者的思想感情。至于政治课，无论是社会发展史，还是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的常识或知识，更是离不开必要的历史知识，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自然科学的学科，也是不能够完全脱离历史知识的。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但要讲政治、经济，也要讲文化，要讲历史上的科学技术；讲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历史教学要讲述文化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关系，比如在讲 18 世纪和 19 世纪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的工业革命时，必然要着重讲述这场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而在讲述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时，同样地也是要着重地讲明白这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的重要影响。这对于学生自然科学学科的学习，也会产生有益的启迪和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正如新的历史教学大纲讲到的，“学好历史有利于学好其他学科”。

第二，新大纲的第一个题目是关于历史教学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从新大纲的这段文字看，“教学目的和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教学任务”，共有三项。

1. 向学生传授历史基础知识。

新大纲说：“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即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

这是历史教学的重要要求和目的之一。

初中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知识，是根据国家培养青年学生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针的需要，考虑到初级中学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历史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联系、配合等许多方面的因素，从人类历史上选择那些最必需与最基本的内容，加以确定的；它既体现了国家义务教育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特点，因而它是每一个合格的义务教育初中学生所必须了解和掌握的。

这里，包括了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历史事件如武王伐纣、商鞅变法、虎门销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史现象如贞观之治、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历史概念如旧石器、新石器、统一战线等等，同时，它也包括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人类的历史就缺乏了具体性，就会变成抽象的社会学公式或者变成只讲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社会发展史；同样地，如果只有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而

没有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更谈不上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了。这两点希望老师们能够很好地认识和体会，并且全面地落实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去。

义务教育初级中学所要求的基础历史知识，还必须与小学阶段所要求的历史常识区别开来。一般来说，小学社会课中的历史常识主要是一个个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历史上的一些“点”。虽然小学的历史课（含在“社会课”里）也要求能够把这些“点”串起来，要有一个历史的“线”，即“以线串珠”，但是，小学历史的“线”却比较粗，大致能够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勾勒出来也就可以了。初中历史课则不同，它也要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同时还要讲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重要的历史概念，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论，显然比小学的要详细和深刻得多。不仅如此，它在“线”上，要比小学有更高的要求。初中历史课应该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讲解清楚，而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较好了解和掌握。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个基本线索，包括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即人类历史上几个社会形态的演变、递进线索，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的大线索，同时，也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的历史基本线索，如中国历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历史阶段中，就是王朝体系，是按照一个个王朝不断地“改朝换代”的特点，交替地向前发展和演进的，而在近代则是经历了清王朝的中后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中也包含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解放区政权）等几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世界历史上，从中古史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看，则经历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发展到衰亡的历史进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看，则经历了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等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又还都有各自更细一些的基本发展线索，如中国历史，在古代史上可以有政治制度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演变线索，有农民战争的发展演变线索，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线索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线索等；在近代史上，则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开端到逐步加深以至于最终形成的线索，还有中国志士仁人追求真理、向国外学习，从失败、毁灭到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线索，等等。

义务教育初级中学的基础历史知识是在小学历史常识的基础上向学生传授的，但是，它又必须与小学的历史常识相区别。这一点也是需要老师们予以注意的。

2.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历史学科孕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教育因素，通过学习历史使学生在德育上有较大的提高和发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的和要求之一。我国早在《易经》上就有这样的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德”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和政治思想素质；“前言往行”主要就是说的历史。历史与德育的密切关系，早在3000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提出了以下四点目的和要求：

（1）向学生“进行初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尤其

是社会发​​展规律教育”。

人类社会历史如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这种规律的最好的总结和阐述。因而，它是人们观察和处理自然与社会问题的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历史教育要向学生讲述人类的历史，用正确的观点分析一切历史问题，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历史学科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历史教学的内容特点，就决定了它在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尤其是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例如，历史教学在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时，会自然地向学生揭示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而且后一个社会总是要比前一个社会进步，人类的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会很好地向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使学生树立起人类进步、社会发展、资本主义迟早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坚强信念。其它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发展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等等，学生也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历史获得与形成的。

(2) 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前边已经说过，历史和现实是一脉相连的，很好地了解、认识昨天和前天，才能够深刻地认识今天，也就是很好地了解和认识今天的国情。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序言里曾经讲到，马克思之所以对法国的现实洞察得如此清楚，从政变刚开始就已经预见到它的发展及结局，就是因为马克思对法国的历史非常熟悉和了解。很明显，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进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这种“最深厚的感情”很重要是来自对自己祖国和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自豪与热爱，同时也来自对自己祖国、民族曾经受过的屈辱、欺凌所产生的巨大愤怒和激情。

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学习古代历史，就可以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热爱祖国，决心继承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使祖国更加强大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爱国主义表现在反抗外来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侮辱和欺凌上，同时也表现在无数志士仁人刻意学习外国，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和进行一次次变法维新、革命斗争上。近代中国，无数先烈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和救国救民的光辉业绩，都是历史教学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材料。

我们还应当看到，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光辉历史，他们在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共同促进，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上，并肩战斗，共同斗争；尤其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做到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历史教学尤其是世界历史的教学，是能够很好地向学生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

(3) 向学生“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这个基本路线，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奋斗的伟大目标，自然也是向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尤其是两个近代现代史的深刻总结。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看，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十分科学和正确的。有了历史知识，特别是对于近现代史的深刻理解，就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个基本路线的精神实质，并且自觉地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历史教学在这个方面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

(4) 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道德情操教育”。

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地讲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上，第667—668页）。他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同上，第586页）。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民族的“许多珍贵品”、“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以及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这其中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优秀道德底蕴，都有着数千年来我们民族所形成的极其优秀的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比如，古代史上有周公旦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近代史上有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的力排外侮、革命救国，关天培、陈化成、左宝贵、邓世昌的反抗侵略，为国捐躯，至于在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那更是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他们公而忘私，为了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进步，抛头颅、洒热血，经过前赴后继的英勇卓绝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民族杰出人物，为我们中华民族争得了浩然正气，演出了一幕幕气吞山河的伟剧，他们留给后人的崇高道德情操和优秀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将永远地教育和鼓舞着我们前进、奋斗、自强不息。

历史教学如果将这些讲述给学生，对他们了解并继承我们民族的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从中受到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自己的优秀道德品质，一定会发生其它课程所难以取代的巨大作用。

3. 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现在，关于能力的含义众说纷纭，但是，具体到历史教学来说，所谓“能力”主要就是指学生认识历史和学习历史的能力。这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

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正是在学生认识也就是学习客观的人类历史、获取历史知识当中，他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即认识历史的能力，也就会同时得到发展和提高。

关于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能力，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指出：“初中历史教学，要求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显然比起原来的历史教学大纲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增加了能力培养的内容，二是讲得更加具体和细致了。

细察起来，这段文字所讲的历史教学要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能力，实际上是包括了三个层次、三个方面：

（1）关于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如记忆历史知识、阅读历史教科书、制作简单的历史图表、识别历史地图和图片、口头或书面表述回答历史问题或者参加历史讨论发言的能力，等等。

（2）运用辩证逻辑思维学习和认识历史的能力，如对于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的方法和能力。

（3）运用辩证逻辑思维学习和认识历史的能力，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历史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历史学科的内容特点，这三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都是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

但是，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研究既不能够使用望远镜，也不能够使用显微镜，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抽象的思维力。恩格斯也说过：“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我们都知道，研究和认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唯一的正确理论，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大纲中所说的“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应该是我们初中历史教学发展和培养学生能力的核心部分和最主要的内容。

第三，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总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这个部分讲述了对历史教学内容中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的处理意见，它是理解、掌握与处理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论指导，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和老师们备课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这一部分，共提出了13条原则和意见。

1.“若干原则”的第一条讲了处理历史教学内容的指导思想问题。指出：“初中历史教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历史教学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条原则可以说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它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历史教学。细分起来，这一条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意思：

（1）历史教学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

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类纷纭繁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出一条基本线索；才能够对于各种各样的史实，去粗取精，鉴别真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的历史教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2)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它并不能够代替各种科学研究工作。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必须在这个科学的思想 and 理论指导下，广泛地搜集史料，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分析出正确的结论。这就必须反对简单化的“放空炮”、“贴标签”、“喊口号”的错误做法，始终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3) 古往今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总是植根于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时代给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提出新的课题、新的认识能力和新的认识方法，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地体现时代精神”。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其下限都往下作了较大的延伸，正是这一原则的很好体现。

2. “若干原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讲的是人类客观历史自身的一些基本规律问题。

首先，它提出了历史既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的，但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必须既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样性历史出发，具体而生动地讲述它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特点，同时，又要注意透过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殊性，揭示出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

其次，在阐述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阐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要“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也要阐明个人对历史进程的促进或延缓作用”。

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反作用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它不仅表现在一个新旧社会的交替当中，也表现在平时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发现了这一规律，才使得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奠定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坚实基础之上，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

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表现在物质资料的生产、科学技术的发明和文化创作的繁荣等方面，没有人民群众的艰辛劳动，就没有今天的世界，更谈不上世界的文明。同时，这种创造作用也表现在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上，古往今来，推动历史进步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无一不是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推动下完成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个人对历史也起着作用，有时这种作用还是巨大的。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由于他们的活动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顺乎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就推动和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反之，有些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人物，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他们的活动对于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阻碍和延缓的作用。

3. “若干原则”的第四、五、六条，是讲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

经济主要指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正像马克思所发现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和决定的。新的大纲明确指出，历史教学应当重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内容，应该重视经济史的讲述。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又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政治的最核心内容和最主要的方式，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因此，新的大纲规定：“历史教学要用相当的篇幅讲述政治方面的内容，并阐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历史上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一种不可忽视的表现形式，如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这类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玄武门之变这类皇朝内部争夺皇位的残杀；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这种封建统治者内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杀伐变乱等等。它们有的表现出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与保守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有的则是社会动乱的反映而又反转过来加重社会的灾难。对此，新大纲提出，“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教学中也应适当反映”。

文化现象是历史的重要内容。它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规律，但是，文化终究是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新大纲在强调历史教学要讲述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强调“也应该重视文化方面的内容”，注重文化史的讲述。

4. “若干原则”的第七条是讲认识和处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问题和原则。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里，既要认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我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各族人民都在缔造祖国的历史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看到，这中间汉族的主体作用。因而，“历史教学既要叙述汉族的历史及其贡献，同时也要叙述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贡献”。

（2）新大纲指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历史教学中讲述民族问题的原则。”历史教学在讲述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时，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污蔑和歧视之词，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都应当坚决地予以摒除。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同样是历史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切有利于这一原则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反之，一切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管他是汉族的还是少数

民族的，我们都要加以斥责和否定。在历史教学中，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3) “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教学应当充分反映”。

(4) 必须承认，在我国历史上的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压迫、矛盾和斗争，这主要是由各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是阶级压迫用民族矛盾和斗争作为形式的一种表现，因而它带着特殊的民族色彩。对于这些民族的压迫、矛盾和斗争，必须作出具体的分析。它们常常带有压迫和反压迫的性质或者一方进步，一方落后，对于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各自的不同影响和作用，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必须给予注意的。

5. “若干原则”的第八条是讲处理古代历史上中外关系的一些问题和原则。新大纲辩证地、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亚洲以至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对我国产生过影响。历史教学应当反映这些内容。”

6. “若干原则”的第九条主要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新大纲明确地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教学应当着重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辉业绩”。

显然，这一原则既是我国历史事实的生动反映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我们历史教学向学生进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极好内容。

7. “若干原则”的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条，都是关于处理世界历史的一些问题和原则。在这些条中，新大纲明确地指出：

(1)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其不同程度的成就，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历史教学应当阐述各主要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依据他们的贡献和作用，恰当地反映他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2) “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有时和平相处，有时发生战争。历史教学应着重叙述各国、各民族历史上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要叙述一些国家和民族间的主要矛盾和重大战争，并对其性质作出具体分析”。这里，既包括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也包括侵略的战争与民族解放的战争等等。

(3)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当今世界上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矛盾斗争的实质等等，新大纲说得十分清楚。它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是靠对内对外的疯狂掠夺发

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更加强了对外的侵略和扩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是造成下发达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当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

(4)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讲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都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其间会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更是这样。历史教学应当通过实例着重讲述这一具有规律的现象。”这一规律对于引导学生很好地认识历史和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着很大意义的。

第四，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总论”部分，专用一个题目讲了“教材的安排”。

这个题目说：“五四制和六三制学校的中国历史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初中一年级每周两课时，初中二年级每周三课时。世界历史在初中三年级开设，每周两课时。”这比起原来的历史教学大纲来，历史课的课时有了明显增加，就总课时看，大致达到了1963年的水平。

在这部分中，新大纲特别对乡土教学做了具体的安排。它说：“在中国历史教材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补充编写乡土历史教材或当地民族教材。教学时间，五四制和六三制学校约10课时”。这就便于保证在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实际情况下，历史教学除去有统一的内容外，适当地增加乡土的和民族的内容，以利于为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需要。

第五，“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是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总论”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给广大的历史教师作一些教学方法上的提示和要求。

这个部分提出了六条可以说是教学方法的内容与建议，归纳起来，大致上是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教学必须依照教学大纲，全面地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既应该在传授基础历史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和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又要切忌补充的史实过多，加重学生的负担。这里，讲了历史教学与历史教学大纲的关系；讲了全面完成历史教学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的根本保障；讲了三项教学任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讲了既要补充教学内容，又要突出重点和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

2. 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历史教学要讲究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艺，使我们的教育工作成为一种艺术，但是，这些都不是为方法而方法，更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要求有利于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 历史教学必须注意到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和逻辑结构。既要讲出历史内容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纵向联系，还要讲出“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间”，在同一个时间内所发生的历史现象之间的横向联系；还要注意历史学科与其它学科比如政治、语文、地理等学科之间的联系。这点在古代历史上

要注意，在近代、现代史上就更要注意了。

4.教学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必要的原则。只有这样，历史教学才能够取得成果和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尤其突出了直观性原则和巩固性原则两点，指出：“要充分运用历史地图、图画、图表，还要积极创造条件，运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模型等教学手段，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巩固教学效果，必须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复习和考核”。

5.历史课堂教学是历史课最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要搞好历史教学工作，还应当广泛地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如参观、访问、指导学生阅读历史辅助读物等。这样，才能做到课上和课下的配合，使之相得益彰。

关于分论部分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与原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加强了大纲的“分论”内容和分论的分界。“分论”分作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三部分。每一个部分又分别叙述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即基础知识、思想教育与能力培养要求以及具体的内容要点。

这里，有几点是很值得我们历史教师注意学习和领会的。

第一，基本线索即基础知识部分，实际上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纲。它起到把后面内容要点串起来的重要作用。老师们认真掌握这个纲，不但可以抓住本段历史的基本线索，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后面内容要点所渗透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意见，从而大大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第二，关于各部分历史的思想教育与能力培养的要求，都是根据前边总论中历史“教学目的和要求”的内容，又结合了本段历史的特点提出来的。它是历史教学共同性与特殊性互相结合的很好体现。这样，教师们教学中就可以把历史教学总的目的、要求在将要教授的这段历史内容中具体化起来，容易掌握，便于落实。这是新编历史教学大纲的一个很大的发展，它能够在指导老师们的备课、教学中，起到更好的作用，发挥更大的效果。

第三，新的大纲各部分历史的“内容要点”部分，无论从体系、观点和选材上，都比原大纲有不少的变化，它既体现了历史教学的时代感和紧密地为国家教育培养目标服务的一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这一点希望广大教师在学习时，留心体察和认真领会。

第四，为了适应“一纲多本”编写教科书的要求和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新大纲在“内容要点”部分还大量地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新大纲没有明确设置编、章、节，只保留三个层次的标题、题目，其本身也表现了较大的弹性，如“唐代文学”，“明清的小说”；而且，允许各套教科书可以自己掌握，多讲点、少讲点或讲深点、讲浅点，并不从大纲上给以硬性的规定和要求。

新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希望老师们能够认真地学习和很好地领会，然后落实和贯彻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去，使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有一个新的

更大幅度的提高，为培养我们祖国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谈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特点

由国家教委颁布、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历史教学大纲”），与原历史教学大纲（1987年版）相比，有着许多的特点和优点，是原“大纲”的一个很好的发展和进步。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体会、贯彻和落实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一定能有许多帮助和裨益。

突出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

原来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历史课的课时上规定：“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学期教授中国历史，共三个学期，一年级每周三课时，二年级上学期每周两课时。二年级下学期教授世界历史，每周两课时。”以每学期15周授课计算，初级中学阶段历史课的总课时为150课时。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教材的安排”部分中则规定：“五四制和六三制学校的中国历史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初中一年级每周两课时，初中二年级每周三课时。世界历史在初中三年级开设，每周两课时。每周按两课时安排的，一学期的教材内容不超过30课时；每周按三课时安排的，一学期的教材内容不超过45课时。”这样，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总课时便是210课时，比原来大纲规定的课时多了60课时，超出了1/3还强一些。可以看出，单从课时上看，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与原历史教学大纲相比较，历史课的地位是大大地提高和加强了。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还以“前言”的形式，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课在九年义务教育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它的教育功能：“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起着积极作用。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学好历史有利于学好其他学科。”

这段文字包括了四层意思，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今天、了解国情，进而认清人类的前途、展望未来和对于其它学科学习的帮助等几个角度，清楚地说明了历史课是初级中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一代新人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应该看到这样明确地说明历史课在九年义务教育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地位 and 它的巨大教育功能，是原历史教学大纲所没有的。它无疑地是新历史教学大纲的一个重要发展和突出特色。

当然，这一点不仅标志着我们对历史课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历史课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它也向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真正地肩负起国家和时代所赋予历史课的重要使命。

为了突出和发挥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和要求”题目中，还具体地提出了历史教学所要完成的三项任务：“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即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向学生进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尤其是社会发展规律教育；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进行革命传统和道德情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而献身的历史责任感。初中历史教学，要求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教学传授基础历史知识、发展和培养学生能力及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和要求”方面，较之原历史教学大纲，提出了更加明确也是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传授基础的历史知识方面，除去继续提出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外，增加了要求学生了解重要的“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历史现象，如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稳定繁荣或战乱调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历史概念，如旧石器、新石器、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人殉、人牲，以及民族融合、秘密结社、统一战线，等等。这样，对基础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就更加全面了。尤其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个“基本线索”既包括了人类社会几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的演进、发展；也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自独特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如中国古代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阶段和近代史的一个时期，就是以王朝交替变更、“改朝换代”作为其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同时，它还包括了历史上某些侧面、某些专题的发展线索，如，近代中国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其开端、逐步加深，直到最后形成的历史线索；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抵御外侮，向外国学习，寻求真理，直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线索，等等。有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外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就不会是一些彼此孤立的零碎史实，而是可以互相联系起来，从而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教师讲清这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便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在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原历史教学大纲只提出，历史教学要“逐步培养学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则把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分出了层次，增加了内容，并使之更加细致。其中，既包括了“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提出了培养学生掌握形式逻辑的一些思维方法，如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历史问题的方法等；同时，还规定了提高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这样，通过历史课，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就会更加全面，也更为具体，便于教学中予以落实。

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新大纲与原历史教学大纲比较，亦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增加了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例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关于国情教育等。这一方面，表明了新大纲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增强了新的历史教学大纲的时代感。

其次，有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新的历史教学大纲讲得更加全面和更为明确了。如，原历史教学大纲提到了历史课要向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而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则明确地提出了向学生“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包括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内容。这样的提出，显然就比原历史教学大纲全面了。再如，原历史教学大纲提出历史课要引导、培养学生“学习历史上优秀人物的高贵品质，树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精神”，而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则从培养“有道德”青年一代的高度出发，明确地提出，历史教学要在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情操教育”。

此外，关于历史课必须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重视德育问题，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还专门地从教学方法的角度，作了明确规定。不仅如此，新大纲还作了原则上的教法提示：“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

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新大纲在突出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上，较原历史教学大纲，做了不小的改变和加强，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加强了对历史教学的具体指导

历史教学大纲是国家对于历史课程的总体规划和为之设计的具体蓝图，具有指令性文件的性质。它是初中历史教学的依据、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依据、考核学生历史学习成绩和评估历史教师教学工作的依据。因此，历史教学大纲对于教学的指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新大纲与原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使这种指导更为具体化，也更加地细致，便于教师更好地遵循，从而对于历史教学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表面上看，新的历史教学大纲除去“前言”一段文字外，内容共分五个题目，而实际上它包含了“总纲”和“分纲”两个大部分。“总纲”是前面四个题目，包括“教学目的和要求”、“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教材的安排”和“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内容，说的都是适合于历史教学的总的问题，是中外古今历史教学概莫能外的问题。“分纲”则按照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世界历史三个大块，分别叙述了中国各段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思想教育”、“能力培养”和“内容要点”。如前所述，新的历史教学大纲的“总纲”部分比原历史教学大纲已经具体化并增加了某些新的内容，现在要着重说的是其“分纲”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分纲”部分是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所增加的新内容和对于历届历史教学大纲的一个重大发展。

从大纲的结构看，我们所说的新大纲对历史教学的指导更加具体化了，

主要地就是说的“分纲”部分。

第一，在中国各段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部分，原历史教学大纲在其相关部分的“几点说明”中，是有所叙述的；对于这部分历史给予勾勒线索，阐明观点，突出重点。新的历史教学大纲保留了这部分内容，所不同的是对于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加以吸收和渗透，并且从文字上也做到了有所增加，即更为详尽。

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能力培养”这两个方面，原历史教学大纲只是在前边有一个总规定和总要求，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则不仅保留了这个总规定和总要求，而且在“分纲”部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世界历史，还分别地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总纲”中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依据不同历史内容和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做到了具体化。

例如，“总纲”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提出了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分纲”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则在其“思想教育”方面具体地规定：“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优秀历史人物辈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心。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应当着重向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分纲”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则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培养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斗争的历史。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讲授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内容，应着重向学生进行这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教育。”“分纲”的世界历史部分则在其“思想教育”方面，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提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有责任支持和同情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有责任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世界历史教学中，应重视向世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民族英雄、革命志士、科学家、思想家学习，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树立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再如，关于能力培养，“总纲”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说到了初中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而在“分纲”中则分别就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的内容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做出了各自的具体要求。中国古代史部分提出：要培养学生学会“正确计算历史年代。懂得公历纪年关于公元前和公元后年代的计算方法，公元年代与世纪的关系。了解重要的王朝纪年及与公元纪年的关系。编制中国古代主要朝代顺序表”；“能识别教科书上的主要图画。能填注中国古代的历史填充地图”，以及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简单的阅读能力、记忆能力、复述能力和“回答一些浅显的思考题”的能力，等等。中国近现代史部分则提出要学生“了解于支纪年的常识及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学会编制简要的历史大事年表”。同时，学会“简要笔记教师讲授的内容要点”；“在课堂讨论和小组发言中，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世界历史部分较前两部分，对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要求学生能够“简要记录教师讲课的内容要点”；“在课堂讨论和小组讨论中，根据教科书或课外历史读物所提供的史实，说明自己的观点，

并能对其他同学的发言发表意见”。

应该看到，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上，不仅予以具体化，而且始终贯穿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显然这符合学生历史课中能力培养的规律和特点。

从大纲的内容看，新大纲比原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补充和新的发展。

众所周知，这个部分涉及到了历史教学内容的一些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观点和处理意见，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历史教师的备课、教学，都有着重要的制约和指导意义；它是对历史教学内容思想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

“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原大纲共 7 条，而新大纲则增为 13 条。两相比较，有如下一些不同：

第一，新大纲增加了处理历史教学内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部分，加强了属于史学的宏观内容。如，明确地提出：“初中历史教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历史教学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再如，关于宏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新大纲指出：“历史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的，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教学要阐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注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

第二，新大纲对处理教学内容原则的叙述，注意了具体和全面，因而有利于历史教师对某些重大历史现象的理解和掌握。如，关于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情况的处理原则，原大纲只有一条，文字比较笼统，语焉不详。新大纲则分作三条分别地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了阐释，不但使之更加清楚、具体，而且对于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说得较为透彻了。再如，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原大纲着重地叙述了古代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及对亚洲和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而新大纲则在叙述这一面的同时，还讲了“世界经济、文化，也对我我国产生过影响”的一面，这样就把问题说全面了，也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第三，在世界历史部分，原大纲只有 1 条，叙述得也比较概括，而新大纲则增加为 4 条，从古代、近代直到现代，对其主要问题和关系，都作了具体的阐述和提示。这对历史教师更好地理解、掌握世界历史教学内容的原则，无疑是有帮助的。

新大纲对历史教学的具体指导作用，还表现在对教学方法的提示和要求上。对于“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只要我们将新旧大纲作一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大纲在这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前面已有述及，新大纲明确地提出：“课堂教学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把德育放在首位。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教学内容要突出重点；补充的史实，要适合学生年龄特征，要适度，不要加重学生的负担”。这就为历史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规定了根本要求，同时，也为历史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和确定，提出了重要的依据和原则。

第二，新大纲在教学上向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注意“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讲究教学技能和教学艺术”，同时，又提出这些都必须是有利于“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能搞形式主义，

更不能单纯为了教法“翻新”，而故意地标新立异。

第三，新大纲更加注意了一些基本的教学原则。除去和原大纲一样提出了历史教学要注意直观性，“充分运用历史地图、图画、图表，还要积极创造条件，运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模型等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外，还比原大纲明确地提出了要注意教学的巩固性原则，注意“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复习和考核”，并对复习的方法和考核内容，作了必要的提示。

第四，新大纲明确地提出了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加强课外历史教育的问题。“课堂教学要和课外教育相结合，以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的任务”；对于历史课外教育的主要内容，如阅读历史读物、参观、访问、调查等，亦做出了具体提示。这一点比原大纲都提得更加明确和具体，无疑地是新大纲的一个重要发展。

保持了历史教学的更大弹性和灵活性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目前国情看，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有经济和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亦有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内地和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各个民族之间的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另外，就各地来看，还有“五四制”和“六三制”两种学制的存在。这就需要更好地适应全国的情况和不同的学制要求，更好地为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当然，要编订一个统一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确是需要很好地研究，颇费斟酌的事情。最后，经过多次研讨、反复征求各方的意见，新大纲决定用保持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既有统一，又保持弹性和灵活性，便成为新的历史教学大纲的又一特点。

第一，弹性和灵活性最主要地表现在“分纲”部分中国各段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内容要点”上。

原大纲在“内容要点”上规定得较细、较死，而新大纲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了较粗、较活的特点。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原大纲在“孔子”小标题下面规定有“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教育方法，编订古籍”等具体内容；在“百家争鸣”的小标题下规定有“思想家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军事家孙臆”等具体内容。显然，无论是编写历史教科书，还是教师讲授，这些内容都必须写到或讲到，而不应该遗漏或略去。新的大纲则不同，“孔子”和“百家争鸣”都各只是一个知识内容点，其下不再规定具体要求，这就给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和历史教师以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你可以在“孔子”和“百家争鸣”的小题目下多写几个具体内容，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而少写一些，灵活掌握，不拘一格。

事实证明，新大纲的这个变化和特点，是它的很大优点，在初步的实践当中，已经表明了出来。如，现在“一纲多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同样的“贞观之治”这个标题下，如果按照原大纲的要求，就必须都写入“唐太宗用人和纳谏。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贞观之治”等内容，可是新的大纲就只有“唐太宗和贞观之治”一个小题，其下便没有再做什么内容上的具体要求。于是，有的版本教科书写了唐太宗纳谏、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内容；有的增加了均田制、租庸调制；有的还写了上府兵制。显然，

各具特色，充分表现出了各套教科书的区别和弹性。

由于新大纲在内容要点上的弹性，各套教科书还有了更大的自由和余地，增删史实，突出重点或者适当地拓宽知识面，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的目的、要求。如有的教科书以小字形式写入史实、生动的历史故事；有的教科书加强了注释部分的“补史”功能、效果；还有的“五四制”教科书考虑到初中四年期间，学生有更多一些的课外时间，酌情编入了一点“阅读材料”，供学生课外阅读，等等。

第二，新大纲的弹性和灵活性，还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体例上。原大纲在“内容要点”中，对于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严格地按照编、章、节、子目的形式，进行编排的。以中国古代史为例，第一编原始社会、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三编封建社会。每编下面有章；每章下面有的设节；每个小标题下面有该题的具体知识点。其中，封建社会部分，在编与章之间，还专有以黑体字写的历史“时期”或“阶段”的“标题”，用以概括出下面各章节内容的特点，如写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战国、秦、汉”；“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五代、辽、宋、夏、金、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等等。这样算来，其内容要点部分，大体是六个层次，六种“标题”。这样的大纲内容体例，对于历史教科书编写来说，显然是限制得比较死的，它不利于“一纲多本”教科书的灵活编写。

新的历史教学大纲明显不同，它在内容体例上不再设编、章、节，而只是以汉字数字符号、阿拉伯数字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符号加圈这样三个层次、三种“标题”加以表现，如，“一”、“1”和“①”。这就显示出了较大的灵活性，也给各套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留有了更大余地。事实上，现在已经按照“一纲多本”编写的几套历史教科书，有的以“课”为编写形式，每册按“课”依时间顺序编排内容；有的则以章、节编写，每节一课时；当然还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形式编写，如史话体等。这些不同体例，各具特点，呈现出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毫无疑问，新大纲在内容体例上的变化和弹性，为我国历史教科书园地的五彩缤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在“教材的安排”上，新大纲比原大纲亦有了新的发展，给予历史教学以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原大纲只是规定了哪个年级教授中国历史，哪个年级教授世界历史；哪个学期每周授课几课时。新的大纲除去继续保留这些规定和要求外，还增加了每学期的教材内容不得超过多少课时的限制，如规定“每周按两课时安排的，一学期的教材内容不超过 30 课时”。老师们都知道，一般说一个学期大约 18 周，而新大纲在教材内容上限制的课时为 15 周，这就为教师的教学留有了了一定的余地，剩下的 3 周左右时间，可能遇到节假日，影响历史课的上课；亦可以留作补充讲授、复习考核或者组织课外活动。

新大纲为了保持在全国历史教学有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教学也有自己一定的灵活性，还对乡土教学给予考虑并做出具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补充编写乡土史教材或当地民族史教材。教学时间，五四制和六三制学校约 10 课时。在教学中，这些课时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结合中国历史教材的有关内容，穿插使用。乡土史教材或当地民族史教材，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部门审

因地制宜地编写乡土史、民族史教材，开展乡土史、民族史的教学，就可以使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的历史教学更加地全面，既有全国统一的历史学科基本的要求，也有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历史的补充，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特点的情况，使历史教学能够达到为各地方、各民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目的。

第四，新大纲在历史教学方法的要求和提示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它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一方面强调“课堂教学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全面完成历史教学任务，把德育放在首位，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补充的内容……要适合学生年龄特征，要适度，不要加重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却提出教师的“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是能够达到教学目的、要求，“利于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讲究教学技能和教学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即便是在下边几条具体的教法提示、要求中，新大纲也只是提出诸如使用直观教具、现代化教学手段，注意复习和考核，开展课外教育等问题，并给以一定形式、方法上的提示，不过，仍然言犹未尽，给教师创造性的教学，留有较大余地。

新大纲在编订和讨论中，没有吸取国外某些历史教学大纲对教法规定过死、建议过细的做法，如某一课建议学生阅读什么著作、建议教师采用什么方法或组织什么活动等，其意在于要为教师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留有充分余地，从而使我们的历史教学能够因地制宜，因师生而异，因教材不同而有所变化，真正做到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百花争艳。

更新历史学科知识，降低难度

这是新大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从原大纲的颁布到新大纲的最后审定通过，中间经过了大约5年。这段时间里，一方面是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从现实与历史联系的高度看，对某些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洞察；另一方面，史学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成果，包括对历史分期的认识，对历史体系的讨论，以及某些新的观点提出，新的史实发现、订正和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等。这些都应吸收在历史教学里。新大纲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与原大纲相比有不少变化和更新。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

第一，从体系上来看，中国近代史变化较大。原大纲是按照以前的革命史体系，突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如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和戊戌变法改良运动）这样两条基本线索；现在，新大纲则依据中国近代历史的体系，兼顾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而沿袭了古代史的王朝或时期的体例。如，原大纲开始即是“鸦片战争”，然后是“太平天国运动”；现在，新大纲则改为“清朝中期社会的动荡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然后，在这个题目里讲“清朝面临的危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小题，以后，新大纲则是以“清朝后期”、“清朝的灭亡”、“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确立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等作为大的标题。

第二，断限和分期。原大纲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下限，分别是中

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新大纲将两个下限都下延到了 90 年代初；中国历史的下限延至党提出十年宏伟规划，即“奔向 21 世纪的宏伟纲领”，而世界历史的下限则下延到了去年，即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分期在中国和世界两个古代史变化不大，只是中国古代史虽然仍以春秋战国之际作为我国奴隶社会的解体与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是，更多地注意了这一时期的“过渡”特点。在文化上即是将两个时期的文化合并在一起讲授，列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标题，以表现这时两种社会形态的联系和过渡。

分期的变化主要是屯国近代现代历史。原大纲，中国近代史以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开始，到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夕作为结束；以后，从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现在，就是中国现代史。新大纲则从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变化的角度来划分，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断限。

第三，新的观点和新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中，如原大纲在讲到秦汉与匈奴的关系时，是以秦汉两个王朝为中心的，在秦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秦朝的疆域”与“西汉同匈奴、西域的关系”中讲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新大纲则从秦、汉两个王朝统一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匈奴则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事实，进行讲授；题目分别是“匈奴和秦的对峙”和“匈奴的强大和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再如，原大纲讲到辽、宋、夏、金几个不同民族政权并立时，忽视了西南地区的吐蕃、大理等民族政权；新大纲注意了这一问题，在讲辽、宋、夏、金并立时，专门列上了当时还存在着“西北、西南的民族政权”题目。

在中国近代史中，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原大纲只是讲了“那拉氏发动政变”：新大纲则提到“清朝政局的变动”高度，除讲“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外，还专门讲了“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大”。特别应该提到的，在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除和原大纲一样，新大纲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现代史中，如新大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明确地放入“中国现代史内容要点”中，而不是如同原大纲那样放入“社会主义社会”部分之前，以突出这个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现代历史开端的重大意义。再如，新大纲以“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题目代替原大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时期的成就和失误”，以更准确、科学地概括这段历史内容。新大纲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标题代替了原大纲的“十年内乱”标题，同时，在这个标题内增加了“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小题，突出了“文革”中“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抵制”，不仅使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也使“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

世界历史中主要是在现代部分变化较大。如，增加了“第三世界的兴起”的具体内容，明确列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等标题；并且增加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和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时局的新变化”，以及“东欧的骤变和苏联的解体”等等新的内容和标题。这样，

新大纲便能够更好地反映当代历史的内容。

第四，新的史料。由于大纲只是列出比较概括的标题，因而具体到某些史料的更新上，大纲往往不能直接体现。这就要在教科书中加以反映。如，以前多用陕西灞桥汉武帝时期墓葬出土的灞桥纸作为我国最早的纸；现在依据考古发现和科技史研究的新成就，大多都用 1986 年发现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纸（属西汉文景时代）作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等。

降低难度，拓宽知识面，减轻学生的负担，一直是新大纲制定和修改的重要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古代史部分，去掉了原大纲中从四周的井田到北魏、隋、唐的均田等土地制度和从西汉到明、清的赋税制度，同时，在新大纲的文化部分增加了诸如古代的艺术、音乐、体育等等内容。

与此同时，新大纲在历史知识内容要点上，适当地增强了弹性，这对于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依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掌握知识的深浅宽广，无疑留出了余地，使之有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降低难度，减轻学生的负担。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学大纲》中的“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

《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是教学大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阐述的意见对于处理历史教学内容，带有根本的指导性质和理论意义，不仅是编写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于历史教师钻研、体会教材，组织好教学内容，保证其思想性和科学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部分共有 13 条，其所包括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历史教学内容的指导思想和时代感问题。

一、《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的第一条说：“初中历史教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正确指导思想和科学观点。

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史料是人类历史留下的痕迹，但是，如何去认识客观历史，分析、解释史料，却有着个人的主观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即是历史观和指导思想。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也有极少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在观察具体历史问题时，有过某些唯物的或辩证的观点和因素，闪烁过某些智慧的火花，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真正使历史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经过列宁、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得“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0 页。

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必须看到，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认识历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提供了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它并不能够代替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身。因此，历史教学内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绝不等于只是简单地用经典著作的一些论断或词语，在教学中“贴标签”、“喊口号”，“放空炮”；而必须结合着具体的史实，“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够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二、《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一条还指出：“历史教学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这里说的就是历史教学内容应该有时代感的问题。

首先，一个时代的史学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生活；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总是要为史学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正在指引着全国人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宏伟目标。同时，近年来，国内国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制约着我们历史教学的内容。《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教学目的和要求”中，就在原有的思想教育内容外，比原大纲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以及“进行革命传统和道德情操教育”等。大纲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下限也都作了相应的下延；中国历史由原来讲到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现在讲到 90 年代初我国十年宏伟规划的提出，“奔向 21 世纪的宏伟纲领”；世界历史则由原来的 70 年末 80 年代初，延伸到 90 年代初，包括了“世界时局的新变化”与“东欧的骤变和苏联的解体”等最近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与事件；另外，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内容亦都作了一些相应的增删和变更。这些都正是当前时代发展在我们历史教学内容上的具体反映。同时，时代的发展、变化，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和深刻，使之更加趋于科学和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这种情况，正像前文所引毛泽东同志的话中讲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而到了近代，“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科学的宇宙观用来观察、研究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759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75 页。

人类社会历史，便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便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才破天荒地变成了真正的科学。

明白历史教学内容要具有时代感这一道理，历史教师就应注意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关心现实，增强自己对于时代的认识、了解，站在现实的高度，去体会历史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钻研教材和组织教材的能力。

第二，制约客观历史的一些基本规律，处理古今中外历史问题的一般原则。

一、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这里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既有普遍的共同规律和道路，同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又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英、美、法、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还是它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道路、特征，都不相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人类社会不拘什么国家、什么地区、什么民族，又都大致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这又是其普遍的规律和共同性的地方，如同哲学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特殊性之中。

因此，《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2条中明确规定：“历史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的，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教学要阐明历史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揭示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也要注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

二、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生产力决定、制约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制约着上层建筑。关于这一基本规律和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被认为是最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这段精辟论述，已经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同时，还必须看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决不是消极无为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能够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只有这样，才是坚持了辩证法而避免了机械论。在西方，西欧、北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出现了“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促进生产力大发展，40多年来取得了各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战线的伟大辉煌成就，就都是这种“反作用”的最好证明。

《大纲》“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最基本原理，在第3条中明确地指出：历史教学应该“阐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要阐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大纲》“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3条，还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理，即历史上人民群众与个人的作用问题。

列宁在论述唯物史观诞生以前，“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之一时曾经指出：“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之一。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一般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创造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事实雄辩地证明，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农业，还是手工业的青铜、冶铁、陶瓷、丝织，无不都是奴隶、农奴、农民等劳动人民艰苦劳动、生产斗争的结晶。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更是广大工人阶级辛勤创造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没有劳动人民，没有“劳力者”，就没有社会历史上的一切衣、食、住、行，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世界。

2. 科技、文化的创造者。有些科技成果如我国古代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万里长城、大运河以及无数雄伟精美的宫殿、寺院、园苑、塔、桥等建筑，陶瓷、冶铸、纺织等行业的技术改进与发明，常常都是出于无名氏的人民群众之手。有些科技发明者留下了姓名，但是，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如我国战国时的能工巧匠鲁班，河北安济桥的设计建筑师、石匠李春，改进棉纺织技术的黄道婆等。文学艺术上也有这种情况。《诗经》、《乐府》、南北朝的民歌，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其中不乏人民群众的杰作；白居易的诗所以优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每赋一诗先念给普通老妪听，待其听懂才作定稿。宋元的话本，直到明清的章回小说，不少也是先由民间说话人创作，而后才由小说家进行加工而成的。至于云岗、龙门、敦煌等一些艺术宝库，无论是其设计，还是雕塑、绘画更无不是经由多少劳动人民无名氏的艺术家创造而成的。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更多的科学发明和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些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劳动成果，但是，他们所以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并颇有成就，首先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为他们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同时，人民群众也为他们的发明与创作，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生产经验与生活素材。

3. 阶级斗争与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主力军。如，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推动社会进步，出现一个又一个“大治”的根本原因；在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论是“新模范军”、“大陆军”，还是巴黎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以及林肯颁布的《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所动员起来的农民、黑人奴隶投入南北战争，都是决定这些革命最终获得胜利、成功的重要原因，等等。在反抗外来民族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压迫和侵略的斗争中，人民群众的作用更是比比皆是。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农村姑娘贞德的抗英壮举，中国中英鸦片战争中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江浙人民的黑水党斗争，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人民战争，对于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所起的巨大作用等等，就是比较突出的例证。

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肯定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正像列宁说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集团本来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人构成的；如果全部抽去个人的活动，阶级、阶层、集团不但不能存在，而且整个的人类历史也就会变成纯属虚无了，但是，对于个人的历史作用，又必须区别开他们活动的性质，明确他们的活动是在推动着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的发展。

推动历史前进的，如古今中外的革命领袖、英雄豪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阻碍历史发展的则是那些历史上的反动人物，如革命叛徒、民族败类、阿谀奉承的佞臣、小人、阴谋家，以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之类。这里区别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看这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发展而动；是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还是违背了人民群众意见乃至压制人民群众的历史创举。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两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他们的结局，大致上说莫不如是！

因此，《大纲》明确地规定：“历史教学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也要阐明个人对历史进程的促进或延缓作用。”

三、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是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内容；它们导源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谈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要阐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首先，谈谈经济。关于经济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正是马克思的这个发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

《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4条中，明确地坚持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指出：“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教学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次，讲讲政治。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究其实质，即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问题。只有承认这种“反作用”，才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而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政治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它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而其核心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一个国家、一定时代的政治，无论是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还是阻碍当时的经济发展，都集中地表现在国家政权的反作用上。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突出的矛盾是代表封建旧贵族利益的斯图亚特王朝，阻碍着方兴未艾的英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便把革命的矛头，集中在推翻以查理一世为首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上，并最后通过“光荣革命”，确立起保护、巩固、发展资本主义利益的新的君主立宪制政权。在我国古代同样如此：当一个王朝政治清明、鼎旧革新、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就会发展繁荣，社会也会相对稳定，于是便出现诸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的国家大治局面；这个时候也往往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对亚洲乃至世界影响较大的时候。反之，一个王朝政治黑暗腐朽、封建割据一方、内乱不已的时候，经济就会衰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凋蔽惨象。

我们还必须明确，由于国家政权是各个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最集中反映和表现，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的矛盾和阶级的斗争问题。而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因此，《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5条中，明确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里，两者的矛盾又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历史教学要用相当的篇幅讲述政治方面的内容，并阐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大家知道，阶级内部往往又被分为不同的阶层或集团，而且它们之间也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斗争的，例如，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先进与落后腐朽之间的矛盾、斗争（如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与庶族寒门，北宋中期的变法集团与反变法保守集团）；表现为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间，以及地方割据势力彼此之间的矛盾、斗争（如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也有的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相互倾轧、残杀的斗争（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明初的“靖难之役”）。这些也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大纲》在强调历史教学要用相当的篇幅讲述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后，紧接着指出：“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教学中也应适当反映。”

最后，说说文化。新《大纲》与原《大纲》相比，文化史部分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是新《大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中，它专门用了一条阐述如何处理教学中文化方面的内容。

如前所述，按照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点，存在决定意识，文化首先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关于“反映”，如我国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便是当时经济关系与政治变革时代的产物；世界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那时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资产阶

级向封建旧势力斗争的结果，等等；“相对独立性”，如，我国的文学由《诗经》体、楚辞的“骚体”到东晋南北朝的“田园诗”，再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直至明清的章回小说，就自有其内在的继承革新关系和独特的发展规律；其宫如科技、哲学、史学、艺术、书法等的发展，也莫不如是。

同时，文化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如，战国后期韩非的法家思想对后来秦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奠定的重要理论基础作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卢梭、伏尔泰等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革命斗争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中的极其巨大的作用，则更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内容在《大纲》的《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6条中，都有明确阐述。《大纲》指出：“历史教学也应该重视文比方面的内容。”

第三，关于中国历史内容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这部分包括了“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7、8、9三条。

一、第7条，讲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我国有56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情和事实正是历史上所形成的；亦是历史教学讲授中国历史时必须阐述清楚的重要内容。

首先，《大纲》明确地指出：“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历史教学既要叙述汉族的历史及其贡献，同时也要叙述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贡献”。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教授民族史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夏商西周时的华夏与夷、狄、蛮、戎，到秦汉时的汉、匈奴、百越，后来的匈奴、鲜卑、羯、氏、羌，隋唐时的突厥、回纥、靺鞨、吐蕃、南诏，五代宋时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明清时的满洲，直到后来最终形成的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生活、繁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都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在我国历史上，国家曾经有过分裂，除去汉族的封建政权外，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少数民族的政权，比较突出的是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和辽宋夏金时期。但是，更多的时间，国家却是统一的；各个民族或是杂居或是分居，都直接地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之下，有着统一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辖。这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有的是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如秦、汉、隋、唐、明；有的则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如元和清。而且，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始终在不断地巩固与加强；到了清朝，在其统一的国家疆域里，50多个民族生活着，都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着各自的不同贡献。

在56个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历史上所居主要是在中原，政治、经济、文化都始终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而且对于其它民族的历史发展和进步，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汉族在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都处于主体的地位。但是，并不能够因此而忽视或否认其它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如，秦汉时期，秦汉统一了中原地区，匈奴族则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在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下，北魏鲜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并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促进了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加速了北方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辽、金的契丹族、女真族对北方地区，大理的云南各族对西南地区，西夏的党项族对西北地区，吐蕃族对西藏地区，满族对东北地区

等的经济发展，也都曾经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因此，“历史教学既要叙述汉族的历史及其贡献，同时也要叙述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贡献”。

其次，《大纲》依据历史事实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阐述了历史教学讲授民族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即“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里有几点应该予以注意：

1. 讲授民族史时，不应该只是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尤其不能只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体现各个民族都是兄弟民族，一律平等。

2. 历史上站在汉族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史学家，在史书中往往对少数民族多有污蔑、丑化之词。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民族史教学中都必须坚决地予以摒弃和批判。

3. 历史上凡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件、人物，如以和亲方式加强民族团结的呼韩邪单于、王昭君、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以勇敢开拓精神“通西域”的张骞、班超，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冯太后和孝文帝，毅然率领吐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屋巴锡，对形成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在历史教学中都应该给以充分肯定和赞颂。反之，历史上凡是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的人物，不论他是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则都要给以否定、斥责和鞭鞑。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既应该坚决地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也必须坚决地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再次，《大纲》明确地说明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历史教学应当充分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还存在着压迫、矛盾和斗争，对此，历史教学应作具体分析”。

前边讲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和两个“共同”，显然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这里的每一项都有大量的充分的历史事实可兹证明，不再予以赘述。但是，有一点要说明，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所以我国才得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主要内容”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便能够把握住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规律，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和党与国家的民族政策。

关于我国各个民族间曾经有过矛盾、斗争乃至战争，我们也毋庸讳言，因为这也是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但是，在叙述这部分内容时必须做到：

1. 指出这种民族间的压迫、矛盾、斗争乃至战争，与我国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彼此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事实相比，只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次要部分；因此，历史教学不应过多讲述，更不能大加渲染。

2. 说明这是阶级社会里的一种民族关系所特有的现象；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民族间的压迫、矛盾、斗争乃至战争，从根本上说，都是各个民族统治者所挑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阶级矛盾。

3.对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矛盾、斗争和战争，要做出具体的分析。有的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如女真族首领阿骨打领导的抗辽战争；有的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矛盾、斗争的性质，如淝水之战是东晋为了保卫江南先进经济发达地区和人民，不受北方氏族落后贵族侵扰、奴役的进步战争；有的是为了消灭割据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性质，如北魏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清朝乾隆帝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有的则纯属是一些民族统治者彼此之间的攻伐混战，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之间的一些战争，等等。做出具体分析以后，不但要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而且要明确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

二、第8条，关于认识和处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中外关系问题。

应该说，这一条原则适用于整个中国历史，但是，也必须指出，这里更多地还是说的古代中国的历史。

首先，如同《大纲》说的，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其中汉、唐、宋、元几朝尤为突出；因而我国能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亚洲以至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像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的外传，以及日本的“大化改新”深受唐代影响等事实，都是证明。这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

但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影响，又是互相的、“对等的”。新大纲较原大纲在这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注意到了中外关系的全面性，在讲完中国曾“对亚洲以至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接着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对我国产生过影响”。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传入，对我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唐代从印度取熬糖法；中国乐中的高丽乐来自朝鲜，等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例证。

三、第9条，讲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内容和处理时应遵循的原则。这里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点既是我国近现代历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宝贵经验教训的高度凝炼和总结，也是今天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强国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这条原则正如《大纲》所说的，是历史教学“应当着重”予以遵循的；而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亦应是历史教学所要“讲述的重点”。

第四，从“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10条到第13条，是专一叙述认识和处理世界历史内容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意见。原大纲在世界历史的这部分中，只有一条，讲得也比较概括；新大纲用了四条，且论述具体、细致。这一点是新大纲比原大纲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肯定了“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其不同程度的成就，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基本事实。但是，考虑到世界历史所涉及的地区、国家、民族甚多，内容十分丰富，又要条分缕析，保证突出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历史教学”只能“阐述各主要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依据他们的贡献和作用，恰当地反映他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二、指出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

首先，他们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与“和平相处”，不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构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教学应当着重地叙述这部分内容。

同时，各国、各民族之间也“有时发生战争”，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历史教学不仅“也要叙述”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应当“对其性质作出具体分析”。如，指出有的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有的是压迫、掠夺、奴役与反压迫、反掠夺、反奴役的民族解放战争；有的则是各国统治阶级之间挑起的争霸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而发动的世界大战，等等。

三、世界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了对落后的不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其野蛮性和血腥味耸人听闻。尤其是他们由自由资本主义阶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其侵略和掠夺、扩张就更为疯狂。这个历史事实正是造成现在世界上广大亚非拉地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贫穷和灾难的根源。《大纲》明确地指出：“历史教学应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

四、揭示了世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即“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都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其间含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更是这样。”对于这一规律，历史教学必须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予以阐述，并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中外历史，而且将有助于他们认识现实当中世界上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和变化，懂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必然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中关于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

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中学历史课程的重要任务、目的之一，《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以下简称“新大纲”）对之十分重视，而且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地吸收从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关于历史教学能力问题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听取了在第一线教学的老师们的意见，力求科学、合理，有利于教学的实际。如何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这部分内容，并将其贯彻在历史教学中，提高教学的质量，应该是当前历史课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仅谈些个人的学习体会和认识，以就教于同行。

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和要求

新大纲对于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较之原大纲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个“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认识。

第一，内容丰富、要求细致、层次分明

原大纲关于历史教学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只提出了一点，即“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新大纲则明确

地规定：“初中历史教学，要求教会学生初步掌握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新大纲关于历史教学的能力，清楚地提出了三个方面或说三个层次。

首先，是基本的学习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如，阅读历史教科书、识别与填充地图、利用与制作图表、口头及书面回答历史问题的能力等。具有这些能力，学生便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历史或者自学历史。

其次，是形式逻辑思维的能力。显然，这是学生学习历史、认识历史的很重要的能力。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已经看出，只有对于史实的了解，缺乏正确的思维能力，不能对历史做出分析和认识，便不能够算是真正地掌握了历史：“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文史通义》）。因此，从刘知几开始，就始终十分强调治史（包括学习历史），要有“史识”，也即是一定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指出惟此才能够对人类社会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识。

关于这种思维能力，新大纲指出有“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记忆”是掌握历史知识的前提；有了记忆能力、学会必要的记忆方法，学生才会掌握必要的具体历史事实，也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思维、认识历史，对历史得出一定的结论。“分析”和“综合”是一组思维方法的两个组成方面。分析，简单地说就是对历史“一分为二”，如1842年签订的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就可以被分析成“割地”、“赔款”、“开商埠”等项目；综合，则是将分析出的各项，逐条认识后加以综合观察，得出结论，如，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比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事物（含人物、事件、现象、概念）加以比较的思维方法。它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具有一般性和多样性这个特点的基础上的。通过比较就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一般性，也即其普遍存在的规律，同时，又能够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走过历史道路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即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比较思维一般地有四种：1.纵向比较，如比较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异同；2.横向比较，如将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作一比较，看一看它们的异同；3.宏观比较，如对从14—15世纪西方开始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等），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与中国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及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加以综合的整体的比较。比较只能得出历史现象、历史发展的异同，要想进一步得出对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深刻认识，还必须对比较的材料和结果加以概括，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同样，比较与概括也是一组彼此相联的思维方法，是一个思维方法的两个方面。

最后，是辩证思维的能力，即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应该说，这是历史教学需要发展、培养学生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能力。我们这样讲，是针对着前面两项能力而言。

1. 学生学习历史、表述历史的能力，谁都知道绝对不是一般的学习方法与表述方法，而必须紧密地联系、结合到历史的内容。如，要学会阅读历史教科书，就绝不仅仅是能够认字识词、划分文字的段落，而是要学会抓住书里的历史事实，理出条理，弄清这些史实的前因后果，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得出科学的历史结论。这里就必须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观点；人民群众与个人对历史发展所起作用的观点；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等等），并学会运用这些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惟此，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地阅读历史教科书，掌握了阅读历史书籍的能力。表述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样是如此。它也绝不仅仅是口头或书面的一般表达能力和方法，而是需要史论结合，既有叙述，又有分析地表述一切历史问题。叙述得清楚，要求会按照时间顺序及历史的内在联系，道出其始终本末；分析得深刻，就要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事实上，如果抽去了“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什么阅读能力、表述能力就和某些学科没有什么区别了。

2. 所谓“记忆、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的能力，其核心也还是要学生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如认识一个历史事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而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去作分析、去作比较，怎么能够真的对其本质认识得清楚和深刻呢？！如果使用的是错误的观点，那可能还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这正如恩格斯说的：“没有理论思维，就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因此，我们对于新大纲所提出来的历史教学发展、培养学生的三项能力，一定不要孤立地、平均地看待，而是要用联系的观点来看，看到它们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彼此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同时，也要分出层次来。学习历史、表述历史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学习方法问题，是第一层次的能力，而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则涉及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应该是最高层次的能力。

第二，对不同年级、不同的历史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这是新大纲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举。过去的几份历史教学大纲（1956、1962、1978、1987 等年颁布），都是只有关于历史课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总的一般的要求，而没有能对各个年级、各种历史内容提出更为具体的能力要求。这一点，在第一线教学的老师们感受最深，他们要求大纲把能力规定得尽量具体些，以便自己能在教学中有所遵循和参照。这次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从 1987 年一开始编订，即充分地考虑、尊重老师们的这些意见，除去在总的教学目的中规定了历史教学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外，于中国古代史（初一年级）、中国近现代史（初二年级）和世界历史（初三年级）中，都根据各段历史内容的不同特点和学生不同年级的心理特征、接受能力，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具体能力要求。如，同样是学生学习历史年代的能力、方法，在中国古代史中提出“正确计算历史年代。懂得公历纪年关于公元前和公元后年代的计算方法，公元年代与世纪的关系。了解重要的王朝纪年及公元纪年的关系。编制中国古代主要朝代顺序表”。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则规定：“正确计算年代。了解干支纪年的常识以及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学会编制简要的历史大事年表。”在世界历史中更

高地要求编制的历史大事年表，能够囊括世界历史上的大事，而且要比中国近现代史的“年表”，再详细一些。同样是学生表述历史的能力，在中国古代史中提出“能简要地复述教科书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能够解释重要的历史概念，回答一些浅显的思考题”。“对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初步运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并谈出自己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提出“在听课和阅读教科书的基础上，初步综合、归纳所学重要问题的史实，找出因果关系”；“比较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有关重大事件，在教师启发下，找出它们之间的主要异同点”；“在课堂讨论和小组发言中，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等。在世界历史中则进一步提出，“能够概括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简要的分析和评价”；“比较类似的中外历史事件，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并作出简单的结论”，等等。

我们不难看出，在各段历史、各个年级中关于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上，新大纲是充分地注意到了各段历史内容的特点，而且又十分地重视不同年级、不同年龄学生在发展、培养能力方面的可接受性和差异性，认真地做到把历史学科的体系和学生心理的体系统一起来。同时，新大纲也在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上，尽力地做到循序渐进，初中一年级比初中二年级要简单、容易一些，而初中三年级则又在前两个年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这既是符合了历史学科的特点，而且也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任务比作是“过河”，而把完成这项任务的途径、方法比作是乘“船”和搭“桥”。我们明确了新大纲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内容以后，紧接着便要解决这个“船”和“桥”的问题，要解决好历史教学如何地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它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

应该说，关于这一点，新大纲同样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提示。

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提出：“课堂教学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这也就是有的历史教师所说的一个“寓”字：寓能力的发展和培养于知识传授之中。这里要反对的就是脱离开丰富历史知识的传授，而去奢谈什么能力的发展、培养，搞什么“贴标签”、“喊口号”之类。

所谓历史教学要求传授给学生的基础历史知识，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学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即如列宁所说的，由不知到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而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实际上是指发展、培养学生认识历史乃至认识现实的能力。历史课不像物理和化学课尤其是劳作课和音体课那样，要培养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如物理、化学课的实验；劳作课的制作器物；音乐课的唱和体育课的跑、跳、运动技巧等。它主要是培养学生能够具有一种看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认识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实践论》中，把人类的活动归纳成不外乎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认识世界就包括着认识自己的历史。那么，传授知识与提高能力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把它说得透彻精辟。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

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明显地把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放在了第一位，而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的主观世界即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得到了改造，亦即得到了提高。改造和认识客观世界在先，随之才有了自己认识能力的改造，而且正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升华，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和培养。这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而反对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由此联系到历史课，当然也不例外，也是要在认识（传授基础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然后才以寓于其中的方式，真正地有自己认识历史能力的提高；同样地也是先认识，而后才有认识能力的发展与培养，也即是获得真正改造。可见，历史教学要想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就不能够离开历史知识的传授，恰恰相反，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必须以知识作为它的前提，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得以完成。

说到历史课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方法，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基础上的、人们时常提到的讲述、讲解、谈话、阅读与直观教具演示等所谓的“基本教学方法”。

讲述法不仅可以发展、培养学生叙述历史事实的能力，而且还能够提供历史思维的“素材”，为讲解历史打下基础。

讲解法是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关键。正是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式，使得学生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把分散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透过现象而认识历史的本质和它的发展规律。教师讲解历史知识的这个过程，也正是学生积极思维的过程和教会学生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思维方法的过程。学生能力的发展、培养，也就不言而喻地蕴含于其中了。

谈话法，无论是在讲授新知识时，让学生联系旧知识，还是给学生讲述史实，让他们自己去作分析、比较，得出结论，都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很大的启迪。这里还有在谈话过程中，由教师或其他同学对被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凡此种种，对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培养与提高，都是很有帮助和益处的。

阅读教科书法，也不仅仅是能够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籍、读物的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学会掌握书中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从而提高自己认识历史的能力。现在，已经国家教委审查通过的人教版、北师大、广东、四川等几套历史教科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强了观点，增加了史实，并且图文并茂，这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发展、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

直观教具演示法，能够极大地增强教学的生动形象性，为学生分析历史、认识历史提供更多的感性资料。这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性认识，并从中提高分析、观察人类历史的能力方面，比起单纯阅读教科书的文字或听教师的讲述，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的同志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学生观看一幅历史图画、一件历史实物模型乃至历史题材的幻灯、影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观察力。如果教师引导得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能力也会得到发展与培养。

另外，我们还应该重视新大纲的其他部分。因为它们往往能够给历史教学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启示。如《处理教学内容的若

干原则》，其中所列举的 13 条意见，都是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结合着古今中外的历史内容，从理论的高度，给予具体的阐述和论证的。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最为主要的方面。教师如果能够深刻理解、真正吃透这部分内容，再结合着中外各段具体的历史知识进行讲授，就会分析得格外清楚、透彻，从而给学生以科学观点和启迪，教会他们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去观察与分析问题，扎扎实实地提高他们科学认识历史的能力。

最后，还必须指出，历史教学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既要教师一课一课地去挖掘，使之渗透在自己的课堂教学、组织课外活动和指导学生作业，进行复习、考试中，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课的特点。它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是最重要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决不可以要求一挥而就、立竿见影，而是要在反复地讲解和训练中，才能够逐步地形成。如，培养学生学会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决不会只是通过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的历史就能够形成，而是需要通过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发展、演进历史，同时也还要在讲授一个新的社会从确立到巩固、发展、曲折、反复的过程中，得到牢固的启示而最终形成。这里也还有一个历史知识的系统化问题。如，关于认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就不是哪一课所能解决的，而是要从先秦的历史，尤其是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元、明、清等朝代或时期的历史讲授、学习中，才可得以最后形成。这就是知识的系统化问题。只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才能够真正全面地形成学生的某些观点，并进而发展、培养学生科学地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当然，历史教学的能力发展、培养，还不可能脱离现实，尤其是中外两个近代、现代历史就更是如此。学生常常是从学习历史中，获取了某些看待现实问题的能力，但是，也常常是由于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某些启迪，而后又反过来更好地体验了历史。由此看来，我们要想让学生通过历史课，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展、培养，不能只囿于历史课，有时需要立足现实，让学生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有时则需要联系到其它的课程，如语文、政治、地理课程等等。“封闭式”的历史教学在发展、培养学生的能力上，肯定是有弊而无害。

应该承认，关于历史课程发展、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虽然新大纲已经做出了十分明确而清晰的规定，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就可以“告一段落”而不必再进行下去。恰恰相反，新大纲为深入地研究和讨论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希望大家在学习、贯彻新大纲时，就这个问题展开更深的研究，进行更热烈的讨论，从而将其引向更高层次。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大纲和今后对大纲能够做出必要的订正，使之更臻成熟，显然都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节 历史教科书

一、历史教科书在历史课程中的地位

历史教科书，亦称历史课本，是依据历史教学大纲而编写的系统地反映历史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它在各种历史教材（如其它教师与学生用书）中居于核心和主要的地位。应该说，在中学历史课程中，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其直接的、主要的依据，便是历史教科书了。

众所周知，教学工作说到底其实是一个认识问题，是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和形式。说它“特殊”，除了它要有老师教、有固定的教学场所、班级、授课计划，以及复习、考试等等的特殊方式外，其所不同于人类其它人们（如研究者、一般人等）认识世界的地方，就在于它主要是要引导学生去认识人类已经掌握了的知识 and 已经认识了的问题，而不是让学生去寻求人类尚未认识问题的答案，因此，它才叫“学习”而不叫“研究”、“探索”。庄子说过：“我生有涯而知无涯”。人类正是通过教学工作，把自己已经掌握了的知识、积累的认识，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并一代又一代地为其增添出新的内容和光辉。历史教学亦然。它也是主要地要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尤其是史学家们）已经认识了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教科书就正是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到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和教学工作的规律、特点，从中挑选出最为基础的部分而编写的。因此，就历史教科书而言，它自然地成为学生在历史课程（注意，不包括课外历史教育）中获得对于人类历史认识和知识的最主要的途径和源泉。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二、编写体制

就世界而言，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制，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国家制或曰统编制。即由国家组织专业人员统一地编写一套历史教科书，然后规定全国各个地区、各级学校统一使用。说句笑话，即“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 1992 年以前，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就是采用的这种编写体制。

第二，审定制。各个单位乃至个人都可以编写历史教科书，但是却要最后经过国家的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只有“通过”了的才能够得以在全国使用。如，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便都要经过其文部省的审查，而后才可以使用的。

第三，认定制。由单位或个人随便都可以编写历史教科书，也不必经过什么审查，只要是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决定使用，便可以印行。如香港地区大体上即是如此。

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体制，是审定制与认定制的结合。国家教委确定了在编写教科书上实行“在统一要求下，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并且具体地组织、委托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四个单位编写出四套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从 1987 年底开始到 1993 年止，这四套历史教科书已经先后编写出来，并且都经过了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查通过，得以在全国试用。这体

现了审定制的精神。但是，究竟全国哪个地区、哪个学校具体落实到使用由哪个单位编写的哪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其权限却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领导部门的手里。这便是认定制了。

就目前实行的情况看，这种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体制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版本历史教科书的出台，适应了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尽平衡的现状，也体现了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中引进竞争机制的原则。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实行促进了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进步与提高。现在，多套历史教科书争奇斗艳，皆有创新，有所长，使得历史教科书的园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为了更好地贯彻我国目前实行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审定制与认定制相结合的这种新体制，使得多套历史教科书的质量和水平能够不断地提高，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如，关于多套历史教科书编写队伍的稳定与建设问题，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如前所述，建国后我国历史教科书一直采用的是统编制。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唯一的一家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社，各套统编历史教科书均是其历史编辑室不断编写和修订的。该编辑室历经 40 余年的努力，不但拥有了一支专业教科书编写队伍，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经验。应该说这是我国建国后历史教科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审定制代替了统编制，多套历史教科书代替了原来的一套历史教科书，与这相适应的则是多支历史教科书编写队伍的产生。现在，事实上虽然各套历史教科书编写人员的组成不同（如，北京师范大学版主要由历史系有关历史教育、中学历史教学的研究人员和中学历史老师、历史教研员组成；广东版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等高校教师、研究人员编写，同时注意吸收中学老师和历史教研员参加；四川版以中学历史教研员和部分西南师范大学的历史教师组成等），但是，都各有了一支自己的编写队伍，这些新的编写队伍组成的时间都不长（一般均为 1987 年以后组成，至今约六七年）；他们不但编写出了各套历史教科书，而且不断地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素质、水平和编写能力，都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创业的历程。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今后我国历史教科书中很宝贵的力量。但是，这些新的编写队伍，又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全部是业余组成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是教学或是研究，而且由于考虑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难度大和要求高，在组成这些队伍时，所挑选的人员都是大学或中学的教学、科研骨干，其原来本职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了。这样，对于这些新的编写队伍的组成人员，势必就有个时间和稳定的问题。都是业余编写，又要长期奋斗，锲而不舍，如何地使这样的队伍稳定下来而又不断地发展、提高和成熟，应该说，对于各支编写队伍都是一个很尖锐、很现实的考验。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多套历史教科书的继续改进、修订和提高就会有“釜底抽薪”、难以为继的威胁。因此，在教科书编写体制有了重大改革以后，还必须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以确保多套教科书编写队伍的稳定、繁荣，从而根本上保证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建设工作，能够有坚实的“后劲”，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制约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因素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它要求急、连续性强（一个

学期一本，不得停止）、时间（指发稿、出版印刷、运输）死，更为重要的是它既要注意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认知规律，要能够做到好教好学。这中间还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审查及广大历史老师在教学实践中的不断检验、提出意见，直到最后认可。因此，在整个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是要受着许多因素制约和决定的。我们将其归纳一下，大体上这些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其外部看，它要受到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培养总目标、学制特点、国家的经济与文化水准、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和决定。

第二，从其内部看，主要则是受着历史学科逻辑与学生年龄心理逻辑的制约和决定。

历史学科逻辑，指历史学科的体系、史观和史料等；其中始终贯彻了一个既吸收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又尽量地不把史学界的争论引入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1. 学科体系。

中学设置的历史课既然是一种学科课程，当然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依据历史学科所固有的内容和特点，对其进行设计与编排，借以完成这门课程所应该达到的目标。这也就要求我们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对于历史学科自身逻辑中的体系问题，给予充分注意，并且实实在在地处理和安排好。

首先，是叙述历史的时间顺序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述，多是将史实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加以排列的。例如，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有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以年代为经、以史事为纬的编年体和以表现史事的始终为特点的纪事本末体，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按照历史年代的时间顺序来排列其史实。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地把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表现出来，并通过时间的纽带，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进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就要遵循这个特点和规律，在安排其体系时，坚持按照时间顺序，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要先古代，再近代，最后是现代，即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顺序，加以编排。

当然，按照年代先后和时间顺序叙述历史，并不等于像旧史书的编年体那样，完全只是以年月日为经，在其下缀以发生的史事。这种体系还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之作过批评，认为其将历史事件的始末、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现象分得过碎，以致于使其首尾不相衔接，让人很难一下子看到它们的始终全貌。因此，历史教科书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的总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把同一类的史事适当地加以归纳，使学生更为清晰、简明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面貌。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基本上把它们分作一个个的朝代或者时期依次进行叙述。但是，在某一个朝代或时期中则要作些归纳，分作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以及文化等等专题予以叙述。因此，有的人也把这种体系称作新的纪事本末体。

可是，这种相对的专题归纳，其时间跨度却不宜过大。如，有的历史教科书把西汉与东汉合在一起叙述，分作“两汉的政治”、“两汉的经济”……等等专题，这就显然是归纳得有些过了。因为，从西汉建立（公元前203年）

到东汉灭亡（200年）中间有400多年，其中重要时期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如，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与奴婢问题，便与王莽建立新朝及其“改制”乃至随之爆发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汉的大地主田庄经济发展又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西汉前期“休养生息”的政策和东汉的“光武中兴”又都与各自那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跨度太大的归纳，势必人为地将这些“联系”、“关系”割裂得太厉害，使学生难以看到历史上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之间的必然因果关联，影响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点，北京市有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已经感觉到并有所反映。

其次，在处理历史学科体系时，要注意到历史的分期和断限问题。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一般地都更多地着眼于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以上所说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几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再小的分期如原始社会内部分作原始群时期、氏族公社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二分法、三分法……等，中国近代史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一般亦应该注意，但是也不一定太过于拘泥，有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是只分作“开端”（或“形成”）、“发展”和“衰落”几个时期即可。

在大的历史阶段的分期上，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是采用史学界比较公认的意见，尽量回避众说纷纭的争鸣。如，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就是采用了郭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说，而不用西周封建说或魏晋封建说。在历史分期上，历史教科书不断地吸收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如，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划分标志，以前都是定作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现在则根据史学界大多数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意见，将其定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断限问题，指历史的开始和下限。开始，一般以古人类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为准，如，中国历史以170万年前云南的元谋人作为开始，因为这种古人类属于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至于一些尚未定论的意见，历史教科书则应一律不取。如，曾经有人认为早于元谋人而在云南地区发现的“蝴蝶人”、“东方人”已属早期人类，应该以他们生活的时间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但是，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些化石尚不属于人类，应该算作“前人”阶段或属“正在进化中的人”，因此，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历史的上限问题上，就仍然坚持采用以元谋人作为其始。

历史的下限断在何时，这始终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个较大问题。一般地说，下限的决定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总是要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或者是曾经发生过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之作为下限的标志。2.要考虑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下限断得太早，将不利于学生通过历史的学习认识现实，即了解国情和面向世界。如，以前的世界历史下限断在70年代，内容仍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等，可是，近年来世界格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世界正由两极向多极变化等事实是现实世界的新情况，因此，为了注意历史与现实的衔接，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把世界历史的下限断在90年代初。3.要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我国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历史的下限上，许多年都是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来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但仅仅是寥寥几课，语焉不详，原因之一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段历史，史学界的研究还很不够。现在，随着这段历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关于

建国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文稿的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的报告，以及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问世、出版等，就使得中学历史教科书能够更好地把建国以后的历史写出来。现在的几套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部分，都已经大大地加强了，有的下限写到 90 年代初，有的下限一直写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再次，有个通史体系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关系的处理问题。

考虑到中学阶段要给学生以比较全面、完整的历史知识和进行全面历史教育的需要，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应该采用通史体系。这就要求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于人类历史一是能够贯通古今，一是能够囊括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现在，已经国家教委审查通过在全国试用的几套九年义务教育制历史教科书，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体系，完全突破了过去只讲革命史乃至只讲党史的做法，而是从编排题目到内容上都是大大增加了经济和文化等部分，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通史。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中国古代史只写成儒法斗争史；在过去左的思潮影响下，有的中国古代史只讲农民战争史等等的做法，更是早已被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摒弃了的。应该看到，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通史的体系编写，不仅是出于中学历史学科任务的需要，同时也是建国以来几十年正反经验教训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总结。

近些年来，关于如何在历史教科书中更好地体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是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历史教科书体系的一个很现实的课题。有的同志专门著文论述中外历史合编的好处，并寻求国外的和理论上的根据，其主要理由是：（1）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密不可分的，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讲世界历史时，如果不讲中国史，就会割断这种联系。（2）不搞中外历史合编，在世界史中不讲中国史，会让学生看不到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应有地位，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上海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亦在实践中作了这种中外历史合编的尝试。听台湾地区的学者谈，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中，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分编，还是合编，也是一个争论很大、意见分歧的问题。

现在，编写的几套全国通用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历史教科书，都没有采纳这种中外合编、“中西合璧”的编写方法和体系，而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开编写；中国历史四册，世界历史两册。所以采用这种体系，归纳起来，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历史科学的体系与历史教学的体系，既有其一致性，也是有区别的。从历史科学看，中国历史确实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却可以有着自己的体系安排，完全可以分着讲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这是因为在教学中有教学的任务、目的和教学的对象以及其自身规律等等的因素和考虑。如，中国历史的教学就有让学生认识国情，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让学生汲取祖国的历史遗产，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陶冶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如果中外合编，把中国历史完全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学生的历史教学势必就会只有世界历史的教学任务和目

的，而无形中则是削弱乃至取消如上的中国历史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目的。

第二，谈到中外历史的联系，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在古代（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联系由于受到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局限，是十分有限的，可有可无，更谈不上什么密不可分，其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一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独立发展的状况。只是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后，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才从此“密不可分”，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再要“闭关锁国”、与世隔绝，都是不可能的了。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扩张，把西方与东方乃至把西方与非洲、拉丁美洲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世界各地失去了完全“闭关”，只是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基于这个认识，在古代史中硬要把中外历史合编，意义并不大，弄不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拼盘”而已；而在近代史中，如果把中外历史合编在一起，一定会是中国历史附属于西方历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始终处于被西方列强所支配的状况。这就不是突出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反而会大大地削弱中国历史；同时，也很难给学生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系统、完整的认识，其结果是把中国历史“化”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显然，这种体系既不利于突出中国历史，更不利于学生对于自己祖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事实上，现在就我们所知，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都是不但要独立地讲授本国历史，而且从课时和内容上还都要把本国历史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这些国家的考虑和做法，我们不能不说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从体系结构的安排上，中外历史合编也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主张中外历史合编的同志也都认为合编中的中国史部分的课时不能太削弱了；事实上，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硬作削弱恐怕也很难做到。这样，势必就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各国历史的份量在搭配上孰重孰轻极不相称，以至于很不协调的状况。如，在原始社会历史中，整个世界的原始社会才讲1课时，中国的原始社会却要讲至少两课时；在奴隶社会历史中，古代东方各国的份量都是各占1课时，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历史（夏、商、西周、春秋）却至少要讲5—6课时。尤其是封建社会部分的历史，亚洲的各国（朝鲜、日本、阿拉伯等）每国都是1—2课时，中国部分却要讲到50课时以上。这样的一本历史教科书编出来，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而且老师又将如何去教，学生又将如何去学呢？！他们又从中怎样去获得系统完整的历史知识，清晰地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了解其发展规律呢？！

第四，不搞中外历史合编其实同样可以解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联系以及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上所占的应有地位问题。其做法是，在古代部分，讲中国史时，每个时期都实事求是地讲出当时的中外关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中看到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及对于世界文明的的重大贡献；讲世界史时，遇到与中国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时，也如实地将其写上，以突出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影响。如，讲日本“大化改新”时，必然要写上中国唐朝政治制度和文化对于它的深刻影响；讲朝鲜“壬辰战争”时，必须写上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明朝政府出兵朝鲜，中朝两国军民共同抗击了日本侵略朝鲜的事实；在讲阿拉伯历史时，也一定要讲到它沟通中西文化的重大作用，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将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的发明传播到了西欧。在近代史部分，每当讲到中国历

史上的重大事件时，都会先向学生介绍当时的“国际背景”（实际即是当时世界史的相关内容）及其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在讲世界历史时，也必然要在相关的部分中，讲到当时的中国，如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定要讲中国北洋政府的参战和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如何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的地位而瓜分中国的事实，以及这一强盗行径如何激起了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导致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等史实。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时，也必须讲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及其对于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至于这样做是否会导致讲世界史时与中国史的有关部分出现重复，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编写技巧问题。如，中国史部分可以详讲某些历史事实的本身，而在世界史中，则更多地去讲当时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和作用，以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及与世界史联系的方面。现在，几套已经国家教委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这样处理的，从编写和教学实践看，这样做是可行的，而且能够起到让学生通过中外联系和中外比较，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目的。

最后，有两点应该说明一下：

第一，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学科体系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历史科学自身的体系所决定和制约的，因此，要编好中学历史教科书就要具有较深的关于历史科学专业的素质和修养，还要不断地了解、研究历史科学的发展，及时地吸取它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这其实也正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一次性编写完成，永不修订，一成不变，而是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地加以更新的重要根据之一。

第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学科体系，同时也必然地要受到现行中学学制、历史教学任务与目的，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等等的影响。如，就普通中学而言，初中与高中的学科体系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初中偏于中国与世界的通史体系，高中就目前看，可以是通史的体系，也可以在初中学生学习历史的基础上，搞一下历史专题的体系试验，尤其是在选修性的历史课中，其学科体系可以具有更大些的灵活性。至于其它一些性质的学校如中等师范、中专、职高等，其历史教科书的学科体系与普通高中应该有些什么相同和区别，具备哪些自己的专业需要和特色，一直是现在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很关注的一个课题，显然，今后仍然应该对之加强研究和实验。

2. 史观。史观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史书的根本问题之一。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成管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实际上表明了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的唯物史观因素；而旧史书中普遍存在的对帝王神化、“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的描述，则是从“神”出发和渲染英雄创造历史等唯心史观的很典型的反映。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明确地规定，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是历史教科书驾驭史料的最科学的史观。这一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明确地指出。有的历史教科书出现某些问题即在于此。如“文革”中和“文革”以前一段时间，史学界有一股“左”的思潮，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受到了影响。有的教科书在中国古代史中，仅仅讲或主要讲阶级斗争，提出“以农民战争为线讲中国古代史”；“文革”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有的历史教科书又走向了另一端，尽量地削弱农民战争

的历史，结果不仅不符合阶级社会，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同时对于一些封建盛世的出现也缺乏有力的解释。凡此，实际上都应该是史观的问题。在编写历史教科书中，诸如如何处理一些历史事件（像改革、革命、战争等），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如放在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中评价人物，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评价人物等），讲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也都会碰到史观问题。显然，只有以科学、正确的史观指导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才可以给学生以科学的历史知识，培养他们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且向其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思想教育。

3. 史料。史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从客观历史上升到史学的中间媒介，因此，它是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唯一源泉。这一点在前述章节中已经有所论述。现在，各套新编历史教科书都十分地重视史料问题，尽量地做到史论结合，“寓论于史”，“让史实说话”。这与原历史教科书大多是些论断、结论而很少史料，被有的老师称之为“压缩饼干”的情况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历史教科书对于史料的要求，应该是很严格的。这亦是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一个重要学风问题。

首先，所选择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准确的，经过慎重考据过的，既有科学性，又有思想性。

其次，所选用的史料应该具有典型性，能够加深说明历史问题，帮助历史教学的任务、目的得以全面地贯彻、完成。

再次，所选入的史料必须是适量的，不可把大量的史料一味地“塞入”教科书中，加重学生的负担。如选用原始文献资料，还必须考虑学生的阅读能力，必要的要有注释或今译。

最后，史料应取最新发现的或是经过最新考据证实的，即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如，以前历史教科书讲到我国西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大都引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武帝时期的“灞桥纸”，现在则几乎都摒弃此条材料而征引考古新发现的汉文帝、景帝时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纸。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写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投入的兵力，都说是 40 万，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则依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改为 20 多万人。

关于在历史教科书中选择史料，尤其是否要编入大量的历史原始文献资料，怎样引入这些原始资料，以及是否要把史学界的不同争论意见引到历史教科书里，目前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如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就基本上几种做法都有；但是，其主流似乎是倾向于较少运用一些编者的语言叙述和表明自己对历史的评价、看法，而较多地征引历史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资料。

1994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德历史教科书第三次交流会上，德国汉诺威大学马利恩费尔德教授的论文及大会发言《德国历史教科书的种类及其发展》，比较系统、具体地介绍了德国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方法上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主流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先从宏观上介绍说：“综观全德历史教科书，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大类：一，教科书和学习用书；二，练习手册；三，学练综合用书。大体上讲，这三类主要的教科书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50 年代和 60 年代，主要盛行教科书和学习用书，这类书往往都会附上‘历史梗概’；70 年代又出现了‘向历史提问’这一类练习手册；将教科书和

练习手册合二为一的教科书（如‘历史书’）则兴起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此类书是目前的主流。”

然后，在论文和发言中分别阐述了这三类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关于“教科书和学习用书”类历史教科书，他介绍说：“教科书和学习用书：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教科书书名大都叫‘历史概论’或‘历史梗概’。从这些教科书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编者想向学生传授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也就是说，按照学生一般的抽象语言（像教科书的范文那样），根据课时，削减内容或减少那些有争议的题材。尽管受这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上述教科书中的材料还是相当丰富的。丰富的材料说明，编者想简要地介绍一些重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书中，编者所写的东西仍大大超过了原始资料文。如在整个章节的 500 行中，原始资料文只占了 15 行，这就是说，编者所写的东西与原始资料文的比例为 97：3。每章后根本没有思考题。即使这些思考题在书中的另一处或另一些书中出现。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并没有考虑到去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自我判断的能力，文后的注释以及那些为文章内容服务的插图更是这样。文中没将获取知识的过程和从原始资料文中得出概念和评价的方法写清；同时也缺少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也就是说，缺少介绍对一些历史事件不同看法的例子。书中所谈观点几乎千篇一律，并要求学生接受这些观点。这种教科书和学习用书从教材的设计上就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灌输式或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这类教科书主要是为普通中学和实科中学及文理中学的初级历史课编写的，作者试图用讲故事的办法，通过讲述个别人物的所作所为和生活遭遇来学习历史。《回顾过去》（1957—1961）或《我们经历历史》（1961—1966）是这类历史阅读书的代表作。这类涉及各级各类学校的阅读书今天已不复存在，尽管人们今天仍能买到书名为《回顾历史》的教科书。同第一版相比，编写思路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必需看到，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在编写低年级教科书时特别注意多使用叙述性章节，少使用叙述性原始资料、由编者撰写的（人物）生平或少儿历史小说中的文章。”

对于“练习手册”一类的历史教科书，作者指出：“从它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教学方向是什么。如《向历史提问》，书名就已说明，学生获取历史知识，不是通过被动地接受已有的东西，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知识，得出看法，作出评价。这种教学思路以发现或探索中求知这一原则为准绳，将中学里的学习与将来大学里的研究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发现中求知的教学指导思想是，在教科书中不采用从头到尾讲述历史过程，重点放在大量的原始资料、原始课文、原始图片、图例和地图上，并围绕这些材料出思考题。编者的引言或说是导言只是一个指导作用，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怎样正确使用原始材料，决不事先定条条框框。”他下边举了中国史部分的内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现在我们就将《向历史提问》第四册的‘中国，一章作为例子。本章由 10 篇原始资料文，6 幅画和插图及一幅地图组成。为了使学生能从中获取知识，向他们提出了 6 个问题。显然，编者所写的东西还不足整个章节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大量的原始资料，那些画也起到了一种新的作用，即这些画不仅仅只起到了插图的作用，而且还起到原始资料画的作用。科学研究揭示了历史，人们应自觉地向历史发展的遗产提出问题，用妥善的方法，在足够的证据中去寻找答案。”对于这种历史教科书，马利恩费尔德的评价是：它比较重视“方法学”，“方法学的问题在教

教科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原始资料进行比较，使用不同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介绍一些早期的或其他国家的教科书的内容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对历史学和对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建设性的和批判性的态度。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他称此为“发现中求知的教学法”，认为这种让学生“创造性地获取历史知识，对决定历史的重大变化过程进行思考和评价的中心思想是希望人们能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时也要借鉴历史。显然，以练习手册为基础的课堂有别于以教科书和学习用书为基础的课堂。教师不是以一副科学权威的样子向学生讲述历史，而是一个自学组织者，让学生在自学中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如果说教科书和学习用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话，那练习手册则是以学生为中心。”关于这种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他也依据其实践的结果，指出：“在实际课堂教学中，纯练习手册的教学方法思路证明是不太符合实际，但这并不是说练习课似乎证明它原则上无法满足所提出的任务。在一种试图达到的理想形式中，练习课显得特别地化费时间。为此，就只好大量地删减内容。其结果是历史的空白点增加，因练习手册无法写那些前后历史相联贯的东西。同样，历史课的课时也只能削减。对此，人们只好面对现实，更加注意各类学校所能达到的教学目标。只对原始资料进行解释的课堂又面临方法单调的危险，因此，学生的兴趣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受到影响，最终，教学生如何进行科学工作的课堂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关于“学练综合用书”式的历史教科书，马利恩费尔德认为它是“新一代教科书”。其特点为“编者在书中极力主张要写完整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此种方法又回到了 50 年代的教学法模式。课文部分决不是一种不可怀疑的学习知识，原则上讲，这一部分只是在方法上开个头，它使认识过程问题化，说的话也模棱两可，将原始资料放入参考资料，尽可能避免那些无争辩意义的语言”。如何在这类教科书中纳入原始资料，方式是不同的。一般地是采用一种“组合模式”：“课文将学生引入事先对内容不作任何规定的原始资料文，让学生通过思考题来理解原始资料的内容。”其形式丰富多彩，“有些是用不同的颜色，有些是用不同的字体或符号”；而且一般地“在使用这类教科书时可安排练习课。在这类练习课中，因将原始资料文融入了课文，就不会使历史显得松散，更不会出现历史的空白”。

他在论文和发言中进一步介绍说：“最近几年，在学练综合用书中又出现了一种分离的模式，即将课文部分与原始资料部分明确地分开。这类例子我们可在 1986 年以来出版的‘历史书’中找到。这一代教科书采用了可比较的结构，三种成分在各册的概论中清晰可见。”

“每章都有一个‘开章篇’，全书图文并茂。开章篇的目的是武装学生的头脑，使学生对积极参与讨论这一章里所涉及的历史问题产生兴趣。要提高学生的兴趣，可让学生紧密联系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强调这一题材和内容在历史以及现实政治中的作用，谈谈这一题材和内容的中心问题以及讲解一些与此有关的基本概念。对其后所开展的讨论也应以这种方式设计和进行。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他们积极思考”。“开章篇后是课文。在每章中，课文之后便是练习部分。练习部分由几篇原始资料，有时也伴有原始图片组成。采用不同的颜色，将书中的各部分加以区别，黄色表示课文部分，蓝色表示练习部分。练习部分约占全章总容量的四分之一。……凡在原始资料文中出现过的内容课文部分不再重复。原始资料文只集中在一个专题上，

这一专题与课文部分有着事实上的紧密联系，要能独立提问，要求学习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加深对问题的理解。练习部分可确定不同的重点。可采用传记式的日常生活史，如用某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一些重要的政策。……如第三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眼中的战争责任问题’；还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如介绍某种政治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像第四册‘1945年后的世界’一章就是这样（本章重点讲了东西方的分裂和军事同盟的形式），有‘联合国：是和平的保障还是多余的机构？’第三册中的‘国际政策和帝国主义’一章（这一章中主要讲了民族的使命意识）也提出：‘难道非洲没有文化吗？——古尼日利亚的艺术’。”

“在有关东亚的两章中，编者试图利用原始资料，通过对有关题材的讨论，使学生对专门的和对他们来说并不平常的事情有所了解。在第一章中（1919—1945），重点写了日本。编者想通过练习部分中的原始资料使欧洲人看到，日本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与众不同，这点尤其表现在公司颂歌上。在第二章中（1945年后）则把重点放在了中。练习部分包括中国教育事业的原始资料，在这部分中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课文部分就是按两条路线的斗争写的。……政策对学校和教育的作用给学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鼓励学生的动力，因为这种作用涉及到他们个人的生活和经历。因此，思考题特别要求学生作一比较。在练习部分附上原始资料，可使学生对每一个有关题材的特殊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对于上述两种“学练综合用书”中引用原始资料的不同方式，马利恩费尔德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前者“将原始资料文插入课文，似乎会出现一种僵硬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原始资料文证明了编者在设计这一章节时就已得出的结论。这样，行动的其它可能性，相互矛盾的原始材料证据和不同的看法等等就无法考虑到了”。但是，它能够“确保了在课堂上使用原始资料，因为书迫使你不断地更换从课文中获取的知识和观点，也迫使你从原始资料中得出新的知识和观点”。对于后者，他认为由于“将原始资料专题化和集中化”，因此比起前者，“对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的多层次看法，对观察和评价历史的多种观点”显然要“清楚得多”。可是，这种模式也有问题，即势必“课堂将重点放在课文部分，原始资料部分受到忽视，这就完全符合了老师提出的‘你们可以自己在家看嘛’的要求”。最后，作者表示：“究竟哪种模式能行得通，我本人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复。可以肯定的是，学练综合用书在今后几年中还不会失去其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典范作用，但也不能排除会将融合使用原始资料和分开使用原始资料的办法结合起来。”

我在会上也印发了论文，并在大会上作为“中方”发言，除了介绍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和模式外，专门重点他讲了关于历史教科书在引用原始资料和对历史学界不同意见的考虑和做法，其中与德国的历史教科书有异有同。现把我的论文、发言（含大会发言后，答辩德方的提问）的这部分摘录于下，以供读者们进行比较，参考。

综观现在全国通用的几套中国历史教科书，归纳起来，在其编写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教科书，在正文中对于历史的进程及面貌，基本上是用编者的语言加以组织编写、表述的。这一点很像德国马利恩费尔德教授介绍的德

国第一大类的“教科书和学习用书”的编写方法。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编写、表述，既包含对于历史事实客观的叙述和描写，也包含教科书编者对于这些历史的恰当的说明、分析和评价。我们称这种方法为“寓论于史”和“夹叙夹议”的方法。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版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上册的“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一课，首先是写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马丁·路德于1517年起来反对‘免罪符’，倡导宗教改革，得到广泛响应；当时，天主教会……胡说买了免罪符，把钱投入钱柜中发出了丁当响声时，‘罪’就得到了‘赦免’，灵魂应声飞升天堂。马丁·路德起草了名为《关于免罪符效能的辩论》即95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口，揭穿说：教皇没有赦免任何人罪的权力，钱币入柜丁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对财富的贪欲。路德的论纲，是向全德国‘放出的闪电’，一下子‘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后来，许多地区的教会特权被废止，建立了不受教皇管辖的新教会。”然后，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教科书联系到课文中写的关于16世纪初期德国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尤其是广大的“市民阶级，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包括新兴起的手工业场主、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处于无权地位”，以及罗马教皇把德国当作“教皇的乳牛”，肆无忌惮地掠夺德国的财富，因而教皇成为德国市民阶级十分痛恨憎恶的对象等事实，向学生分析并得出结论：这场斗争是以“宗教改革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是马丁·路德”。

第二，在教科书的课文中引用一定的原始资料，但是，引用得不是很多，更不是只编或者主要是编原始资料和练习题，而代替由编者撰写的课文。作为引用原始资料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和马利恩费尔德讲的德国“学练综合用书”类型的引用原始资料的方法有些相像，只是不用不同颜色的字体进行表现，而是或者把原始资料插入课文叙述当中，边叙述历史，边在恰当的地方插引一段原始资料，使之与课文融合成一个整体；或者是专门用花边等方式把原始资料单独写出、标明，排放在页内某一个部位。历史教科书的课文也引用某些不同“意见”的原始资料，如明明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但是，他们却常常要找一个“借口”，如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区东北，就是“借口”所谓中国人炸毁南满铁路等；对于这些我们在教科书里并不回避，而是引用，但是，在引用时一定要指明这些“借口”的真相（如所谓柳条沟事件、中国人炸毁南满铁路，实际完全是由日本关东军预谋导演的），以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第三，一般地，不把历史研究专家、学者们争论的问题，写入历史教科书；而是在教科书里选取那些已经为大多数史学界所公认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和看法。

所以采用以上的方法和形式，编写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想法和原因：

第一，考虑到历史课程的目的重要的是给学生以历史基础知识，而历史基础知识应该是既包括着史实（含原始资料），同时也包括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即对历史的分析、说明和评价。就是历史原始资料，其实它本身也都是包括了当时“编写”、“撰述”这些“资料”的人（如历史上下诏令的皇帝、写奏章的臣下、制定法律条文的政府以及编著史书的史学家等）的观点和看法，而我们现在编写教科书，选取什么原始资料，要这条或不要那条，也是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历史是客观的，其中的是非曲直也是客观的，像德国同行们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我们认为是有公论的，因此，在对立的原始资料中总会有一种是对的，如果只是摆上各种原始资料（尤其是彼此“对立”的原始材料），而不作分析，不告诉学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结果完全可能使学生在“材料”面前不知所措，甚至把错的（它常常总是要“伪装”自己，以迷惑人们）当成对的，变得糊涂，而最终不能够掌握正确的历史知识。作为教科书的编写

者和历史老师是应该对学生负责的。至于要不要把史学界对于历史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引入教科书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学生的更多思考，有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但是，一定要看到学生在学校学习历史课程，最主要的任务、目的是接受和学习历史学者们经过多少代艰苦研究而获得的史学成果，并不是要他们抛开这些成果，而去自己进行什么探索与研究，否则就是混淆了学习历史课程与研究史学二者的根本界限。况且中小学生的年龄小、社会经验少、知识面窄，加上其心理发展的特点（如初中和小学学生的形象思维较好，但是理论、抽象思维却较差等），让他们也像史学家们那样能够从众多的原始资料和众说纷纭的争鸣意见中，独立地对历史“发现”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是很困难的。另外，我们知道中小学历史课的课时是有限的，历史教科书的篇幅也是有限的，可是史学界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却是“无限”的，一是问题多，二是就一个问题讲分歧意见亦多，这样，我们究竟选择哪些争论意见写入教科书里，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第二，关于原始资料的引用，有三点情况亦须考虑：一是，这些资料比较零碎，如果引用过多，或者只选原始资料，而不由教科书编者对之加以一番整理、加工，然后用学生能够接受的语言编写出来，学生势必很难从教科书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貌，完整系统地认识中外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二是，原始资料由于时代的限制，今天学生读起来，并非没有困难，如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都是古文，学生就很难读懂；因此，历史教科书如果引用过多，也会给学生带来阅读上的障碍。三是，必须说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在引用原始材料上，也是随着学生的年级高低和对他们的培养方向而有区别的，并非一成不变。如，高中三年级准备报考文科的学生，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上就明显地加强了。高考历史试题中“原始资料分析”题型的日益增多即是明证。如引一段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关于把唐代由盛转衰的原因归罪于杨贵妃的话，让学生分析其正误并讲出道理，就是一例。因此，有的德国同行认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不引原始资料，尤其不引不同意见的资料，是由于过低地估计了学生识别力的意见，是一种误解。

学生年龄心理逻辑，实际上是指的学生按照其年龄心理的特点，对于历史知识的可接受性和如何使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问题，从现行几套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实践看，大致上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这个问题的：

1. 根据学生的不同年级和不同年龄，掌握好历史知识的层次性。如，中国古代史中在小学阶段根本不涉及国家的封建制度问题，而在初中阶段则主要是讲些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演变和发展；选官的科举制度产生与发展等），而不去讲述学生不太好理解的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到了高中阶段则不但要讲政治制度（比初中更细更深一些），而且要比系统地交待给学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发展脉络。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亦是如此。小学历史课本讲到“大教育家孔子”时，就是写他一生从事教育的事迹，如创办私学、教授出许多学生、总结了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等；初中的历史教科书讲孔子时就不仅仅是写他的教育业绩，还要写他创立儒家学派和“仁”与“礼”的政治思想，写他删订《诗》、《书》、《礼》、《易》、《乐》和编写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从而对整理古代典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

以上关于中德历史教科书第三次交流会上双方的意见，在《历史教学》1995年第5期以论文发表。本书这部分在文字上有修改。

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时是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而确定其知识层次的。

2. 把握住历史知识的头绪多寡，以适应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如，小学历史课本于中国古代史中在每个重要的朝代里只是选取其一二个“点”，组成一课课文，以为教授学生的内容，而到了中学阶段则虽然依旧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朝代的更迭，但是，于每个朝代的历史内容中则大体上都要照顾到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又都涉及到了更多的事件、人物、制度、现象和概念。很明白，小学阶段与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在掌握历史知识头绪的多寡上，其差异、区别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中学阶段，历史教科书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头绪上也是十分注意的，决不能够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加重学生的负担。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写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一课时，对于兵书部分就是重点他讲述了《孙子兵法》，而于《孙臆兵法》则主要是以一句“战国时的军事家孙臆，继承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写有《孙臆兵法》”，轻轻带过，这里，《孙臆兵法》知识点的头绪比之于《孙子兵法》，显然地是少多了。

3. 省略时间（年代）、地点和人名，简练教科书内容，减轻学生的负担。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即是以“能不出现年代、地名的就不出现”，“须要出现年代，可以不出现月、日的，就只出现年不出现月、日”，“能用‘次年’、‘第二年’等的就不必标出具体的年代”，“人物要分轻重，重要的人物不但出现人名还要讲其事迹，次要的人物只出现人名而已，可出现可不出现的人名坚决不出现”等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4. 把史实、史料部分分出层次，其中重要的写入课文正文或以大字体体现，以示教师必须讲，学生必须记忆；次要的则以注释、小字（或不同字体）表现，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不必记忆；再次要的（如历史文献原文）以小方框框住学生阅读参考；有的还把有些史实编入“阅读材料”，只需学生课外阅读，课堂教学中完全可以不予涉及。这样，就使学生对于课文中的史料明确了轻重缓急，知道哪些史料必须记忆、掌握，哪些史料只是了解一下即可，并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学习教科书课文的深度、广度，体现出一定的“因材施教”和“弹性”。

5. 在习题中要体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由记忆具体知识到学会分析、归纳所学内容的特点，使学生的能力培养逐步地加深，而不是超越其年龄心理特点，忘记了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

四、历史教科书的内部结构

原历史教科书的结构比较简单，与之相比，新编各套历史教科书在内部结构上则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主要是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既要使得教科书的形式活泼些，增加可读性，同时，使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在学生的学习上发挥其不同的功能，提高教科书在学生的历史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及思想教育诸方面的实际效果。

新编几套历史教科书就其内部结构看，一般地都包括了教科书前的目录、全册书后的“历史大事年表”。教科书中每一课（或是章、节）中，又都有文字部分和插图部分（含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其中，文字部分是主

要的，占据了一课（或章、节）的大部分篇幅，包含有“内容提要”、“正文”、“注释”和“习题”几个部分。有的版本教科书的文字部分附有一些历史原始资料。有的版本教科书还专门附有“阅读材料”，每隔三课一篇，供学生在课外时间里学习，如，北京师范大学版的历史教科书在其《世界历史》下册中即编有“阅读材料”《詹西女王》、《凡尔登“绞肉机”》、《圣雄甘地》、《莱比锡审判》、《血战西班牙》、《诺曼底登陆》、《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等。

如上历史教科书内部结构的不同部分，其在教学中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因此在教学中如何地利用它和对之采用什么样的教法，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俗话说，“开什么锁，须用什么样的钥匙。”

1. 课文的文字部分

这个部分是历史教科书的核心部分，有关的历史内容主要是通过这部分文字传递给学生。对于教科书课文的文字部分，基本的教学方法是讲述和讲解。讲述是针对其属于史实的内容，讲解则是在史实讲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方法，帮助学生真正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把握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以前边引述的世界历史上关于德国的“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为例，历史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版）首先写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马丁·路德于1517年起反对‘免罪符’，倡导宗教改革，得到广泛响应”；当时，“天主教会……胡说买了免罪符，把钱投入钱柜中发出了丁当响声时，‘罪’就得到了‘赦免’，灵魂应声飞升天堂。马丁·路德起草了名为《关于免罪符效能的辩论》即95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口，揭穿说：教皇没有赦免任何人罪的权力，钱币入柜丁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对钱财的贪欲。路德的论纲，是向全德国‘放出的闪电’，一下子‘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后来，许多地区的教会特权被废止，建立了不受教皇管辖的新教会”。对于这段史实，教师显然就要使用叙述、描述和概述的“讲述”方法，向学生交待清楚，让学生仿佛又回到那个时代，了解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会、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新教会”的过程和它的某些细节。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下，教师就可以进一步地联系到课文中写的关于16世纪初期德国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广大的“市民阶级，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包括新兴起的手工工场主、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处于无权地位”，以及罗马教皇把德国当作“教皇的乳牛”，肆无忌惮地掠夺德国的财富，因而教皇成为德国市民阶级十分痛恨憎恶的对象等事实，向学生分析并得出结论：这场斗争是以宗教改革形式出现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运动；马丁·路德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导人。这种方法即是讲解了。

考虑到学生的负担，现在几套全国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课文的文字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史实部分，往往采取分清主次、突出重点、适当“分解”的办法。有的教科书（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广东、四川的三种版本）是用不同的印刷体或大小字加以区别；有的教科书（如北京师范大学版）则是用正文与注释来加以区别。其中的大字部分或正文部分，要求教师要讲授，学生必须掌握；而小字或注释的部分，只要求学生阅读，无需记忆。教师在讲授时，对于这两个不同要求的部分，是应该予以区别对待的。有的部分（大字或正文）需要详讲，讲深讲透；有的部分（小字或注释）则可以略讲或者不讲。

但是，也必须看到，有的教科书的小字部分或注释部分的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它们往往有助于很好地理解大字部分或者正文部分的重要史实，如，北京师范大学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在讲到商朝的青铜器时，在正文中只是简略地写到：“商朝的手工业部门繁多，……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商朝的青铜器制造业”；而在注释中则具体地介绍了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一定比例的锡、铅做成的合金。在摄氏 1000 度左右的高温下，青铜被熔化为液体，灌入各式各样的陶范里，制出种类繁多的青铜器。青铜器质地坚硬，表面闪烁着青蓝色的耀眼光芒。”在讲到那时候的青铜器精美绝伦时，正文中举出典型的青铜器制品为例，说：“在商朝的青铜器中，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尤为著名，都是举世罕见的青铜珍品。”这段文字明显地过于概括，于是在注释中对这两件青铜器珍品专门做了生动形象的补充介绍：“‘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高 1.33 米，长 1.1 米，宽 0.78 米，重 875 公斤，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四羊方尊高 0.583 米，重 34.5 公斤，为现存商朝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方尊周身铸满龙、凤、兽面等花纹，腹部四角分别铸有 4 只大卷角羊，是一件设计巧妙，造型精美的青铜珍品。”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老师还只是拘泥于就讲正文而不去顾及注释的话，显然学生就很难对商朝的青铜器有个确切的印象。这就需要教师在充分他讲述正文的同时，也要讲述注释的内容。当然，方法可以是灵活多样的，或是采用让学生在课堂上阅读的形式，也可以径直地由教师自己给学生讲述。

前述，有的版本的教科书还在每课课文里，直接引用了少量的历史原始文献资料，让学生接触一点史料的原文。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历史》第二册“唐朝前期的繁盛”一章里，就引用了这样的三段资料。其中的一段是在课文正文中讲到“唐太宗治国，很注重纳谏。他认为，只有大臣敢于直言进谏，才能够弥补和纠正皇帝决策过程中的过失。……魏征先后进谏 200 多次，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重用”时，征引的唐太宗著名佳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殁逝，遂亡一镜矣！”对于这些原始资料，教科书并不要求学生必须记忆，只是供他们阅读。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却可以在讲述正文时结合着征引这些史实，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加深人物的生动形象。有些原始资料主要是偏重于道德品质的懿言警句，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历史》第一册中引用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葛亮在《诫子篇》中说的“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和在第二册中引用文天祥《正气歌》中的“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等，教师可以不必非要结合着课文正文讲述，但是，由于这些原始资料的文言文比较深奥，让学生自己阅读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仍然需要教师加以指导，对一些难词难句给以释白，对引文的深刻涵义做出分析。

现在，全国通用的几套新编历史教科书，都在一章或一课的开头有一段关于本章或本课“内容提要”的文字。它或是十分概括地勾勒出本章、本课内容的基本线索、重点知识，或是以问题的形式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激起他们学习本章、本课的兴趣。对于这部分文字，教师可以在正式讲授新课之前，请学生念一下，当然也可以由教师自己朗读，作为我们常说的“导入新课”环节的一部分。同时，在讲完一课或者一章后，教师可以让学生重温一下“内容提要”，使之对本课、本章来个“提纲挈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其内

容的线索和梗概。这时候，学生还会很自然地运用刚刚学习的本课、本章内容，顺利地回答“内容提要”中所设计的问题，得到一种获取知识后的满足和喜悦。

2. 课文的插图部分

尽管还受着某些条件的限制，但是，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历史课的直观性教学原则，现在几套通用的历史教科书都十分重视课文的插图，尽量地使之多一些、好一些，努力做到“图文并茂”。课文的插图，主要有图画和地图两种。

图画，按照其性质看，大致可以分成文物图和想象画两类。文物图，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历史》第一册中的北京人制造并使用过的旧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朝青铜器司母戊鼎（彩图）和四羊方尊，商朝武丁时代的卜骨卜辞和关于日食、月食的卜骨，湖北随县出土战国时的编钟（彩色），战国时各国的货币和秦统一货币后通行于全国的方孔圆钱，等等。想象画，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历史》第一册中的“黄巾起义”图和第二册中的“黄巢像”、“曹雪芹像”等。对于课文中的图画插图，教师于讲述、讲解课文文字部分时，应该充分地运用。文物图完全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如讲述商朝青铜器时，教师可以边讲解课文中关于青铜器的文字内容，边让学生看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的插图，它既是教师讲述文字部分的史料依据，又使其得以形象化，图文配合，相得益彰，完成学生对于商朝青铜器的认识和掌握。想象画，是后人概括史实加以想象而绘制的图画；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边讲述文字部分，边指导学生看，可以大大增强历史的形象化，有利于给学生再现历史场面或历史人物的风貌。

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文物图还是想象画，教师在指导学生看时，都需要把图画中的细节给学生讲解出来，引导学生学会认真地观察每一幅图画，而不是只在那里粗枝大叶、走马观花似的进行浏览。

地图，也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插图。因为课文文字部分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发生和存在的，而且这个环境如何，都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结果。这个地理环境在运用教学法则和符号系统处理并经过绘制后，便表现在了平面的地图上。

在教学中，使用地图插图，同样地也是要与教师讲述课文中文字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历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新航路的开辟”，有一张“新航路的开辟”历史地图插图，上面标有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地理位置、大小比例，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印度以及菲律宾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地岛等的位置，尤其是标明了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分别探索新航路的时间和航海路线。这张插图十分准确、形象地再现了当时这一世界历史上伟大壮举的地理环境。教师在讲授该节“迪亚士和达·伽马的航行”、“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三个题目时，便可以一边讲述课文中的文字部分，一边引导学生看这幅插图，并且使之完全融合起来，在插图上呈现出当时这些“航行”的具体过程和情景。

在使用地图插图进行教学时，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古今地名的变更交待清

楚，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历史》第一册的“三国鼎立”地图插图，上面有“夷洲”地名，文字部分还讲述了公元230年吴国的孙权派卫温率领万人船队抵达夷洲的史实。教师就应该告诉学生，夷洲即是今日的台湾，当时的台湾叫夷洲；这条史实告诉我们，大陆和台湾自古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课文的习题部分

全国通用的几套历史教科书，在每一课课文后边都有“习题”部分，其类型或是“填空”、或是“名词解释”、或是“问答题”。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历史》上册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一课中就有“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名词解释和“简述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因、经过和历史意义”的问答题。“习题”是留待学生在课下去作的，可以是书面解答，也可以让其理解记忆，下节课时由教师提问，学生做出口头回答。但是，对于“习题部分”，教师也不能只是采取听任学生自己去做态度，而是应该在课堂上加以布置和给予适当的指导。如，告诉学生哪个题要求书面作答，哪个题只需要记忆，做好在下节课口头回答的准备；哪个题需要阅读教科书上第几页、第几段的文字或插图，然后才能答好等等。对于学生书面或口头回答的习题，教师都需要给以书面或口头的批改，肯定其正确的地方，纠正不足或错误之处，并且综合学生在解题上存在的普遍问题，对全班同学给予方法上的指导。

4. 目录和“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这两部分一个是在一册教科书的最前边，一个是在一册教科书的最后边，都不是就一课说一课，而是面对着整册教科书的内容，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因此，教师最好是在复习课中使用。如，在复习一个阶段或者全册教科书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边串讲历史内容，边让学生翻看目录，回忆这段历史是怎样一步步地发展过来的，体会一下这些历史事实的内在逻辑，从而收到把一个阶段或者全册教科书的内容系统化、条理化的效果。对于“历史大事年表”也可以这样安排，教师一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串讲，一边让学生翻看“历史大事年表”，使学生从时间的先后次序上，加深对于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认识，并且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有个清晰的印象。

最后，谈谈历史教科书的“阅读材料”部分。目前，在几套新编教科书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一套有这部分，这是因为此套属于“五·四”制的历史教科书：由于学生初中有四年的时间学习，虽然历史课堂上的教学时间与“六·三”制的相同，但是，课余时间却多于“六·三”制。因此，在教科书中适当地编写一些“阅读材料”，可以满足这种学制的学生课外学习历史的需求。这些“阅读材料”，文字都不多（800—1000字），每篇是一个通俗有趣的历史故事，还都蕴含有品德情操的陶冶意义。前边列举了《世界历史》下册“阅读材料”的篇目，现再举些《中国历史》的篇目，如《周公旦辅成王》写了周公旦的忠诚和勤于政事；《管鲍之交》写了管仲与鲍叔纯洁、崇高的友谊；《张衡十年成一赋》写了这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勤奋、刻苦、一丝不苟于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等等。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不必加以讲述，只让学生自己在课外时间阅读便行了。如果方便的话，教师也可以在讲授到课文正文的有关部分时，给学生作出适当的提醒，告诉他们本课后边有某某历史故事，以期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激发他们在课后阅读的

欲望。

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还有两个问题是经常碰到的。一个是如何把教科书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一个是如何在创新中注意继承我国史书编写的优秀遗产。为了编写好北京师范大学版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制初中历史教科书，我曾对之作过一些探讨，目的亦是希望能够为编写教科书及时地提供一点参考，很难说是全面和恰当，只能算作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的反映，现亦选录于下，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一些参考。

附录：

历史教科书要有可读性——编写五·四制历史教科书随笔

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课的基本读本。编写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必须让学生爱看、爱读，打开书本就能够情不自禁地一页一页往后翻，愿意读完它，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才去看它，不考试则放在书包里，再不碰它。这就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可读性原则。

为了让学生爱读历史教科书，要认真考虑编写思想和编写技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应该着重地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必须包含着丰富的史实。这也就是说，在历史教科书里，每一课的课文都应该是写具体的历史，要给学生以或多或少地再现历史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让教科书充斥许多空洞的分析、结论和评价，写进一些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当然，在这里并没有一点历史教科书要排除必要的分析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意思，恰恰相反，写了具体丰富的史实，正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心悦诚服地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谁都知道，就客观的人类历史而言，它的规律性，即历史的必然性，总是也只能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或者说是“寓”于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之中。正因如此，为了能够让学生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就必须首先向学生叙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看似“偶然”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叙述其各有动机，在那里具体创造大干的历史人物。事实上，这样写作的历史教科书就不是充斥了过多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就不会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了。学生对于这样的历史教科书也自然就喜欢读，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乐此不疲。

例如，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部分，过去写“商鞅变法”，就是写变法的时间、国家、参与变法的人名和变法的几条内容。这样，学生就很难看到这次标志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更看不到秦孝公和商鞅这样起着重大历史作用的活的人物形象，自然多少会感到它有些“干巴巴”。我们写这课时，则按照《史记·商君列传》的内容，写了秦孝公怎样发奋图强，下令请别国有才能的人入秦辅政；商鞅怎样由魏入秦，与孝公促膝长谈，怎样坚定了孝公的决心，被任命进行变法。在变法的开始，商鞅怎样“立木为信”；在变法过程中，他又怎样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以至在孝公死后，被车裂处死。但是，由于新法实行了20年，“秦民大悦”，秦国赖以富强了，因此，新法并未因商鞅之死而停止，一直地实行了下去。变法的内容是穿插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写的，是把它与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过程，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写“商鞅变法”，我们自觉像历史了，是给了学生真实的历史进程和有血有肉的历史活动；在征求意见时，老师们也认为，这样写商鞅变法，是增强了教科书的可读性。

第二，加强历史插图，做到图文并茂。人类历史不同于物理、化学或生物，不是可以通过实验、观察，能够再现其特殊现象的。人类历史有一度性的特点，即具有一去不复返性。已经逝去了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重演的。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体察历史的真实，教科书除了加强史实的叙述外，注意增加历史插图，实是上策。这是因为历史插图，尤其是历史文物插图，总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给学生以历史的真实形象，如果与课文叙述的史实相配

合，就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的现象。

我们编写的五·四制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努力。在《中国历史》第一册（原始社会——魏晋南北朝）中，共有插图 91 幅，其中，历史图片 76 幅，分为彩色图（15 幅）和黑白图（61 幅）两部分。在制作这些插图时，我们尽量选用历史文物照片和历史遗址、遗迹照片，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教科书，给学生的历史真实感很强，学生读起来才会兴趣盎然。

诚如上述，一本历史教科书既加强了史实的叙述，又增加了历史插图，尤其是增加彩色的历史插图与插页，我们觉得它的可读性一定会大大地提高，基本上可以做到让学生爱读、爱看。（《学科教育》1989 年第 3 期）

史学遗产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我国历史悠久，史学遗产非常丰富。留下来的历朝史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历史教科书。如，孔子所著编年史书《春秋》，是作为他私学教授学生的用书。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念头起于做宋英宗侍臣之时。他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很明显，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专一给宋代帝王们编的一部提供治乱兴衰经验而又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清人吴乘权等编写的《纲鉴易知录》也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是，它不同于《资治通鉴》，不是为帝王编的，而是“以课弟子已耳”，是给青少年读的。更多的史书虽然没有明确其为历史教科书，但是在长期流传之中，亦一直起到“垂训”，“戒惩”的作用，从广义历史教育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教育人的读物。正是这些史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人们获取历史知识，承受历史启迪与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源泉。我国老教育家、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砺儒说过：“研究教学法应以科学史及科学研究法为据。科学史是人类认识这一类事物的经历；而科学研究法正是对这类事物的最有效的认识方法。那么，教学法当然要从此导引出来，方有理由。舍此将流为空谈。”对于我国史学史及史学遗产进行认真研究总结，很好地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无疑地将对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给以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教科书的体裁和结构

我国旧的史书体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最先只有“记言”、“记事”两种。《礼记·玉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记事这两种体裁后来发展成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几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一直到近代，这些体裁才被新的章节体所代替。我国最早以章节体编写历史书的是夏曾佑（1863—1924）。他用章节体编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自上古至隋）。1933 年商务印书馆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以后，章节体遂成为我国史书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主要体裁。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用的章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国外史书体裁和我国旧史书体裁作了继承吸收，而后出现的。它的按照历史发展层次关系的问题排比史事的方法，与我国古代同类书十分相近，而其叙事又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再就其具体的结构而言，许多旧史书体裁的优点它都做了吸收和包容。

章节体的叙事方法既是纪事本末的形式，势必就应该很好地考虑吸收旧史书纪事本末体于叙事时，按照时间顺序，详其首尾，有始有终，生动具体的特点。旧史书中纪事本末体所记每事的题目都很具体，力戒空泛，而且用字简洁概括。如，首创纪事本末体的袁枢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中，就用了“七国之叛”、“孙氏据江东”、“太宗平突厥”、“安史之乱”、“祖逖北伐”、“桓温伐燕”、“隋讨高丽”等题目。这里显然有作者封建正统思想在起作用，在使用题目中的动词时，明显地加了褒贬含义，但是，其立题的文字具体概括却是可取的。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在大小标题子目的文字表述上如何更具体而不空泛，更简练而能概括课文，是可以对之借鉴的。

章节体既采纪事本末体的纪事方法，就势必不可避免地带有纪事本末体的一些缺点。如，纪事本末体虽也按照年代顺序排比叙事，但是，由于照顾到每一题目的始终，就难免割裂同一时间内各个方面史事的联系，不利于人们从横向社会上去总体地考察一个时代。这一点在我们教科书中是存在的。关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历史，由于受限于这种写法，而要分散在“贞观之治”、“唐代经济发展”、“唐前期的民族关系”、“隋唐时期的文化”等几个课题中进行叙述，学生很难掌握这一时期历史的总貌。再如，纪事本末体也写历史人物，但是囿于以记事为主，只能采用于记事中带人的写法。这样，人物形象就常常不够丰满，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树”立起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时出现一个历史人物，只是近乎空洞的人物名字，而缺乏有血有肉的灵魂的活生生人物形象，就不能不说是带有这种弊端的痕迹。为克服这些编写上的弱点，我们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中适当地吸收旧史书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长处。

编年体史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叙述史事，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能够使“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从而让人们能够看到同一时间内发生史事的横向关系，对历史有个总体知识。这一特点恰恰可以弥补章节体采用纪事本末方法记事的不足。联系到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就可以考虑在课文正文之外，适当地引入编年体成份。如，增强书后大事年表的份量，不但把它作为史事年代的备查工具，还更多地当成加强同年发生史事横向联系的重要部分。大事年表也可以考虑不止在一册教科书后附录，而是穿插在中国古代史每个或几个朝代之后、中国近现代史每个时期之后或世界史一个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予以附录。还可以在教科书中编写一些专题史事年表，如，中国古代史某些重要帝王政绩表；中国近代史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大事年表；世界史某一重要国家大事年表或几个国家史事对照表（如“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对照表”）等。在这方面，还可以参考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编写方法。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基本用一人一传或数人合传的形式组织历史内容。这样，在突出了人物活动的同时，也如同纪事本末体史书一样，割裂了同一时间下史事、人物的内在联系，难于一下子见到一个时代的历史总貌。纪传体史书正是考虑到这些不足，于是采取了本纪编

年和列表的方式，予以弥补。纪传体的本纪其实就是以—个帝王为中心，按照年月日顺序，简要地排列其统治期间（也就是该王朝中—个时代）的大事编年。如果将—系列“本纪”连接起来，便能成为—部简要的王朝编年史。纪传体一般地还有表的部分，如《史记》有表十篇，可以分为两类。—类是—大事年表性质的，像《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起到“年经事纬，纵横互订”的作用。另—类是人物的年表，亦可称专题年表，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可以与列传互相补充。有本纪，有表，纪传体史书的缺陷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历史教科书在采用纪事本末体叙事方法同时，注重—下大事年表和专题年表的编写，其实也正是这种纪传体史书编写方法的灵活运用，参考纪传体史书的如是部分，对编写教科书将是有益的。

为了增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王朝、帝王的时间观念，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每每在叙述—个王朝史事的前边或后边，放入—个该王朝的“帝系表”，用划“—”的方式将该王朝的所有帝王按其先后次序列出。如“西汉帝系表”：

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衍—孺子婴，这其实就是史书中本纪和表某种形式的综合利用。它对于加强同—时间发生史事的横向联系是有作用的。但是，香港、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帝系表”，大多拘泥于—朝—代帝王的完整性，而失之烦琐。我们高等学校历史系用书中常常插入这样的“帝系表”，是为了满足历史专业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需要，而中学历史教科书由于每个朝代涉及的帝王有限，因此就不必要插入这样详细的“帝系表”。但是，在历史教科书中采用多种形式，注意在重要王朝中，列出其主要帝王的—名字和世袭关系，还是可以考虑的。

在总体上按照章节体，采用纪事本末体叙事的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地吸收编年的方法叙述某些史事。如，有的香港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写到近代中国“洋务运动”时，在叙述它的起因和主要代表人物后，用编年方法列出同治某年建了某厂，某年又建了某厂；光绪某年建了某厂，某年又建了某厂，等等。这种在“纪事本末”之中放入—定程度的“编年”，作为—种叙事方法，很有可取之处。它有利于使学生看到某—历史事件纵的发展进程；既掌握了基本史实，又能看出它的逐步发展，这种编写方法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用过，今后可以考虑在叙述某些重大战争过程，某—重大历史现象过程（如“工业革命”）等时，予以适当采用。

关于加强历史人物的编写，纪传体史书给予我们的借鉴更大。纪传体史书写历史人物，—人—传或多人—传，详其生平事迹，常常其本身就是一篇人物传记史实。人物在纪传体史书中，大多被树立起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使读者能够通过人物的活动，看到有血有肉又有灵魂的人类历史。

归纳起来，纪传体史书在写人物上，有如下的特点：

1. 写人物的具体活动。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对于李广这个被匈奴称之为“汉飞将军”的历史人物，就非常具体地叙述了他与匈奴打仗 70 多次的战斗生涯，有的概述，—笔带过，有的则详细加以描绘，读者读后，对于这位 60 多岁西汉御匈名将—生的主要事迹，印象很深，不会有一点人物空虚苍白的感觉。

2. 写人物的形象。如《史记·高祖本纪》在写西汉第—个皇帝刘邦时，

不仅着墨于他从参加秦末农民起义入关灭秦，到与项羽逐鹿中原争衡天下，建立西汉王朝以及建国后的种种措施，使得西汉 200 年基业得以奠定的一生主要政治活动，而且通过他少年时与人饮酒眠娼，不事产业，后来与项羽争战时怎样善用人才，灵活多变，称帝后怎样侮弄儒生，又怎样衣锦还乡，向他父亲及乡间父老夸耀自己等等史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刘邦既有雄才大略，处处高于项羽的创业帝王形象，也写出了他流氓无赖、不拘小节的一面。经司马迁的记述，刘邦这个历史人物跃于纸上。

3. 记言与载文。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仅写了诸葛亮一生的活动事迹，而且记述了他不少的言论。其中尤为详尽地记述了他与刘备在隆中的对话。在这篇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清晰地向刘备分析了东汉末年各个军事集团的特点和全国形势，并且提出了夺取荆益，出兵中原，建立霸业乃至重兴汉室的方略。“传”中对于诸葛亮的一些奏表亦全文写入或节录。如全文写入《前出师表》，节录了向后主刘禅所上的关于自己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表章。言为心声，有了诸葛亮的言、文，诸葛亮就不但有形而且有声了，他的深远志向，超人谋略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就能够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4. 写旁人对人物说的话或议论。如，《三国志·诸葛亮传》写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之后，马上引用当时人对他的评论说：“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写诸葛亮出隆中以后，刘备与之“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以后，也引用刘备的话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写刘备兵败夷陵，在永安托孤时，引用刘备对诸葛亮说的话：“君（指诸葛亮）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当诸葛亮对之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又引用了刘备给刘禅的诏书说：“汝与丞相（指诸葛亮）从事，事之如父”。写到诸葛亮出军五丈原，继而死之，蜀军退回成都时，引述当时与诸葛亮交战的敌方统帅司马懿“案行其（指诸葛亮）营垒处所”后赞叹他说：“天下奇才也”。这些旁人对诸葛亮说的话或者评论，无疑更加衬托出了诸葛亮的高大形象。

5. 写情节和场面。这方面在纪传体史书中是很突出的。人物活动的情节在史家笔下常常是曲折多变，甚至险象丛生。如，《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历程，时而大败，时而再起，而最后终于完全压倒项羽，取得了最后胜利；《史记·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一生勇猛剽悍，多次险些丧生于匈奴骑兵的箭下，命运乖舛，坎坷艰难，终身未得封侯，最后在卫青的逼迫下壮烈自尽身亡，等等，都在情节上很下功夫的。场面也是写得各有特色。如《史记》写刘邦、项羽“鸿门宴”暗藏杀机的宴会场面；写巨鹿之战时楚军与秦军激烈厮杀的场面；写项羽该下被围、四面楚歌，不得不与美人虞姬分手的悲壮场面；写韩信被刘邦拜将登台时的隆重威严场面，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把人物置身于一定的情节和场面中，人物才能活起来，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感，使读者仿佛与人物同时深临于历史环境之中。

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必须要简洁，每册乃至每节的课文不可文字过多，以适合中学生的阅读使用，同时，还要考虑采用章节体，以纪事本末形式叙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有层次地掌握课本内容，看到史事之间的因果关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能也不应该像旧的纪传体史书那样，采用

人物传记的形式编写。但是，在考虑到“‘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时，编写历史教科书却应该也必须突出对于历史人物的叙述和描写。唯有如此才可以把历史写得具体，而不会使之成为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这方面，纪传体的史书诸如以上写人物的种种笔法，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二、教科书的语言文字表达

历史教科书的文字表达，说穿了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写史实，如何叙述史事；一个是如何写分析，如何写史评，在这两个问题上，旧的史书都有自己业已形成的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借鉴。

关于写史实、叙述史事。治史者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对于史实、史事是写得具体明白点好还是写得凝练含蓄点好，这样两种写法孰取孰舍的问题。

孔子编著的编年史书《春秋》深含“惩恶而劝善”的“义”，向以微言大义，“寓褒贬，存善恶”而著称。一部叙述242年历史的史书，只用了18000多字，可谓简单概括矣！文字凝练而又包含丰富的知识量，有的甚至只有标题而无详细的内容，是它的特点。但是，《春秋》不适合于人们阅读，尤其不能满足初学历史的读者学史需要是很明显的。所以，后世出了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专为《春秋》作注，实则是补充具体史实，丰满其具体内容。这个道理前人已经认识明白。唐朝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中，针对有的儒生认为只要读了《春秋》就可以了解当时历史，而知“褒贬”的情况说：“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指公羊、谷梁和左氏等“传”）以求经（指《春秋》“经”），此其说必不通”。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和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等基本上都是既有博大的知识量，而又于每条史事中具体地细其始终，详其内容，不再叫人看不出历史“事迹”而给人一些凝练乃至只是标题的“知识点”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旧史书在写法上趋于成熟的表现。

借鉴我国史学史，继承优秀史学遗产，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尤其是青少年使用、阅读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应该选取这两种写法中的哪一种，不言而喻吗！

关于叙事与评析的关系，旧史书创立了“寓论断于序事”和“太史公曰”相结合的好的文字表述方法。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叙述了史事而于其中“寓”含论断，这确实是司马迁作《史记》的重要笔法。他写李斯，先写他在家乡看到厕所中的老鼠偷食人粪便还胆战心惊地“首鼠两端”，而粮仓中的老鼠爬在仓顶吃得肥头大耳，却因无人骚扰而悠闲自得时说：“（看来）贤与不肖在所自处耳”！以后，又按照司马迁的看法写了李斯逢迎钻营，投机取巧地度过一生的种种事迹（见《史记·李斯列传》）。看来只是叙事，可是一言一字都不寓含着司马迁的评析，认为李斯的一生正是在他所说的“贤与不肖在所自处耳”的指导思想、伦理标准的摆弄下度过的。《史记》的其它诸传也都是用这种笔法写就的。司马迁在写史表述方法上所树立的这个楷模，成为我国后世旧史书写史所一直遵循的基本方法。

既然如此，是不是旧史书只有叙述史事，而没有直接了当的评析之语呢？

不是，史家对史事的评析之语比比皆是。

一种形式，是通过叙事中旁人的话，来对立传人物作出评析。这一点在前边论到纪传体史书写人物的特点时已经述及。其实这仍然是“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写法。不过是寓论断、评析于古人口中，而在叙事时道出而已。

另一种形式，是由编年史书的史家自己出面说话，加以评析。这种形式在《史记》里是于每篇之后加“太史公曰”，在《资治通鉴》里是在重大事情叙述完加“臣光曰”。“太史公曰”和“臣光曰”都是作者的史评，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如同样是记叙了西汉武帝时李广为将待士卒宽舒，而程不识为将治军甚严的史实，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及（广）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显然是肯定李广而贬程不识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的“臣光曰”中却说：“《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为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小人……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御虏之仓卒而已矣！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明显地肯定了程不识，而对李广的做法加以批评。两位史学家对史事迥异的是非观，一清二楚。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在叙史与评析史事上，对于旧史书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与“曰”的笔法不妨加以参考。这样，对于避免教科书中一些空发议论或者只见史事又缺分析的表述方法，肯定是有益的。当然，评析不一定非拘泥于纪传体史书的放于“传”后的方式，而可以穿插于史事叙述当中，所谓“夹叙夹议”，像司马光的“臣光曰”一样。

三、其它

一、纲鉴体

纲鉴体是旧史书的一种体裁。它是由南宋朱熹编《通鉴纲目》首创的。这种体裁按编年办法叙史陈事，但是，于年、月、日下先立纲，写出史事梗概，再于纲下立目，详述具体内容，从而像有的同志说的把《春秋》（即“纲”部分）和《左传》（即“目”部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纲鉴体史书之于读者，是增加了更多的阅读方便。先读“纲”，可以了解历史的重点和大概，再读“目”就可以在“纲”的统领下详细地掌握史事内容；既有眉目清楚的要点，又有具体的一般史实，掌握历史就容易多了。

这种体裁的优点，历史教科书是可以考虑吸收的。如，在课文中区分出大小字两个部分：大字为纲，小字为目，对于学生阅读教科书来讲，既有利于掌握和记忆知识要点，又能灵活适当地多涉猎一些具体生动的史实，这就为学生阅读提供了一些方便。

二、注释

旧的史学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某部历史，往往为其作注，而且对于这些注释很讲究。从内容上看，有注音（古音）、注词、注典章制度、注

分歧意见等多种。如，唐代颜师古鉴于《汉书》难于读懂，作了《汉书注》，这是史书注释中较优秀的。有的还在注中为史书补充了大量史实，如裴松之为陈寿写的《三国志》作注，就补充了不少史料，使我们今天对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也有注释，但多偏重于注音，注古今地名和注古文（今译），个别的也介绍一些历史分歧意见。香港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注释种类较多，有注释引文出处的，有注典章制度的，有补充史实资料的，等等。今后，是否可以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更多地注意一下关于注释这种形式，围绕着有利于学生理解教科书的内容，而又不失之于烦琐的基本要求，适当地多一些注释，多一些注释的种类，把历史教科书编写得更活泼些。

三、继承和创新

我国史学遗产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总是不断地有所创新。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两种形式，发展到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又发展为通鉴体，更演变出了纲鉴体。纪传体也由《史记》的通史发展到《汉书》的断代史。由于人们苦于编年体一人一事常缀于多年多月，首尾不相连贯，而出现了纪事本末体。唐时，杜佑著《通典》又发明了专一记述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刘知几著《史通》，后来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又发明了史评体。其它如史考体、学案体、图谱体、方志体，等等，更是不胜枚举。这种不断创新或由于时代的变化，或由于所叙历史内容决定，或由于纠正、弥补前人史书体裁的弊端，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其精神在我们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却是应该吸取的。我们不但在教科书的内容上要不断地把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吸收进来，经常更新，而且在编写形式和叙史方法上也要不断地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才可以永葆青春。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史学遗产中还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新的史书编写总是十分注意对以前史书的吸收和继承。有的是父子相承，如司马迁就是继承他父亲司马谈编史的计划 and 遗志而写就了《史记》；班固在编著《汉书》时，更是充分地吸收了他父亲班彪所作的《史记后传》和当时其它人写的续《史记》之作。有的则是吸收了前人的精华而熔铸出了自己的体裁和写法，如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与当时能够见到的《世本》关系就很大。据后人辑的《世本》看，其中就有帝系、纪、世家、谱、传等几个部分。显然，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列传、世家、表等部分是参考了《世本》，而以之为依托的。至于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一种史书体裁的本身发展，还是各种史书体裁之间的渗透，都无不体现出了各种史书之间的相互吸收与继承。这样，就在我国史书编著的长河中，表现了新旧相因的连贯性。这一点，我们今天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时，也是要给予考虑和吸取的。我国历史教科书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算起，包括试用、移用和自己编写，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它已经形成一套原则、体例和方法，凝聚了研究者和编写者的多少艰辛血汗，又蕴含了多少宝贵经验。我们对于这些都要充分地吸收，切磋琢磨，而不能简单化地一弃了之。从连贯性这一点出发，已有成果应该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不断创新，则是它应该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收入《历史教学社会功能的探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论文集》（第三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全国四套新编通用历史教科书简介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初中历史】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共为六册，供“六·三”学制与“五·四”学制使用。其中《中国历史》第一至第四册，为初中一、二年级使用，《世界历史》第一、二册，在初中三年级使用。这套教科书内容丰富充实，编排体例新颖，以图文并茂和文字生动见长，特别注重课本的可读性。每册配有彩色照片 30 余张，黑白图画 300 多张。选材上从加强基础知识着眼，大大拓宽了知识面，增加了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同时更新了基础知识，采用最新史学研究和考古成果。选材上还注意到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接受能力，删去了传统知识中深、难、繁的一部分。根据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材通过不同的编排形式和大小字的要求，加强了弹性。为了便于教学，还编写了系列配套教材，包括教师教学用书、教学指导与参考、挂图、幻灯、投影片、学生使用的彩色历史地图册及地图填充练习册等。

北京师范大学版

【初中历史】本套历史课本共有六册，其中，《中国历史》四册，《世界历史》两册。目前，《中国历史》第一至四册和《世界历史》上册，已经出版，并在山东诸城等地区的“五·四”学制学校中进行实验；《世界历史》下册正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作部分修改、补充，然后发排，供明年春季教学使用。

这套历史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贯彻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试用）的精神，坚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面地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国情，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认识，立志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在编写原则上，本套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坚持历史学科的思想性、科学性，做到史论结合；一方面注重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坚持可接受性和可读性。

全套教科书每册都包括“内容提要”（每章一个，重在划线索、点重点）、“正文”（一律大字；章节体；史论统一，寓论于史）、“注释”（页下；以注史事为主，旨在拓宽知识面，区分对学生掌握知识要求的层次，“分解”史实，增强生动性。如，商鞅“立木为信”、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石崇与王恺斗富”等历史故事和“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历史文物说明）、“历史文献”（方框竖排，文字精炼，或补充重点部分的史实，如讲井田制时，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选录蕴含教育因素的名言佳句，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葛亮《戒子篇》的“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文天祥《正气歌》的“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等）、“插图”（以文物图片为主的历史图画和历史地图）、“习题”、“历史大事年表”（中国古代史加有“朝代顺序表”）等部分和形式；生动活泼，结构新颖。每个年级还有配合教科书的彩色“历史地图册”和“历史填图册”，

以发展学生关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空间观念。

考虑到“五·四”学制初中各年级的学生比“六·三”学制的普遍小一岁，而且课外的时间要相对地多些，因此，本套历史教科书注意在文字的表述上更加通俗生动，在习题上使各册之间及同一册的前后，都贯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让学生逐渐地掌握历史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历史、认识历史的能力；同时，在课文之外，还安排了“阅读材料”，编写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供学生课外阅读。《中国历史》第一、二册编入的“阅读材料”共有《周公旦辅成王》、《管鲍之交》、《孙庞斗智》、《萧何为汉追韩信》、《张衡十年成一赋》、《诸葛亮忍痛斩马谡》、《王羲之书成换白鹅》、《长孙皇后佐太宗》、《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曹雪芹沥血著红楼梦》等16篇。每篇“阅读材料”都注意与课文珠联璧合，蕴含深刻的教育因素。文字生动，情节曲折，份量适度，保持较强的可读性。

广东版

【初中历史】本套教材共有课本六册（中国历史四册、世界历史两册），同时还有地图册等六种配套教材，供初中三年六个学期使用。教材编写队伍的组成，贯彻专家（教授、副教授12人）、中学教研行政人员（省、市教研员2人）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特级教师2人，高级教师4人）三结合的原则。

一、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

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二是根据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三项任务，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三是注意吸收有关史学科研成果，适当联系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四是根据初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力求图文并茂，生动具体，通俗易懂，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

二、本套教材的主要特色

1. 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教材在体现历史教学大纲、《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试用）所规定的思想教育要求基础上，着重抓三点：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特别是历史发展规律的教育；二是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三是革命传统和品德情操教育。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从而激发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增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并为学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情操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奠定基础。

2. 重视基础知识，适当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教材在体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础知识要求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加强如下一些内容：__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文化科技、对外交往，以及中外仁人志士、杰出人物、革命英雄的高尚品德、情操；__香港、澳门、台湾和华侨的历史；__资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掠夺罪行；__“两史一情”教育的内容，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从初中生认知水平出发，对一些难懂难学的内容，采取留、减、删的原则，适当降

低教材的难度。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一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二是体现了史学体系的改革，即将以往比较强调政治斗争为主体的史学框架体系，向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发展为主体的框架体系前进了一步；三是增强了时代感和沿海地区发展需要的特色。

3.教材在编写体例和形式安排方面，增强了可读性。教材在这方面的主要体现：采用章节体，以三个层次的简纲目，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规律；将科学性、趣味性、知识性融为一体，使历史事件有头有尾，骨肉相连，生动具体；对一些头绪纷繁的历史内容进行归纳概括，增加教材内容的条理性，力求简明化，使学生易学易记；注释适当增多，内容丰富多采。这种体例，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知识面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正文的份量，适当体现教材的弹性；在每章课文之前提出几个主要问题，以利学生对本章要点的掌握；选用较多的彩色和黑白图片，初步体现图文并茂的特色，从而增强历史的直观性、形象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注意以事论理，即从具体到抽象，以适应初中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

4.重视教材的科学性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教材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力求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观点与材料的统一；积极而又慎重地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在教材内容和练习题的安排方面，注意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而其中的着重点则是培养学生能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5.注意教材配套，保证教学质量。本套教材除课本外，还有内容丰富、设计新颖的《历史地图册》，简明扼要、题型多样的《历史练习册》，目的明确、分析较为中肯、史实又较为丰富的《教学参考书》，介绍教材编写情况、教材内容与结构以及试验情况的《历史教材简介》。同时，还有课例音像教材、幻灯片等配套教材。这些配套教材，有利于师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掌握，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教材在广东、福建等省近三年的试验中，受到试用师生的普遍欢迎和好评，他们认为教材内容充实，线索清楚，文字比较严谨，重点突出，有较强的思想性、科学性与可读性，而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特色。

四川版

【初中历史】本套教材共六册，其中《中国历史》四册，《世界历史》两册。

这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

1.融思想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突出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教材精心选择史料，注意吸收史学研究和文物考古的新成果，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史部分，增加了文化史等的份量，突出了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教育、军事和对外交往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并通过与西方国家的适当比较，说明它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着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突出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使学生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培养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世界历史部分，着重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帮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树立改革开放意识，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增强对和平演变的免疫力。

2. 改革了教材的传统模式，增强了教材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教材每章由诱发性导语、正文和复习要求三部分组成。导语旨在激发学生动机，引起学习兴趣。例如中国古代第一章的导语是：“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那么，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是怎样揭开的？为什么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正文大小字间排，大字为学生必学的讲读材料，语言精炼生动，通俗易懂。例如介绍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时有这么一段文字：“地上八个铜蛤蟆的大口正对着龙嘴。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哪个方向的龙就吐出铜珠，‘当’的一声掉在铜蛤蟆嘴里。”小字是不要求学生掌握的阅读材料，行文更加生动具体，符合 12~14 岁年龄段少年的口味。教材图文并茂，还配有彩色地图册，增加了直观性和形象性。

3. 根据内地农村中学实际，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在确保达到教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从内地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每册字数控制在 10~12 万字内。配套练习册字数也有严格控制，随课练习，当堂巩固。配套教参内容充实，有利于教师备课使用。

（以上选自《学科教育》1992 年第 6 期）

第四章 历史教学的技能、技巧

第一节 历史教师的备课

一、基本概念

备课，指历史教师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教师都有体会，备好课是上好课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有人将备课比喻为军事家指挥战争，“不打无准备之仗”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教学工作。过去有人对备课理解得比较狭窄，认为只有上一节新课前编写一份教案才叫备课；其实备课的涵义是很广泛的。

已故的北京市第一位特级历史教师时宗本曾把备课分作广义的和狭义两种。他在讲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经验过程时说：“二十多年前，一位同行说，她备一节课，至少要用八个小时，才能写出几千字的教案。我当时怀疑：为什么我备课用不了那么多时间？是否我对教学不负责？但自思并非如此，实际是平时素有积累之故。二十年过去了，前一阶段，我受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委托，为世界史教师进修班讲课，第一讲是‘原始社会’。在备课中我发现：这一次我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了当年那位同行。原因何在？显然在于这一讲需要广泛运用地质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而我在这几方面的知识又都很贫乏。平时积累不够，到时不得不先行‘补课’查资料，翻有关书籍，挤掉了思考消化、组织教材的时间，弄得顾此失彼，自己对这次讲课的效果也不满意。在若干年的教学生涯中真是‘习焉不察’，而在后来才渐渐认识到：所谓备课，原来应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方面。狭义的备课指的就是根据教学计划、教材和学生情况组织一节课，写成教案；所谓广义的备课，那就是教师要广泛地积累知识，包括历史专业知识和其它有关知识。

一些同志常说自己备课是‘现趸现卖’。这就是平时积累的各方面知识还不够丰富所致。所以不得不在临写教案时东查西抄。由于来不及将所接触的材料细细消化，变为自己知识体系中的有机部分，讲起课来必然露出拼凑的痕迹。既然没有融会贯通，也就很难得心应手。这样备课，即使费去可观的时间，写成广播稿式的教案，也未必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说一个新手这样做是不得不尔，那么随着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就应该尽快地摆脱这一被动局面，认真地把广义的备课提到日程上来，进而为提高狭义的备课的效率创造条件。”

如何做到“广义的备课”，“进而为提高狭义的备课效率创造条件”呢？时宗本老师把它归结为“积累知识”上。他说：“积累知识，包括历史专业知识和其他有关知识。前者是首要的，其理明显，本文不拟赘述；后者也极其重要，但易被忽视。我认为：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也是历史教学内容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扩大知识领域，积累广泛的知识则是中学历史教师业务修养的必要内容。”接着，他以自己几十年教学生涯的经验，阐述了作为一位历史教师所应该“积累知识”的具体内容。他说：“语云：‘只知经，则不足以通经也！’其实史学又何尝不如此？有人说地理学与民族学是历史学的两只眼睛。我也有这样的体会。世界史教学一开始就会碰到‘古代埃及’。学生在学完这一节以后可能会产生疑问：埃及人是

非洲人，是否就是黑人？古埃及人是否就是存在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创造古代文明的埃及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古代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又都是些什么人？在中国史上，春秋初期的南方蛮族诸国——楚、吴、越尚被中国诸夏所歧视，为什么后来竟出现吴公子季扎、楚大夫屈原这样具有高度华夏文化修养的人？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江南地区走过一条在经济和文化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的道路。我国今天的汉族与历史上的汉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不是应该引导学生搞清楚的吗？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就更加明显。例如世界史教材就曾多次涉及法国。仅课文中提到巴黎市的地名就有：凡尔赛、巴士底、蒙马特尔、巴黎市政厅、圣克卢门和拉雪兹神甫公墓。再加上课本虽未提到，但学生在其他场合也可能接触到的就有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卢浮宫博物院、爱丽舍宫、艾菲尔铁塔等等。又如自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分裂以后，经过奥斯曼土耳其的征服、近代西方殖民者的分割与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二次大战以后形成的众多‘阿拉伯国家’都有哪些？它们的各自特点与共同点是什么？这些问题，有的要在课堂上出现，有的当学生问起，教师也必须予以解答。看来，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不仅要具备地理常识，而且应该对某些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语言风尚、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现状和与我国的关系等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字作品更为重要。古人说：‘文史相通’，不仅《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一些文学作品也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为了了解唐代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面貌，杜诗就不可不读。进一步说，清初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则把‘安史之乱’这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有凭借裙带窃居高位的杨国忠、心怀叵测的胡人悍将安禄山、赤胆忠心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以及大诗人李白、艺术家李龟年……成批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著作，参考性的材料也不一定直接拿上课堂；但从一个历史教师的修养的角度来看，广泛涉猎文学作品却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世界史的教学存在着特殊困难，它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都和我们存在着莫大的距离。以欧洲国家而论，与我们的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语言文字的障碍，我们能够掌握运用的材料更为有限。以古代罗马为例，他们的奴隶制大庄园不同于中国商、周的井田制；他们那军事、行政帝国也不同于以基本单一性经济文化为基础的秦、汉封建帝国。更具体他说，古代罗马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对学生的知识来说都是一片空白。如何使人物的活动、地域的风貌、事件的过程、战斗的场面等形象地‘再现’于学生的眼前，就相对的意义来说，文学作品却提供了这个可能性。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不仅描绘了这场伟大的奴隶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古罗马的生活知识。通过这部小说，还可以了解到罗马奴隶主国家的元老院、执政官、独裁者如何进行统治；强大的战争机器——罗马军团如何进行征战；奴隶主达官显贵们怎样的骄奢淫逸，又怎样的灭绝人性。另一部历史小说，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则反映了早期基督教徒的斗争。早期基督教，作为‘被压迫人的宗教’，在罗马横遭迫害。早期基督教徒对罗马统治者的反抗斗争，构成了罗马阶级斗争重要的一翼。关于中世纪，例如英国作家斯各特的名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则反映12世纪英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征服者诺曼人与土著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的斗争；农奴、工匠对封建主的斗争；基督教徒与被歧视的犹太人之间的

斗争；狮心王理查与其弟约翰亲王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间接反映出来的十字军与穆斯林国家间的战争。近代史阶段，以法国为例，则有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等的大量作品。它们反映了法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英王查理一世的统治，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七月王朝、1848年欧洲革命直到普法战争等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尔扎克；列宁曾赞扬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在国外（苏联和西方），引用文学作品是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我认为，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是历史教师的份内之事，而引导学生涉猎一些文学作品也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教师也要懂一些自然科学，要读一些科普读物，要了解重要科学家的生平。在中国古代史上，农学和医学等应用科学的成就是突出的。在中学教材中就出现过农学家汜胜之、贾思勰、王桢和徐光启；医学家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逸和李时珍等人的成就和著作。其中《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都是常见之书，浏览一遍，对于讲课就大有裨益。另有一些教材则与自然科学常识有更密切的联系。在世界现代史上，讲到华盛顿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了英、美、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比例这一问题。要讲明这个问题，就要求教师懂得：什么是主力舰？在19世纪，主力舰曾是在海战中决定胜负的舰种，是名副其实的‘主力’。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作用则大大降低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回避不得，否则就弄不清楚华盛顿会议‘裁军’的虚伪性，也无助于对战后英美——日本矛盾作更深入的理解。当然，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旁及涉猎的还有很多。积累知识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电影，这种艺术在时空条件上所受的局限最小，所以比其他文艺形式更为形象化。近年来大量上映的中外影片，其中不乏历史题材的或与历史有某种关系的。这就为我们的教学和获得知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罗马尼亚影片《达吉亚人》反映了罗马统治者侵略达吉亚（今罗马尼亚）遭到坚决地、持久地抵抗的一段史实。其中一些镜头如罗马军团的宿营制度、军事训练、围攻城堡等等都是与资料记载相符合的。埃及影片《萨拉丁》反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主要的剧中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情节虽然搀杂着传说，但却可以使我们看到‘圣地’巴勒斯坦的风貌、阿拉伯军民的敌忾同仇、西欧骑士们的骄横以及封建贵族们的阴谋权术。至于《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则不仅反映了拿破仑生平最辉煌的战役，而且也反映了拿破仑称帝前后的一系列史实作了集中概括。甚至影片《吟公主》、《佐罗》，虽然内容不是历史，但它们既然都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前者反映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者反映18世纪末委内瑞拉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那就对我们了解这些历史背景与时代风貌有所帮助。我国的传统戏曲——京剧和地方戏，以历史为题材的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也应该被我们利用起来。与电影相比，旧戏从语言到服装、从史实到观点都和科学的历史存在着更大的距离，但只要我们善于把‘历史’部分与‘演义’部分区别开来，还是可以从中吸取某些营养的。”

当然，广义的备课并不仅仅局限于广泛地涉猎、采集一些历史的和其它学科的知识，还应该包括理论的修养和不断关心史学研究的新成果等，这些我们在“教师的进修”章节中将专门阐述。但是，我认为，时宗本老师的意

见、看法还是很中肯的。它不仅为我们全面地解释了历史教师的备课，拓宽了备课的涵义，而且把我们历史教师的备课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其实，就“狭义的”备课而言，也不是仅仅只是上课前编写一份教案的问题，而应该是包括了学期（或学年）前的备课和上课前的备课两种。

关于“广义的”备课，上引时宗本老师的意见已经讲得很明确了，下面我们专就“狭义”的备课，进行一些讨论。

二、学期（或学年）前的备课

这是综览一个学期（或学年）的教学准备工作。相对于上一节课之前备一节课而言，它是历史教师带有宏观性质的备课。

学期（或学年）前的备课，应该始于历史教师开始接受这门课程任务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暑假或寒假的前后，学校或历史教研组为每位教师安排其下个学期将要授课的班级和教学内容）。这时候，教师就要通读《历史教学大纲》，尤其是“大纲”中与自己下学期（或学年）教学中关系密切的有关部分。如，以新大纲为例，如果将要接的都是初中一年级的《中国历史》第一、二册，即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就要着重地学习、体会“大纲”中“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的第三条（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和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四、五、六条（关于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七条（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问题）和第八条（主要讲中国古代史上的中外关系）等；通读“教学内容”部分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几点说明”（包括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知识”、“思想教育”、“能力培养”的要求）和“内容要点”。与此同时，结合着“大纲”的精神通读一遍将要教的历史教科书，这遍通读主要是粗略地掌握一下教科书基本线索、主要内容，多从宏观、全局上予以把握，不要求也不可能一课课细致地去钻研它的具体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再结合着将要授课班级学生的情况（如对历史课的兴趣、学习态度和以前学习历史课的考试成绩等），制定出学期（或学年）的教学计划。

学期（或学年）的教学计划，应该包括：课程名称、授课班级、所用教材、教学的总任务和目的、课时计划、准备组织的课外活动、乡土教学的安排、在教法上拟做的改革或试验，以及准备使用的历史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等。

一般地，学期（或学年）的教学计划，要准备三份，两份分别上交学校分管教学的领导和历史教研组，以备领导掌握、检查，一份自己留底，于教学中落实执行。

三、上课前的备课

这即是指的教师在上一节课之前的备课工作。它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钻研历史教科书的本课内容。

钻研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教师自己学习、领会教科书的过

程。这对于使用新教科书尤其重要。因为如前所述，新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原教科书来讲，无论是从观点、史料、历史分期及下限上还是从编排结构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教师只有自己真正地体会、掌握了教科书的精神和内容，才可以很好地教给学生去学习、掌握教科书，以其昭昭启其昭，否则便真的会成为以其昏昏使其昏昏了。

教师要钻研好历史教科书的一课内容，至少应该做如下几件事：

1. 把握住本节课与前后课之间的联系及其在全册教科书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教师不要就一节课钻研一节课，只掌握本节课的内容，而要同时考虑它与前边讲过的课的关系及钻研一下后边与其有关系的课，从全书所述整段历史的高度去掌握本课所占的地位，就整个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上认识其与前后课的内在联系。

具体说，这种“地位”与“联系”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从整体历史发展上看的。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五四”制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的第十三章第三节《边疆各族的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一课。首先，就要联系到前两节课《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内容，认识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主要大臣，许多人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军，有的还曾经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他们经常讨论隋亡的教训和治理国家的办法。……因此，他（指唐太宗）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的开明措施”。从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政治、经济局面经过女皇武则天的统治时期直到唐玄宗的开元年间，一直延续下来并向前发展，终于出现了如杜甫《忆昔》诗中所反映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全盛”局面。正是这种繁盛的局面，为唐朝前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唐朝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事实上，当教师讲述《边疆各族的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这节课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东西突厥的打击、安置，安西部护府（包括其属下设置的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置，还是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少数民族与唐朝关系的密切发展，大部分的事件都是发生在唐太宗、武则天到唐玄宗在位期间，这显然是与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局面分不开的。

其次，这节课与后边的一些课也有有机的联系。如，《唐朝前期经济的繁荣》一课里就讲了当时的唐都长安城十分繁华，居住着不少“少数民族人士”；《唐朝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一课中所讲的唐朝通往亚洲和欧洲的陆路交通线，从长安出发，往西经过今新疆、再经波斯可以到达中亚和西亚，往南也可到达天竺，即是唐朝初年打败了西突厥后重新打通、控制的陆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的文化》一课中讲到唐朝的音乐时，也讲了唐太宗著名的 10 部乐中就有少数民族的音乐，这正是唐朝前期与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在经济、文化上频繁交往的结果。

另一种是从专题历史上看的。仍以《边疆各族的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一课为例，如果从中国古代民族史的专题看，它首先是教科书前边《中国历史》第一册里讲的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及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关系的一个发展，在它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再往后边的一些课看，隋唐时期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则与其后一些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

和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而发展的。如，第十七章《与宋并立的辽、夏、金》中在讲到“契丹的兴起与建国”时，便追述到“唐太宗时，契丹族归附唐朝，同中原地区联系渐多。唐朝中期以后，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河北、山西等地的汉人，不断地逃到长城以北，定居于契丹人住地。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广东版《中国历史》第二册在《女真的兴起及与辽、北宋的关系》一节中，还追溯了女真族源说：“女真族来源于唐朝时的黑水靺鞨。”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二册在唐朝时就讲了“回纥族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元朝讲到回族的形成时，则提到其民族中亦融合有维吾尔族人。关于吐蕃，后边的元朝、清朝部分中都讲了其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发展。元朝时，提到“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和吐蕃政务。宣政院的第一任长官是吐蕃宗教首领八思巴。元政府在西藏驻有军队，并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对那里进行有效的统治。西藏开始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在清朝时，则进一步他讲述了清帝对西藏政教首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封号的赐予及其“转世”须经中央政府册封和认可，以及“驻藏大臣”的设置等制度的确立，此时，“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管辖，大大加强。”

很明显，教师们这样钻研历史教科书，就不会把本节课孤立起来，就一节论一节，而会做到讲一课时“胸有全局”，既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本节课一些概念的分寸和度，又有利于在联系前边历史知识时“温故知新”，同时为后边的历史知识做了“伏笔”，收到历史知识系统化，将全册教科书融会贯通地教给学生的良好效果。

2. 真正弄懂、掌握本节课的内容。本节课的内容，包括了文字部分和插图部分，都需要我们认真地钻研和掌握。

文字部分除去前边说到的“内容提要”和“习题”要很好地进行阅读体会，从中了解本课的基本历史线索和重点外，重要地是要真正地消化掌握课文和注释两个部分。因为这两个部分是组成文字内容的最实质部分。

所谓钻研与掌握课文和注释，主要地是指钻研、掌握这两个部分所表述的历史知识要点及其结构。历史知识要点包括了本课中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概念。知识结构则指以上这些“要点”在一节课中是如何编排的。

一般说，一节课文总有一个题目，其下设有三到五个子目；这些子目往往是一个个的历史知识要点，它们都围绕着这一课题目所表示的中心思想，按其先后编排于下，这便体现出了本节课的知识结构。

所谓钻研、掌握历史知识要点，就是要真正地弄明白这个子目所写的内容，包括其史实和对史实的分析、评论。如，重要历史人物就应该弄清楚其生卒时间（或大体年代）、主要活动、成就或业绩以及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则要掌握它的发生原因、主要经过（始末）及其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影响、意义；重要历史概念则要弄懂其外延、内涵和与近似概念的区别等。在这里，史实尤其要重视时间、地点（地域）、人物和历史情节；分析、评价，则要注意课文是“寓论于史”，已经将其渗透在对历史的叙述之中，还是“夹叙夹议”，专有分析、评论的文字。

钻研、掌握历史知识要点，应该注意科学性而且要细致严谨，不可粗枝大叶，更不能想当然以致最后错误地理解了教科书的内容。例如，在中国

古代史的教科书里，讲到西汉武帝时派遣张骞通西域，就要准确地掌握当时“西域”的地理概念，它从狭义上说是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地方”；从广义上说，“西域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更远的地方”，而本课所指的西域主要是今新疆地方。在讲《唐朝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一课鉴真东渡时，教科书写他在日本“传播佛教”，教师就应该明白，并不是鉴真把佛教传入日本的，在此之前，日本即有了佛教，只是尚无严格的授戒制度，因而寺庙紊乱，许多人随意可以出家为僧，于是日本天皇才派高僧入唐，邀请中国律宗大师鉴真去日本为其佛教建立授戒制度并为日本天皇、贵族和一些僧人亲自授戒。为此，教师自己还可以阅读一些有关佛教的书籍，弄清楚唐朝时候中国佛教的宗派情况（包括净上宗、禅宗、律宗等八大宗）和佛教中“沙弥戒”、“菩萨戒”、“俱足戒”等戒律及授戒制度。再如，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中，在讲到历次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于“赔款”白银一项，只有中英《南京条约》的计算单位用“元”，以后各次条约中的计算单位均是“两”。在这里，它们何以有这个区别，以及元和两的含义，教师也都应该弄明白，做到心中有数。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包括中英之间）集中广州，主要折算货币是用银元（当时为西班牙的“本洋”，主要铸于西班牙属的墨西哥），《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的货物得以销往中国内地，无论缴纳一些税或在交易中，都以银两计算了。另外，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一项除给英国军费 1200 万元外，还包括有商欠 300 万元和赔偿鸦片烟价 600 万元，这些在当时都是以“商品”的面貌出现的，故而仍旧以银元折算。以后的不平等条约，绝大多数的赔款内容则主要为军费了。这可能也是改“元”为“两”的一个原因。两和元所含银量不同，按西班牙“本洋”算，1 银元约为清朝库平银 0.72 两（七钱二分）。

钻研课文的历史知识要点，还要特别注意新教科书比原教科书的“更新”变化之处，因为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几套新教科书在讲到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时，都不是像以前那样，把匈奴仅仅说成是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与秦汉王朝的关系是强大的中原王朝与一个边疆民族的关系，而是讲清当时秦汉统一了中原地区，匈奴则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秦汉与匈奴的关系是两个强大民族统一政权间的“对峙”关系。至于课文中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的变化和史料选择上的更新，在新教科书中更是举不胜举的。这些地方，教师在钻研课文时都应该着意体会，从而更准确地掌握课文的知识要点。

关于文字的注释部分，前一章介绍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结构时已经讲过，它不仅如原教科书那样是对课文中一些文字的注释（如注字音、古今地名对照、原始资料字句的释白今译等），而且起到“分解史实”的作用，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版与广东版的历史教科书更是如此。例如，前边提到过的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一册关于商朝青铜器的一段，课文中叙述得比较概括，而要想深入了解青铜器的成份、冶铸和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青铜器的艺术珍品，就需要参照、钻研页下的注释，等等，非此，教师是很难掌握商朝青铜器的知识要点的。

一课的插图，有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两种；历史图片又可分作文物照片和想象画。它们都是紧密地配合着课文内容而插入的，是加强理解课文文字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插图，历史教师在备课时同样需要认真地给

予钻研。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一册第六章第一节《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印有秦王朝“统一货币”的文物照片插图。上面有统一货币前六国的货币（韩、赵、魏三国的铲形币，称“布币”；齐燕两国的刀币；楚国的黄金郢爱钱；秦国的方孔圆钱）和统一货币后全国通用的方孔圆钱。对之，教师要很好地钻研，弄明白各种货币的形样和使用情况，甚至一个形样的货币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轻重、大小等也有差异的情况，然后结合课文中的文字叙述体会它的混乱、不利于统一国家经济交流的弊端，更好地认识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意义。在广东版《中国历史》第二册中有武则天、黄巢、一行、李白、杜甫、白居易、黄道婆、毕升、郭守敬、辛弃疾、关汉卿、李自成、李时珍、曹雪芹等一些人物像插图，便都是后人的想象画（有的是后人想象的塑像或木雕像的照片）。想象画虽然不如文物照片逼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使用，但是，由于其为后人依据历史记载而绘画或雕塑的，教师仍要好好钻研，体会它所反映的人物风貌、气质或特点，并与课文的文字部分相结合，加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感受。

历史地图插图更重要。它是表示课文文字部分所述历史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不可或缺的插图手段；认真地阅读、钻研历史地图插图对于理解课文有着重要的意义。钻研历史地图插图，应该细致，务求准确地掌握地图上所显示的历史活动空间观念。如，历史地图插图中的各种“形势图”（像《春秋形势图》、《战国形势图》、《三国鼎立图》、《辽、北宋、西夏形势图》、《金、南宋、西夏形势图》等），其上表示的主要是当时各个政权的地域范围及它们之间在空间上的关系（接壤与否，远或近等），对之教师都应该准确地掌握；其他如“疆域图”（主要表示世界各国的疆域范围及变迁和中国历代王朝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区域等）、“战争图”（主要表示战争双方或几方进军、退却、攻击、防守等的路线及重要战场）、“交通图”（主要表示陆上或海上的交通路线）等等，亦都一样，需要结合着课文的文字部分，很好地认识其在地域上的历史特点。

钻研历史地图插图还要注意图例说明，准确认识地图上不同图例所表示的内容涵义，应该注意历史上地名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变迁，明白历史上某些地方相当于今天的何地。为此，除认真阅读历史地图上标明的古今地名外，还可以参照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当今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共八册）和关于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书籍，保证在地理概念上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3. 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的。一节历史课的教学目的应该包括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三项。这是需要在钻研教科书本课内容后才能确定的。

关于历史知识的传授目的，前边在钻研课文内容、明确知识要点及其结构中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对于本节课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则要结合着“大纲”中有关内容和本节课的实际认真考虑、深入挖掘，然后再予确定。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三册“武昌起义”一课，经过钻研“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内容，教师便可以明确这节课里既有对清政府卖国、帝国主义掠夺、霸占中国铁路筑路权的揭露，也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前赴后继进行革命斗争、不惜牺牲的崇高精神的

讴歌（如黄兴负伤指挥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喻培伦的牺牲和“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起义前夕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给父亲和妻子写“绝命书”等）；既有时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专制统治被推翻的叙述，也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后软弱表现的伏笔（如“邀请諮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等），从而确定本课的思想教育目的主要是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包括从革命先烈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舍身取义的崇高美德教育；同时，通过中华民国建立和清王朝的被推翻，也向学生进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本课在能力问题上，明显地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如，透过“四川保路运动”内容，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清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等）和历史地、辩证地观察历史的能力（如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认识等）。

确定一节历史课的教学目的，一定要从教科书的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点、可接受性出发，要实事求是，同时亦要对全册教科书作通盘考虑，定的应该深浅适度，体现出教学目的的连贯性和逐步加深、循序渐进。

4. 确定本节课的重点、难点。重点，指的是本节课所涉及历史内容的重要部分，它与一般内容相对而言。难点则主要是从学生学习、接受本节课的内容来说的；他们对有些部分容易弄懂，有些部分较难理解。较难理解的部分便是难点了。

一节课总会有重点和非重点，但是，它不应该由人为主观地确定，而要依据于教科书的内容自身，事实上即是依据于历史发展本身的实际。如，有的教师把一次农民战争课的重点定为起义的爆发原因，认为这样才能够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揭示农民战争的性质，帮助学生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有教师认为一次农民战争的过程应该是重点，因为只有讲清楚这个具体的过程，才能够看到农民战争的革命活动怎样打击了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也有的教师强调农民战争的意义，认为这才是表示农民战争伟大历史作用的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课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角度强调科技部分是重点；有人从对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角度认为唯物论思想家应是重点；也有人认为我们是历史课，古代的史学理应当作重点。不言而喻，以上的看法都是片面的，都给人一种主观臆定的感觉。

我个人的看法，大凡历史上一次战争或事件，都不能从其原因、经过、意义中去确定重点，同样，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某一历史现象如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文化繁荣等，也不能够只选择其一个方面确定重点；而应该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从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影响大小或占据的地位上，确定其重点与非重点，这里包括了历史时期（或王朝）、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等等。如，西汉与莽新，五代与唐、宋等时期相比，西汉与唐、宋应是重点，莽新与五代时期不能列为重点；就西汉的历史说，汉高祖刘邦、文景和武帝在位时期，显然是重点，而其它皇帝在位时期与之相比应是非重点；战国时期各国都进行了政治变革，但是从彻底性和历史作用、效果上看，秦国的商鞅变法更为突出，因此，商鞅变法被列为“新兴地主势力的壮大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一节的重点，而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等只是作为一般内容提一下。在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是，相比较而言，中英《南京条约》、中日《马

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中，从“开端”，到“大大加深”，到“彻底沦为”，起到的影响特别严重。在历史人物上同样如此，一次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要涉及到许多人物，但是其中作用最大的、业绩或地位最突出的往往被作为重点，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大泽乡起义中的陈胜，官渡之战中的曹操，淝水之战中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谢安，北宋中期政治改革中的王安石，南宋抗金斗争中的岳飞和抗元斗争中的文天祥，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等。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亦然，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在隋朝重点是讲它的创立，唐朝重点讲其发展和历史进步作用，明朝“八股取士”则重点讲这种制度的腐朽，不同时期各有着不同的重点。

一定明确，一节课可能只有一个重点，但是也可能有几个重点（譬如每个子目有一个重点），因此，我们不应该人为地在一节课中刻意地去硬性规定一个重点。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版《世界历史》上册“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一课就是一个重点，即14—15世纪时，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在《中国历史》第二册明朝“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一课，则包含着“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两个重点。

难点需要结合着教科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同样地在一节课中可能有一个或几个难点，也可能并无难点，都要实事求是。同时，难点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仅是某一个专门知识点的理解或头绪较多难于理清，有的则是涉及到理论问题，需要依据史实给予理论上的分析，方可解决。前者如中国古代史中，通过北京人的头部特征和下肢骨的进化，说明他已是人类但仍残留某些猿类特征；张衡发明、制作的候风地动仪的原理；僧一行实测于午线的“子午线”含义和意义等等，在低年级的学生中往往不好理解。世界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属于头绪较多的内容，如果不注意条理清楚，学生常常觉得乱，难于掌握。后者，如世界历史上的美国独立战争，有个北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同时还有个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这些都是这场以民族独立战争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原因，其中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就有一个学生较难掌握的民族理论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形成垄断集团、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究其原因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也都是学生比较难懂的理论问题，等等。

第二，了解所教班级学生的情况。

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只有把教科书的内容让学生掌握了，我们的教学任务才能够算是真正地完成。这一点，教师在备课时必须给予高度的注意。一些有经验的历史教师都有体会，所谓备课包括着“备教材”，同时也要包括“备学生”。“备学生”即是要深入地了解自己授课班级学生的情况，这样备出来的课才会是有的放矢的课。

学生的情况，指他们已经具有的与本课有关的历史知识，包括小学历史课中学习的，从其它历史读物、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戏剧中获得的；也指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年龄心理特征，如学生遇到某些国内外时事问题不能很好理解，而又与我们将要讲授的历史课有着密切关系的，或是学生成长中在品质道德等问题上产生困惑而可以通过历史课帮助其明确取向的。再如，

初中不同年级间和初、高中的学生在思维、情感等年龄心理上的差异等。

了解学生的情况，可以通过与个别生谈话或向历史科代表了解，也可以有意识地设计“问卷”，请全班或部分学生填答，然后进行分析、了解。

第三，组织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一般地，这步备课工作又被称作是“组织教材”。实际上，即是在教师钻研教学内容后，结合了解学生的情况，根据课时限制，认真地考虑如何把这一节课的内容教给学生。这就好比是一个作家、剧作家或科学工作者在他收集了足够的素材或是经过反复研究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后，总是要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材料或心得、成果，最后通过小说、剧本或论文、专著等形式表述出来。这里，自然就有一个思路、选材和组织表达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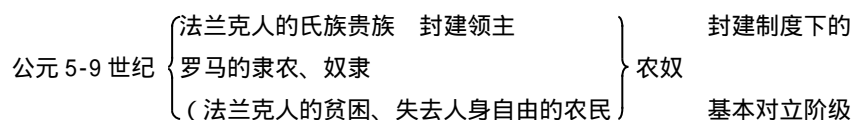
首先，组织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从思路上应该基本上依据于教科书，不要搞“另起炉灶”。这是因为编写教科书时已经经过了一番编者的“组织”工作，它已经充分地考虑了如何把规定的历史内容按照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加以组织编排，通过教科书的各个组成部分，编写出来。如教科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如何安排内容顺序，教师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也照样去安排内容；教科书多予着墨、写的多的地方，教师即多讲一些；教科书一笔带过、少写的地方，教师对之轻描淡写。这样做并不是“偷懒”，而恰恰是尊重教科书，顺乎规律，备课不离“蓝本”。我曾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历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课。按照教科书的安排，在这课中“美国参战”的内容是在“大战的结束”子目中，但是，这位老师为了突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大战结束的作用，便把“美国参战”的内容放在“大战的经过”中去讲。据这位老师说，这是对教科书的一个改动。很明显，这种“改动”结果是费力不讨好的。这样做，一方面打乱了大战的时间顺序，把后边的历史事实硬拉到了前边；一方面也没有能够很好他讲清楚大战的结束原因，因为美国参加到协约国一边，确实极大地加强了协约国的力量，对于战争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反之，只把大战的结束归之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果便会给学生以片面的认识，造成看问题绝对化的错误思维方法。同时，不能够真正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狡猾面目，对于认识美国在大战中和战后加强控制世界的事实也无法更好地给予解释。这个例子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教学内容时，随意地改动教科书的安排，是不可取的。

其次，组织一次课的教学内容，基本上依据于教科书，并不是说不要教师对之给予加工、安排，相反，教师对于本节课的内容是有许多组织工作可做的。

例如，为了突出重点，解决难点，有的教师提出对教科书的内容应该适当地“化繁为简”，或者“变简为繁”，即是一种组织、加工工作。“化繁为简”指的是比较复杂或头绪较多的内容，学生难以掌握，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酌情于“简化”的工作。像中国古代史的商鞅变法等战国时期各国变革运动的背景，要从春秋时候讲起，内容较多且杂，教师便可以“简化”成：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出现一私田大量开辟，井田逐渐破坏一私田上出现新兴地主与农民的新的生产方式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不断壮大，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大的权力，在各国掀起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建立封建制度的变革运动

其中最彻底、影响最大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样，既把这段历史内容的前因后果简单地勾勒清楚，又由浅入深地告诉学生关于生产力发展必然促进

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迟早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这样一条历史发展规律。再如，世界历史上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内容头绪多并且复杂，学生不好掌握，教师亦可以将其“简化”成以下图示：



使用这个“图示”再结合具体史实的讲述，学生就会好掌握多了。

“变简为繁”是说在本节课的重点部分，课文写得比较概括，就需要教师利用小字和注释部分的史实或适当补充一点教科书以外的史实，使之丰满起来，生动形象化，以帮助学生掌握。如，前边讲过的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一册关于商代青铜器的内容，显然是反映商朝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本课重点，但是，正文部分的文字却比较概括，教师组织教学内容时就应该结合着注释中关于青铜成份和冶铸特点，以及对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的具体描绘，使之“繁”起来，让学生对我国在那时候举世无双的青铜艺术有个形象、深刻的印象。再如，《中国历史》第二册讲到唐朝与东突厥的关系，教科书只是说：“唐朝初年，东突厥骑兵经常南下骚扰，威胁新兴的唐王朝。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等率领大军在阴山大败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文字很简单、概括。有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深刻认识打败东突厥对于巩固新兴唐王朝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依据新、旧《唐书》的记载，补充了一段史实，形象地说明在唐军大败东突厥的消息传入长安后，唐朝君臣为庆贺胜利举行了盛大宴会，已是太上皇的李渊奏起了乐器，皇帝李世民亲自跳起舞蹈，宴会通宵达旦，君臣们欢庆了一夜。这样“变简为繁”地组织一下教学内容，很明显地就把原来教科书讲活了。

在组织教学内容时，也有的教师很注意突出历史人物的形象，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前边已经提到，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按照旧史书的纪事本末体编写的，除了文化部分外，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以事带人”的写法，即讲一个历史事件，其中“带”出一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或姓名。这样的编写方法，事件非常清晰，可是人物的形象却不突出了。如，商鞅变法，一般的教科书都是写了它的背景、变法时间、主要的变法内容及其意义，而对于秦孝公和商鞅却大多一带而过，给人们一种“见事不见人”的感觉。有的教科书虽然补充了一些商鞅和秦孝公的活动，但是，也很不系统，不能较完整地给学生以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商鞅）的形象。北京市特级历史教师陈毓秀讲这课时，在组织教学内容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她打破了教科书基本上“以事带人”的编排方法，改用基本上“以人带事”的讲法，依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以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适逢秦孝公发奋图强、招揽人才之机，西入秦见孝公，两人谈了三天三夜非常投机，孝公遂命商鞅变法；商鞅立木为信、颁布新法，又与守旧贵族进行了斗争，最终在孝公死后虽被车裂处死，但是由于新法使“秦民大悦”，已经深入人心，因而推行下去，秦国也随之富强起来；这样一条基本线索，“带”着讲述变法的内容和变法意义。她的这一课教学，既讲清楚了商鞅变法的内容，又讲出了栩栩如生的商鞅、秦孝公等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给学生以历史有血有肉的深刻印象。

象。

有的教师则十分注意学生的认知规律，在组织教学内容时，总是先设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然后再正式讲述本节课的内容，效果也十分显著。时宗本老师的课即是如此。他在初中一年级学生学习历史第一课“我国最早的人类”，讲到北京人时，不是简单地按照教科书的内容，从时间、地点上讲北京人的体型特征以及他们的生活情况，显得枯燥乏味，而是先简单讲述北京人的考古发掘过程，说：“北京人的发现者是我国著名科学家裴文中教授，当然这个伟大的发现同当地人民也是分不开的。我国中药店有一味药材叫‘龙骨’，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有一座‘龙骨山’就生产这种‘龙骨’。当地老百姓常在山上挖到‘龙骨’，卖给中药店。后来有的科学家发现，所谓‘龙骨’原来是一些古代动物骨骼的化石。

1927年，科学工作者开始在龙骨山进行系统的发掘，不久发现了一枚原始人的牙齿；后来又挖出一个上颌骨，上面带着三枚牙齿；到了1929年12月2日，在裴文中教授主持下，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消息发表，震动了世界。这就是距离现在约有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北京人的头盖骨发现以后，科学工作者们在周口店又陆续发掘出北京人的肱骨（上胳膊骨）、锁骨（肩骨）、月骨（手腕骨）和股骨（大腿骨）。这些骨骼化石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分别属于40多个人的。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之内，在周口店挖掘出的人骨化石、动物骨骼化石、石器共计十多万件。在一个地点出土这么多古代人类的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这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从来没有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周口店，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原先发掘出的那些珍贵标本，被装入木箱，藏到协和医院的地下室里。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在紧急情况下，标本将被送到美国‘保护’起来。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协和医院，‘北京人’从此下落不明：是早被送往美国，还是被抢到了日本？美国人和日本人都说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北京人’是被帝国主义分子偷走的。

1949年北京解放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人民政府在此兴建了中国猿人陈列馆，这里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宗本老师这样组织教学内容，对于刚刚跨进中学大门听第一节历史课的学生来说，不但使其饶有趣味、由浅入深地步入历史殿堂，而且能够自然地受到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

时宗本老师在讲世界古代史时，考虑到一些外国古老的历史对今天中国学生来说势必是遥远而陌生的情况，总是在讲这些国家的历史前，先从现实说起，然后引导学生由近及远地去追溯它们的历史，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如他讲“古代希腊”时，就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吸收古希腊“廊柱式”建筑的某些特点，现代的椭圆形露天体育场与古希腊在山坡上建筑的剧场的关系，美国航天器用古希腊主神宙斯儿子、太阳神“阿波罗”命名，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古希腊奥林匹克城四年一次的盛会（会上要表演一些体育项目），以及“喜剧”、“悲剧”、“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现代人们常用的名词亦都来源于古希腊等事实讲起，然后告诉学生，虽然现在希腊是一个小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也不怎么大，但是，古时候的希腊却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由古希腊文化开始算起，到现在有三千多年，可是，现在我们随时随地还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影响，不但在欧洲是这样，在全世界各处也都是

这样”。在讲完这段以后，时宗本老师才在学生热切盼望了解古希腊历史的气氛中，开始讲授古希腊的“爱琴文明和‘荷马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奴隶制城市国家的两个典型”，以及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古希腊衰落的历史内容。

当然，我们不是要教师们在组织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时，都照搬照抄以上的例子，但是，我们却应该从以上优秀历史教师的教学实例中，体会到他们在组织教学内容时是怎样地匠心独运，并且以工作为借鉴、启发，很好地完成自己在备课中组织教学内容的这一重要步骤、环节。

第四，编写本节课的教案。

教案，又叫“课时计划”。它既是教师钻研与组织本节课内容的最终落实，也是教师上课时的具体蓝本。编写好教案，一方面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前面教师认真钻研、组织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注意编写的格式和文字表述。它本身在教学工作中，常常即是一篇凝聚着教师教学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杰作。

一份历史课的教案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采用如下格式：

1. 本课课题题目，授课班级和授课时间。
2. 本课教学目的。
3. 教学的重点、难点。
4. 讲授提纲(常常是课堂上的板书提纲；现在有的历史教科书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上编有这部分内容，教师可以参考)。
5. 教学方法。
6. 教学手段和用具。
7. 教学过程(这是一份教案中最主要的部分，常常是教师准备怎样教这节课，即怎样写，其中包括课题及板书提纲，每个小标题之下的讲授内容；也包括采用的教学方法，如何让学生阅读教科书，何处穿插提问或让学生讨论，何处挂出历史图片或历史地图、使用直观教具或现代化教学手段等，还包括一节课的全部环节如讲新课前复习旧课、导入新课、小结新课和课上练习、布置课下作业等)。
8. 本节课小结(可以写上自己上课的感受，体会到的优缺点，学生的反映，以及其他听课老师或领导的意见，供以后提高教学参考；积累起来，也是自己教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一般说，年轻的尤其是刚刚走上讲台、新教课的教师，教案应该写得详细些，以便上课时能够心中有数；对于年岁大些、已经教学多年、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可以把教案写简单些，甚至只写一个较细的讲授提纲。但是，由于教科书总在不断地更新、变动，史学的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生的情况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因此，原则上讲一遍课，就要备一次课，同时写一份教案，那种一份教案教下去长期不予修改、重写的做法，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利，是不可取的。

附录：第一次世界大战（教案）

教学目的：

一、基础知识：萨拉热窝事件 马恩河战役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日德兰海战 大战的结束 大战的后果

二、思想教育：

1. 帮助学生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引起的，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疯狂扩军备战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2. 帮助学生认识战争给交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帝国主义战争引起了革命，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3. 帮助学生认识无线电通讯等现代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加强学生对邮电事业的认识和热爱。

三、能力培养：

1. 运用历史地图展现大战的进程，培养学生识读历史地图的能力。

2. 在教师引导下，让学生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性质、影响诸问题，初步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教学重点：

萨拉热窝事件 西线三大战役 大战的结束和后果

教学难点：

帮助学生理解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辩证关系。

教学方法：

1. 以讲为主的启发式教学。
2. 以直观教具和电化教学为辅助手段。

教学用具：

1. 自制历史教学挂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形势图》一幅。
2. 自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线索图示简表》（小结、巩固新课用）。
3. 编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录相资料片》。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和导入新课）

1. 19 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形成了哪三个矛盾的中心环节？

2.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哪两大军事侵略集团？每个集团由哪些国家组成？

3. 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的对抗，导致了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其中，哪个地区的局势最为紧张？

（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

1908 年，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12 和 1913 年又发生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既有强烈的民族解放情绪，又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它像一个火药桶，只要有一点星火，立即就会引成一场世界大战。

（讲授新课）

一、大战的爆发

1. 萨拉热窝事件（1914.6.28）

（展示《1914—1918 年欧洲形势图》）

1914 年 6 月，奥匈帝国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进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作为它的假想敌人。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亲自检阅了这次军事演习后，故意选择 500 多年前塞尔维亚沦为土耳其统治日的 6 月 28 日，巡视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这个明显的蓄意挑衅行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于是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放映录相片《萨拉热窝事件》）。那天，当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乘坐敞篷汽车，在总督和市长陪同下，行驶到萨拉热窝市一个街头的转弯处时，汽车的速度减慢了，突然，一个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急步向前，举起手枪对准斐迪南夫妇连续开枪，把二人当场击毙。这便是萨拉热窝事件。

2. 德奥挑起大战（1914.7.28）

我们知道，斐迪南夫妇的死本来是罪有应得的。可是，这个萨拉热窝事件却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萨拉热窝事件刚一发生，德皇威廉二世即兴奋地叫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也说：“现在是到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奥匈帝国经过与德国策划，立即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并于 7 月 28 日向塞尔维亚宣战，炮击贝尔格莱德市。塞尔维亚被迫应战。在此后的一周内，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战争很快地超出欧洲的范围，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卷入战火，成为一场世界大战。

3. 大战的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军事侵略集团之间进行的。（提问）（1）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2）其中，塞尔维亚进行的又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虽然塞尔维亚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但是，在整个大战中只是局部和从属，它改变不了整个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

二、大战的进程

战争开始后，欧洲成为主要的战场，形成了西线、东线和南线三条战线，东线和西线具有决定意义，而西线更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法国巴黎东北部的马恩河战役，是西线战线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1. 马恩河战役（1914.9）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指图），德国位居中欧，西侧是协约国的法国，东面是协约国的俄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东西受敌，早在 1905 年，德军参谋长施里芬就制定了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西线，而在东线采取守势，只部署其 1/10 兵力。在他看来，俄国的战争动员至少要经过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因此，他决定在俄军投入战争之前，先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用 4 到 6 个星期的时间迅速地击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回师东进、对付俄国。争取在 2 到 3 个月的时间内赢得整个战争。

大战一开始，德国便沉醉在自己设计的这个美梦中。德皇威廉二世曾对

整装待发的士兵说：“叶落之前你们就会返回故乡！”1914年8月4日，德军开始实施“施里芬计划”，他们避开贝尔福——凡尔登一线的法国防御体系，以主力突袭，侵入中立国比利时，企图攻陷法国北部，横扫巴黎以西以东地区，并包抄消灭部署在法德边境的法军主力。出于预料，德军在比利时却遭到了顽强抵抗，结果，用了18天时间才通过比利时。在此期间，英国远征军却已渡海赶到法国，迅速地进入阵地。8月下旬，德军摧毁英法联军的抵抗，进入法国，并向巴黎挺进，把战线一直推进到巴黎北部，其前锋距巴黎只有15公里。法国被迫将首都迁到波尔多。正当德军以为“施里芬计划”即将实现、胜利在望时，受挫的法军及时地总结失利的教训，迅速地调整部署，并在巴黎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值得注意的是，法军上述举动，远在德国科伦的德军参谋长小毛奇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早期的无线电通讯技术还不够完备以及恶劣气候的影响，在关键时刻德军通讯中断。（屏幕定格展示：“一战”中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当过时的情报传来时，德军已经无法再顺利地实施“施里芬计划”了。他们只得改变军队的运动方向，先折向南方，以后又折向东南。9月初，英法联军大举反攻，双方在马恩河地区展开了大会战。

在马恩河200公里的战线上，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50万人，火炮6600多门。经过4天4夜的激战，德军被迫退守埃讷河一带，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到年底，整个西线呈现胶着状态。（提问）马恩河战役的结局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它宣告德国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从整个大战来看，马恩河战役的结局和“施里芬计划”的破产，已经预示着德国军事冒险主义的最终失败。所以会战一结束，德军参谋长小毛奇就向德皇呈述：“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2. 东线战事（1915）

1914年8月中下旬之交，俄军攻入东普鲁士。德军被迫从西线抽调军队加强东线，并在马祖尔湖战役中击败俄军，然后攻入俄国境内。与此同时，俄军也击败奥军，进入了奥匈帝国的东北部。年底，东线也出现对峙状态。为了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1915年，德军将主力调到东线，虽然大败俄军，但是，却没有能够达到迫使俄国投降的目的。1916年，战争的重心再次转回西线。这时，战争双方都把一些最新式的武器投入到了战场上。

3.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1916）

德国和英法在西线的第二次大会战，是在凡尔登展开的。当时，德军所以选定凡尔登为其进攻目标，是因为它看中了凡尔登重要的战略位置。这里既是法国的著名要塞，又是法军阵线的枢纽和通往巴黎的门户。德军当时扬言，要使凡尔登成为“碾碎法军的磨盘”。请看凡尔登战况：（放映录相片《凡尔登战役》片断）1916年2月21日，27万德军在1000多门大炮和毒气的掩护下，向10万法军守卫的凡尔登发起猛烈进攻。仅第一天，德军就发射了100多万发炮弹，并且将法军防线突破。在此后一周内，法军也迅速向凡尔登调集了19万兵力和25000吨弹药，试图拼死守住这个要塞。双方经过一连几个月的恶战，战壕被摧毁，森林被烧光，山头被削平，阵地笼罩在一片硝烟烈火中，到处是被击毁的战车、大炮和士兵的残肢断体。

10月，法军开始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是一次大战爆发后空前惨烈的战役；双方士兵死伤共达70多万。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此后，德国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落。

还在凡尔登战役进行的时候，为了牵制德军，支援凡尔登战役，英法联军在西线发动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索姆河战役（放映录相片《索姆河战役》片断）。

1916年7月，英法联军在巴黎西北的索姆河地区向德军展开进攻。双方在这次战役里，共投入兵力170个师，使用了飞艇、飞机、远程大炮、机关枪和英国新发明的坦克等新式武器。当十几辆庞大的钢铁怪物隆隆怒吼着，履带铿锵作响，冲破带刺的铁丝网，碾平掩体，用机枪和火炮向德军射击时，德军魂飞魄散，慌乱地丢弃了阵地。索姆河战役空前地激烈和残酷，仅进攻的第一天，英军就死亡6万人。这场消耗战一直打到年底。战役结束时，双方共损失兵力达120多万。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是英法与德国双方企图战胜对方的最大战役，结果，哪一方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4. 日德兰海战（1916）

为了突破英国舰队的海上封锁，德国决定主动出兵。1916年5月31日~6月1日，英德双方在北海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海面进行决战。结果，英舰虽有损伤，但是，制海权却仍然被英国舰队掌握，德奥被海上封锁的局面没有能够改变，国内的经济更为困难。

三、大战的结束

两年多的帝国主义大战，使交战双方均已疲惫不堪。美国的参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战争最终结束。

1. 美国参战（1917）

（设问）从大战开始直到1917年，美国参战了吗？是的。它一直是中立的面孔出现，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战争的任何一方，却不断地向交战的双方出售军人和其他物资，从中牟取暴利。战前，美国欠欧洲近60亿美元的债款，到决战结束时，它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还借款给协约国100多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的态度开始变化。因为它见到交战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德奥的败局已定。如果参战，既可以轻易地取胜，坐收渔翁之利，又有利于在战后夺取世界霸权。于是，它便借口德国在1917年2月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在这年的4月对德宣战，12月对奥宣战。美国的参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大批的军用物资和100多万美军被源源不断地运抵欧洲，使得协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地增强。两大军事战略集团的力量对比更加有利于协约国，而不利于德奥的同盟国。

2.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和苏俄退出战争（1917.11）

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大战中它的各方面的弱点都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上，沙皇政府的外债已经高达80亿卢布。在前线，士兵长年在阴冷泥泞的战壕中作战，被服不足，武器也供应不上，有时三个士兵合用一支步枪。由于指挥上的昏聩无能，兵员的损失十分惨重，俄国伤亡和被敌军俘虏的士兵达900多万人，居交战国首位。在后方，因为燃料不足，工厂被迫停产，交通运输也陷于停顿；大批农民被驱往前线，农田大片地荒芜。1917年1月，彼得格勒的面粉只剩下了10天的储存，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痛恨沙皇政府，反战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但是新政权却掌握在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继续进

行战争，不给人民和平和面包。（放映录相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片断）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经过与德奥谈判，于1918年3月签订和约，坚决地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东线战事结束。

3，奥匈帝国的瓦解和德国投降（1918.11）

1918年3月到7月，德国孤注一掷地在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投入了约200个步兵师、16000门大炮和3000架飞机。但是，都没有能够取得预定的战果，反而损失了70万士兵和大量的武器弹药，后备力量几乎消耗殆尽，新兵补充来源枯竭，军火供应亦告匮乏。从7月中旬起，协约国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9月下旬，协约国联军发动总攻，德军防线全面崩溃。

那时候，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推动下，各交战国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1918年10月下旬，奥匈帝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宣布独立，在前线的士兵也拒绝作战，帝国彻底瓦解。1918年11月3日，德国国内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倒台，逃往国外。

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宣告结束。在终止这场帝国主义大战中，各国的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大战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多，卷入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伤亡总人数超过2800多万。（提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什么后果？（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战争使各交战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与战争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大战促进了各国人民觉醒和革命运动高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沙俄、奥匈、德国、土耳其等4个帝国崩溃了；英、法被严重削弱，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始料不及的。

（巩固、小结新课）

1. 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线索图示简表》小结本课。

2. 引导学生讨论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因素有哪（布置作业）

1. 名词解释：萨拉热窝事件

2.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经过，分析这场战争的性质。

（北京市二中朱广管；本课曾参加北京市市级优秀课评比，并获奖）

第二节 历史课堂教学

一、历史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

课堂教学，又称“班级教学”，简称“上课”，是与“个别教学”相对而言的。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所以如此，是因为课堂教学能够做到“1.把相同或相近年龄和知识程度的学生编为班级，使他们成为一个集体，可以相互促进和提高。2.教师按固定的时间表同时对几十名学生进行教学，扩大了教育对象，加快了教学进度，提高了教学工作效率。3.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方面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使教学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发展教育事业。4.各门学科轮流交替上课，既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又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减轻学习疲劳。”

应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内，冲击、削弱历史课堂教学地位的情况是存在的。如，前面提到过的部分人由于片面地理解“社会大课堂”的作用，曾经以到社会上学习“四史”、编写“四史”，部分或全部地替代学校中的历史课堂教学，即是其表现之一。前几年，也有同志片面地以课堂教学不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发挥对个别生的教育作用为理由，夸大历史课外活动的作用，有意无意地贬低历史课堂教学。如，提出历史课堂教学与历史课外活动，如同一只鸟的两翼，同样重要，地位应该相当，等等。

事实上，一切贬低、削弱历史课堂教学为历史教学主要组织形式的看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学生在学校中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时间和主要形式，不能不是课堂教学，只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才能够确保历史教学任务、目的的全面完成，才可以真正地把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与要求付诸实施；而一位历史教师要想提高历史课的教学质量，其主要的途径也必然地是要通过课堂教学。谁也不能够想象，如果舍弃或者削弱了历史课堂教学而另辟途径（如通过课外活动等），可以完成上边所提到的一切？

因此，作为一位历史教师要想教好历史课，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技巧，让学生真正地学好，其主要的精力和功夫无疑地是要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上，把它视为自己教学工作的主“战场”。

二、历史课堂教学的类型和结构

历史课堂教学的类型，又称类别，是一节历史课的自身体系、特点和结构的综合表现；确定了课的类型，就可以更加自觉地组织好一节完整的课，完成这节课的教学过程和教学任务。

现在，对历史课堂教学的类型，有几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从教学内容上着眼，把历史课分作为经济史课、政治史课、文化史课、民族关系史课、战争史课，等等。一种是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划分，有“以讲为主的启发式课”、“四段教学法课”、“图文示意课”和“情感教学课”等。还有一种则是从一节课所要完成的任务上来划分的，有综合课和单一课等。

我们认为，比较起来，第三种划分方法比较科学，也于教学实际更为有利。因为，如果从教学内容上划分，一是这些内容往往不是绝对的，如经济

史常常含着政治史的反作用，而政治史又常常要追溯到经济史上，从中找出政治史内容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是无论什么教学内容，就其教学方法和教学环节看，往往有许多是相同的，作为一节课的教学过程自身，很难找出它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按照教学方法来划分课的类型也有问题。我们知道，一节历史课纯粹地只用一种教学方法的情况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经常的情况是在一节历史课中可能有一种教学方法是主要的，但是，同时也辅之以其它的教学方法。因此，单纯以教学方法来划分历史课的类型，是很困难、不科学的。而如果用一节课所完成的任务作为划分课的类型标准，则既可以区分开不同类型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也能够更好地确定其不同的教学环节，从而把不同类型的课明显地区别开来。下面即以这种方法，阐述历史课的类型和环节。

1. 单一课：指一节历史课只完成一项任务的课型。如导言课；单纯他讲授新知识课；复习课；考试课和讨论课等。

(1) 导言课：指在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讲授前，教科书上的第一课《导言》（有的教科书用《历史告诉我们什么？》等标题）或一个年级（一个学期）讲授新课以前的“导言”课。这种课的内容往往包含了对学习历史（或本段历史）目的的阐述（如，“为什么学习中国历史？”“为什么学习世界历史？”等）和这段历史基本线索的勾勒，以及学习方法的提示（如，“怎样学习中国历史？”“怎样学习世界历史？”）等。导言课的任务在于引起学生学习本段历史课程的兴趣、积极性，初步概括地了解一下将要学习的历史内容，并且大致知道学习的方法和要求，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开始对本课程的具体学习。

(2) 单纯讲授新知识课：有的是限于课时紧而内容多的课。不可能完成其他教学任务，只能单一地把新知识讲完；有的则是在两节或三节课时集中他讲授一个课题（如，巴黎公社用 2 课时；有的文化史课须要 2—3 课时才能完成等），其第二或第三节可以紧接前节课的讲授，一节课以讲授新知识为主。它的任务比较单一。

(3) 复习课：有阶段复习课（如讲完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一个单元课时之后的复习课）和总复习课（如讲完中国古代史以后或整个历史课学习结束于高考前的复习课）等。其任务是单一地复习所学过的历史知识，起到把知识系统化、加深理解和巩固的作用。

(4) 考试课：有阶段测验和期末考试、会考、高考等不同种类。但是，这种课的任务也是单一的，即目的在于通过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绩，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今后历史教学的质量。

(5) 讨论课：现在一些学校历史课中采用的一种课型。在学习完一个重要课题的历史内容后进行，如世界历史学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专门用一节课组织全班同学（或分组）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各种力量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最后由教师总结，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它的任务是根据已经学习过的历史知识，在教师组织、引导下，由学生发言进行讨论，也是单一的。

2. 综合课：完成两项教学任务以上的历史课，都称综合类型课。这种课是目前历史课最普遍、最常用的课型。

由于综合课所要完成的任务较多，因此，其所包含的环节也较单一课要多。一节综合课一般有以下环节：

1. 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这个环节一般地在上课后讲授新课之前进行，可以通过提问旧课（可以是上节课，也可以是以前讲过的课）中的问题，既检查、了解学生对旧知识掌握的情况，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使学生在“温故”中与将要讲授的历史内容联系起来，导入新课，起到“知新”的作用。如讲授中国近代史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有的教师在讲授新课前提问同学两个问题：“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与结束在哪一年？”这两个问题既复习、检查了学生对前几课的学习，同时，也都为即将讲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课作了准备。如，第一个问题可以引入第二次鸦片战争何以爆发（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权益，提出“修约”要求，未达到目的，遂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可以为讲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何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化更加加深，准备相比较的内容；第二个问题则可以直接地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相联系，使学生了解这次侵略战争的历史时代背景。

2. 讲授新课：这是一节历史综合课的最主要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将集中他讲授新课的历史知识，完成新课的主要教学目的。

3. 小结、巩固新课：这个环节在讲完新课内容后进行。可以由教师结合着板书提纲将本节课的内容概括、条理地进行串讲、小结，同时点出重点，也可以用提问方法，通过学生回答，将本节课的内容重点、线索进行小结，既给学生以知识的条理，也加深他们的印象，起到巩固新知识的作用。

4. 作业：有的课后习题（如简单的填空、选择题）可以在课堂上指导学生练习，有的习题（如问答题）则可以布置学生阅读教科书于课下复习或练习，准备下节课时检查。

三、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教学方法

确定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教学方法，必须依据于历史教学的规律，围绕着历史教学的过程。

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历史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认识过程，即通过一定的教学工作和手段，使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包括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培养能力和在思想上受到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一切认识过程都包含有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历史教学亦不例外。基于这一规律，历史教学过程一般地遵循着如下的阶段进行：1.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2. 感知历史知识；3. 理解历史知识；4. 巩固历史知识；5. 运用历史知识。应该说，在以上每个阶段中都同时包含有能力的培养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

在明确了历史教学的过程以后，很明显地历史课堂教学应该采用如下的一些基本方法。

第一，讲述法

指教师运用语言具体形象地讲述史实的教学方法。它要解决的主要是学生感知历史阶段的任务，也即是认识历史事实、历史表象的问题。根据学生认知历史的特点，应该说，这种教学方法是在一节课中占用时间最多的方法。如果没有讲述法，学生就很难了解到历史的进程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始末、

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上典章制度的内容。它是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细分一下，讲述法又是由叙述、概述和描述三种方法组成的。

叙述法，是教师对教科书中的史实部分有条理地、清楚地进行讲授的方法。如《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课（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历史》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教师在讲述秦的暴政中，农民在当时所负担的沉重徭役、兵役和赋税，秦朝严酷的刑法，以及陈胜、吴广举行起义，刘邦、项羽终于灭秦的过程，楚汉战争的大致经过时，都可以使用叙述法。它的特点是过程要有头有尾，必要时划出阶段，时间、地点清晰，人物活动具体，语言准确、精练。

概述法，是指教科书中非主要部分的史实，只需要教师给予简要概括地勾勒的讲授方法。如，秦末农民战争中陈胜派出几支起义军进攻咸阳的过程、各地人民响应陈胜纷纷起义的情形、刘邦西入关灭秦的经过和楚汉战争四年中双方相持和小仗接触的过程等，就只需概括地勾勒一下即可。如果过细地去一一讲授，不但课时不允许，而且还会冲淡重点，显得头绪繁多而杂乱无章。

描述法，指教师对一节课的重点史实部分必须做出生动形象的细致描绘的讲授方法。如，秦末农民战争中关于秦始皇修筑的阿房宫、骊山墓的豪华情景，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的慷慨场面，项羽“破釜沉舟”在巨鹿大败秦主力军的惊天动地厮杀以及楚汉战争中，刘邦在垓下包围了项羽，使其“四面楚歌”最后自刎乌江的情形等，即都需要运用描述法讲授。描述法好像是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它的特点是讲人物要有人物的形象、语言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讲事件应有历史生动的情节，引人入胜；讲场面要有气氛的烘托，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这样，历史才可以通过教师的讲授，形象地“再现”出来，给学生以真实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

显然，在讲述法中，以上三种方法缺一不可，而且还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浑然而成一体。

第二，讲解法

指教师对教科书中需要理解的部分，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和概括等方法，加以讲授的教学方法。它要解决的是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理解历史知识阶段的任务；是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历史本质的过程。讲解法同样是历史课堂教学基本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之

例如，对于《中国历史》第三册中关于近代中国被迫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需要运用讲解法予以讲授。这些不平等条约从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开始，直到《辛丑条约》，其主要的內容大致包括了割地、赔款、开商埠和允许列强侵略者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等项，而且一次比一次要严重得多。教师讲授时，即可以在叙述清楚每次“条约”的一项条文后，给学生分析它对中国的危害、影响，并恰当地与以前的不平等条约中相应条文作出比较，最后综合、概括出每一个不平等条约都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一步；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到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地加深，直到《辛丑条约》，中国最终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讲解法应该与讲述法密切地结合起来。讲述法是讲解法的基础，它在叙述、概述、描述史实的时候，应该已经“寓论于史”，为讲解法做了很好的准备；而讲解法又是讲述法的必然发展和升华，只有通过讲解法使学生理解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学生才有可能更好地掌握讲述法所讲授的史实。

第三，谈话法

这种教学方法是一种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以进行师生“谈话”，并通过其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方法。谈话法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不但很好地掌握了历史知识，也能够有利于能力的培养。谈话法可以在一节历史课开始时的“复习旧课、导入新课”环节中运用，也可以在讲完新课的“小结”环节中运用，还可以于讲授新课的整个过程中加以运用。在复习课中，也有的都是穿插着使用谈话法，进行教学。它是历史课堂教学中讲述法、讲解法以外，经常运用的一种基本教学方法，对讲述、讲解法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谈话”的内容一般地有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谈话”引导学生复述学习过的历史“旧”知识，温故知新，理解教师即将讲授的新知识。如，当教师讲完中日甲午战争后，讲授《马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时，即可以提问学生以前学过的关于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内容，让学生从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等项条文上认识到，《马关条约》比起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更为严重，它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中华民族的危机都大大地加深了。在提问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认识《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一条，是以前各个不平等条约中所没有的，它表明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向中国输出商品外又增加了“向中国输出资本”，从而更加疯狂地掠夺了中国的财富。

2.通过“谈话”，让学生自己分析某些历史问题，启发他们积极思维，培养学生的能力。如，同样是讲授中日《马关条约》，可以如上所述的那样，由教师给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也可以运用谈话法让学生从《马关条约》与以前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比较中，自己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以上的结论。这种方法如果是在讲述中英《南京条约》时可能不宜采用，而在教师分析过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后，已经给了学生以示范，初步教会他们分析近代不平等条约的方法和思路后，运用谈话法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就是完全可以做的了。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使用谈话法，一是必须提问学生已知的历史知识或是学生的能力所能分析的问题，而不要提问那些他们不知道的历史事实或者无法分析的问题。如，有位教师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还没有讲述战争经过的情况下即提问学生：“你们说说德国应该怎样打这场战争？”结果学生都不知所云。事实是这场战争非常复杂，偶然的事变会层出不穷，谁能够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准确地说出它会怎样打这场战争呢？！更何况是十几岁的学生。这样的提问显然是不正确的；正像有的听课教师批评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让学生事先知道德军参谋部的事呢？”二是，谈话法只能是在以讲述法和讲解法为主的情况下，穿插其中加以运用，一堂课都用谈话法是绝对不行的。过去有的教师曾经在一节历史课里提问 50 多人次，结果学生只是不动脑筋地简单回答“是”或“不是”，根本起不到启发学生思维的作用，

一节历史课就更谈不上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应有的历史基础知识了。这种形式主义的“谈话法”，早已遭到了广大教师的摒弃。

第四，读书法

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让学生阅读教科书获得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目前在几套新编历史教科书普遍增加了篇幅、加强了史实，而且还分出供学生阅读的小字（或异体字）部分、注释部分的情况下，在课堂上使用读书法就更显得重要。

读书法可以是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阅读教科书的正文部分或大字部分，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如阅读一些变法或制度的内容、近代某些不平等条约的条文和某些历史事件的意义、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也可以让学生阅读某些小字部分或注释部分，了解更多的史实，代替教师的叙述，帮助学生更加具体、更加生动形象地认识历史；还可以专门让学生阅读教科书上的某些历史原始资料，以提高阅读资料、分析史料的能力，同时加深历史的真实感。

使用读书法，同样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并且是配合着教师的讲述、讲解来进行。有的教师在一节历史课中，只写几条板书提纲，然后便放任不管地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教科书，最后再提问学生几个问题或者迳直地让他们写作业的做法，有时也冠之以“读书法”，其实是取消教师讲授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根本收不到历史课应有的效果；它与我们说的读书法这种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教学方法，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

第五，直观教具演示法

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由教师演示历史直观教具或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学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使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对于学生形象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都有很大的辅助作用。它几乎是每节历史课都不可缺少的教学方法。

历史直观教具的种类很多。前边提到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插图（包括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历史地图册应该是为教师和学生最普遍使用的历史直观教具；由于教科书、历史地图册学生人手一册，且又能最密切地配合着教学的内容，因此在历史直观教具演示的教学方法中，理应成为首先使用的重要手段。

此外，历史直观教具还有实物、模型、挂图（含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图解、表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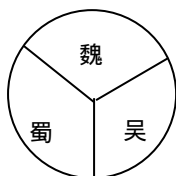
实物，实际上是一些历史文物，如古陶瓷、古钱币等。它具有真实感强的效果，完全可以作为直观的历史资料使用。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物却不易得到，因此，常常是利用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的方法或者通过使用实物模型的方法代替之。

历史实物模型为按照历史遗址、遗迹、遗物（即文物）或历史文献的记载而制作的模拟物，如半坡氏族遗址和居住房屋的微缩模型，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微缩模型，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像模型和他们制作使用的旧石器、骨针模型，以及西汉楼车、唐代的曲辕犁等器物与张衡发明制作的“候风地动仪”等模型。这些模型如果制作科学，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代替实物所发挥的功效。

历史挂图，是把教科书上的插图、历史地图册上的地图或其它图片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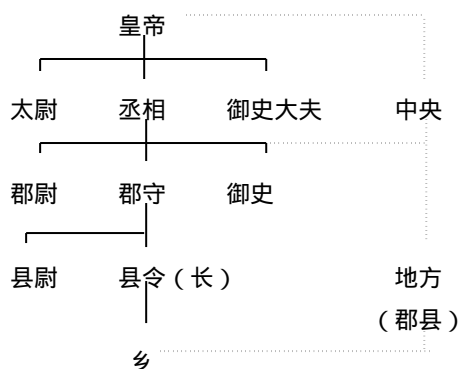
放大，挂在教室前的黑板或墙壁上的直观教具。有的可由教师自己绘制，但是，更多的情况下由专门出版社制好，学校购买使用即可。如中国地图出版社为新编历史教科书制作的配套历史地图挂图即是。挂图清晰醒目，可以让全班学生都看清，教师边讲授边指图，比教科书上的插图更能够集中全体学生的注意力，效果更佳。

历史图解和表解，也是课堂上经常使用的直观教具。有表现历史上某些地域观念和政治形势的图解，如关于我国历史上公元 220—280 年的“三国鼎立”形势图解即是一个：



有表现历史某种阶级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如可以把西欧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制度（世俗的）图解为：

有表现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表解，如中国历史上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制可以表解为：



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幻灯、投影仪、闭路电视等。幻灯和投影仪可以在课堂上放映或投射出历史图片、历史地图，既清晰，又将原图放大，很便利教学使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闭路电视已经在一些省市的学校中逐渐地推广使用，如北京市不少的学校就拥有了这种教学手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着讲授的内容，放映某些电视片的剪辑片断，有声有像，大大地增加了教学的形象性。如，北京市一位教师在讲授美国南北战争时，就在相应之处放映了剪辑的关于美国黑人奴隶在庄园里痛苦劳动、生活的片断和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后遇刺情景的片断，为这节课确实增添了光彩。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直观教具演示法必须与讲述法和讲解法配合使用；在讲述、讲解的过程中穿插着演示教具或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而演示教具或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时，又需要辅之以讲述和讲解，二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益彰。在课堂教学中，切忌形式主义地为使用历史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而使用它们，甚至在一节历史课中，很少教师的讲述、讲解，而专一地以大量使用教具等手段为胜。实践证明，这样只能打乱学生对于系统历史知识的掌握，把历史课弄得支离破碎，影响其真正的教学效果。

四、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

1. 教学目的必须定得全面、准确、恰当，这样才能够保证一节历史课的正确方向。

2. 教学内容要符合思想性和科学性，包括史实的选择和对历史的分析、评价；教学内容还应该丰满，符合人类历史的特点，要有一定深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思想教育有真实的启迪。

3. 课堂类型和教学方法应该选用恰当，符合教学内容实际和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规律，能启发学生的积极性，而不应该为方法而方法，搞形式主义，要讲求实效。

4. 板书设计认真；教师语言规范、准确、生动，教态自然；课堂上师生呼应，气氛活跃。

应该说，许多优秀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都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为了帮助历史教师全面地掌握历史课堂教学的艺术和技巧，有所参考，将时宗本老师讲授世界历史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一课的课堂教学实录和拙撰的介绍时宗本老师课堂教学技巧的《内容与形式的完好统一——谈谈时宗本老师的教学艺术》一文，附录于后。

附录：

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课堂教学实录）

（导入新课）

前几节课，我们讲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现在，就这节课讲的内容，提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出现的？（学生回答，略。）

对！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米兰和佛罗伦萨出现了手工工场。下面请一位同学把手工工场的情况说一下。（学生回答，略。）

对！手工工场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出现了雇佣劳动，也就是说手工业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只剩下劳动力了，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相反，工场主则用他们的资本购买原料、设备，还购买劳动力。这样就产生了工场主和雇佣工人。工场主、商人和银行家等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斯大林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资产阶级既然要发展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以便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讲授新课）

一、背景：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发展文化，天主教会压制其文化的发展（板书）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求发展自己的文化呢？请大家翻开课本第135页看第一个自然段，请一位同学读一下。（同学朗读课本，略。）

从所读的这段书中，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提高生产，所以需要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科学家；他们为了了解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的情况，所以需要地理学和航海学。可是，为什么他们又需要文学家、艺术家这些人呢？课本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那就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现实生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为什么资产阶级要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呢？同学们是否还记得过去我们所讲过的，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支持和维护封建制度的有两种势力，其中的一种就是基督教会，现在请同学来回答，在西欧封建社会里基督教会是如何支持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同学回答，略。）

请注意，教会在经济上是一个剥削者；在文化上是一个思想统治者。除此以外，教会还往往给国王和贵族充当政治顾问，因此，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掌握了政权。教士在西欧封建社会里又是唯一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随着日耳曼“蛮族”对西罗马帝国的摧毁，其境内的文化也遭到了破坏。在过去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名的查理大帝，他一生提倡文化，但自己仍是一个文盲，一直到他年老时也只能签下自己的名字。社会上唯一有文化的是教士，他们能读能写，能读古典的拉丁文，但他们并不把这些文化知识用在科学上，也不用在文学艺术上，而是用在文化统治上。在封建神学统治下，社会上充满了愚昧无知，课本上举了一个例子：在当时，按照教会的看法，天和地就是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们认为，大地

是平平的，像个圆盘子，大地的中心就是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天呢？好像是一个半圆形的盖子笼罩在大地上面，日、月、星、辰就沿着半圆形的天顶东西运行，从而构成了昼夜。这个说法是适合教会利益的。在《圣经》第一篇《创业纪》中是这样讲的：上帝在六天之内创出了天和地以及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所以，这种天地观，是教会世界观的基础，任何人如果违反了这样的学说，就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异端”，就会遭到迫害，轻者逐出教门，重者则会判处火刑烧死。这样一种封建愚昧的说教，必然阻碍人们去探索真理。所以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制度，就必然要反对教会。

这时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一千年后，东罗马帝国也灭亡了。在 1453 年，土耳其人攻下了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当时，东罗马境内的一些基督徒，为了逃避土耳其人的迫害，纷纷向西方逃难而来到了意大利。一些东方的学者带来了古希腊和罗马的书籍，有的是文学著作，有的是哲学著作，有的是科学著作。除此以外，在意大利本上的一些废墟下面，也出土了一些古代文物，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刻。这些古代文物，展现在意大利人的面前，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惊讶。他们看到如此光辉灿烂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居然产生在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前，与教会宣扬的那套愚昧落后的说教一比，真是天壤之别。于是，在西欧就掀起了一个研究希腊、罗马，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潮。当时的人们称这个文化运动为“文艺复兴”运动。

二、“文艺复兴”（板书）

实质：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板书）

指导思想：人文主义（板书）

“文艺复兴”，这是当时人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在这几个字上边打了一个引号。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恢复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如果这场文化运动只是这样的话，那它的意义就没有多大了。因为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只是奴隶社会的文化，而现在的“文艺复兴”时期呢？它们所研究的是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形式，装入资产阶级的内容，来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它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兴起的运动。

这场文化运动，开始于十四、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达到高潮。它是由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就是刚对“同学们提到意大利北部的那个城市——佛罗伦萨城。它类似于古代希腊的雅典。由于它经济、文化的发达，所以得了一个称号，叫“意大利的雅典”。这场文化运动经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传到了德意志，传到了法国、英国、西班牙，最后传到了莫斯科公国，传遍了整个欧洲。

这场巨大的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和教会的神学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思想。教会提倡的是神，人文主义提倡的是人；教会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将来进入天堂，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幸福。这种和教会针锋相对的思想，就是当时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优秀人物，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课本第 136 页的人像，是著名的佛罗伦萨文学家但丁；在 137 页，是著名画家达·芬奇；在 138 页，是

著名的英国诗人和戏剧家莎士比亚、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在 139 页，是佛罗伦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以及佛罗伦萨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除此以外，还有德国的著名天文学家刻卜勒。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板书）

但丁是佛罗伦萨的诗人。他的作品很丰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写的《神曲》。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但丁讲，有一次他陷入了一个森林，丛林莽莽，无路可寻。这时，忽然看见一群猛兽朝他袭来。正当但丁走投无路时，救星来到了。什么人来了呢？原来是已经故去一千多年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维吉尔的到来，驱散了猛兽，引导但丁走出了丛林。这时候，维吉尔建议但丁，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到“地狱”里去参观，但丁接受了这个建议，和维吉尔一起到“地狱”。按照但丁的说法，地狱一共是九层，罪轻的在上层，罪重的在下层。他来到第八层，这一层是烈火地狱，很多罪犯在烈火中被焚烧着。什么人才下入烈火地狱呢？如欺压善良的人、陷害他人的人、贪官污吏、伪善者、天主教会的教士……，他居然还看到了当代教皇卜尼法八世也在烈火中遭到折磨。大家注意，当时卜尼法八世还没有死，但是已经被但丁打入地狱了。这就可以看到人民对天主教会是如何的憎恨。在第九层地狱，也就是最下一层地狱，是冰湖地狱。在一个冰冻的湖泊里，很多罪犯被冻在冰里，在湖面上只露出一个人头，还可以认得出来他们是一些什么人。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就被冻在冰湖里，但丁认为这些人是最卑鄙最可耻的，于是，他走到冰上，用脚踢犹大的头。这些罪犯要在冰里冻多少年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永远冻在冰里，得不到解脱！但丁游览了地狱以后，维吉尔又引导他游览了“炼狱”。按照《圣经》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犯有罪行，但是又不够严重，那么，就应该到炼狱中接受洗炼，当他的罪行得到一定的惩罚，洗清了自己的罪恶后，将来还有机会进入天堂。维吉尔引导但丁游览了“地狱”和“炼狱”以后，便对但丁讲，下一步我们应该到“天堂”里去了，但是我感到自己还不够引导你进入天堂的资格，有一个比我更加合适，就要来引导你。说完以后，维吉尔忽然隐去了。这时，听到天空中一阵音乐的声音，来了一个少女，但丁认识，她就是他在青年时期认识的一个非常纯洁、善良的女孩子。在她的引导下，但丁继续游览了天堂。在天堂里，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对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们在天堂里和上帝住在一起。《神曲》的故事，大体就是这样的。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宗教故事，不过是劝善惩恶。但是大家要注意，但丁的爱憎观和天主教会的爱憎观是恰恰相反的，被天主教会所肯定的人，在《神曲》里却是被否定的。卜尼法八世之流，在但丁看来，正是应该打入地狱的。相反，遭到教会迫害的、追求真理的人，却被但丁请到了天堂里面去。《神曲》是和教会的思想针锋相对的，可以说，但丁是反对天主教会的第一位勇士。某些历史学家就把但丁死的这一年，即 1321 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恩格斯讲，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他的作品里正是反映出了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特点。

下面介绍意大利有名的艺术家、画家达·芬奇。

达·芬奇不只是一个画家，同时又是一位数学家、力学家、工程师、音乐家和解剖学家，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达·芬奇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七千多页手稿。在他的手稿中，我们居然发现有最早的滑翔机设计图。

作为工程师，达·芬奇修建过意大利北部的运河，修建过米兰城的城堡。作为一个画家，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教会的禁令，解剖了尸体。当然，达·芬奇最有成就的还是绘画，他的代表作是《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的第 1 页——彩色插页看当中的这个图象。这个图象就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过去，天主教会也有所谓的艺术，但他们画的都是一些圣经故事，可是，达·芬奇却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佛罗伦萨的女市民。同学们请看，这个年轻的妇女，安详恬静，面带微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既不是一位天使，也不是圣母玛丽亚，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幅画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与教会的题材是根本不相同的。这幅画现在存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达·芬奇更有名的一幅画是为米兰圣玛丽亚大教堂画的壁画《最后的晚餐》。这是描写《圣经》上的一个故事，描述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夕和他的十二个门徒最后的一次会餐，在会餐的过程中，耶稣宣布了一个重大事件。他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们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把我出卖了。这句话一说，就起了一个爆炸性的效果，十二个门徒表情各不相同。我们看大弟子彼得，他出身渔民，性格豪爽，马上拍案而起：“老师，您说出来，这是谁，我们要把他撕成碎片。”耶稣的小徒弟，他最喜爱的约翰，表现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像老师这样道德高尚的人，为什么还会有人陷害您呢？为什么陷害您的人就出在您的门徒之中呢？”同学们看，正是这个陷害耶稣的犹大，听到耶稣宣布以后，感到非常恐惧，唯恐老师把他的名字点出来，他一直往后退缩，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可是他的手呢？还没有离开出卖耶稣所得到的三十块银币的钱袋。达·芬奇创作这幅名画，整整费了三年时间，他为了观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跑遍了米兰城的大街小巷。他把犹大的身子画出来了，但脸没有画，他要找一个最坏的典型，来表现容貌可惜的犹大。于是，他走遍了一些流氓聚集的地方、赌徒聚赌的地方、下流的酒馆来找寻这个模特儿。所以，《最后的晚餐》这幅画，虽然只有十三个人，但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幅画里倾注了达·芬奇爱憎分明的感情。他爱的是什么人？爱的是道德高尚的耶稣，在他的这幅画里，耶稣并不是以一个神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导师的身份出现的。这幅画虽然以宗教故事作题材，但它描写的是人生，是社会，贯彻的是人文主义的精神。

“文艺复兴”到 15 世纪末期，冲出了意大利的范围，传到欧洲其它的地方，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剧作家，写了很多剧本，现存的还有三十七部，其中有一些剧目是同学们很熟悉的。同学们是否记得，几年前，在北京上演过一个莎士比亚剧本改编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同学答，略。）对！叫《王子复仇记》，也就是《哈姆雷特》；另外，还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罗米欧与朱丽叶》，描写了意大利当时两个封建家族水火不相容，妨碍了两个年轻人的纯洁爱情，最后两人双双自杀。在我们语文课本里面，还讲到了莎士比亚的另外一篇作品，就是《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的梗概是这样的：在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青年商人安东尼奥，他为人善良，乐于帮助别人。还有一个和安东尼奥性格相反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这个人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凶狠到了极点。有一次，安东尼奥的朋友要用一笔钱，托安东尼奥找夏洛克借款。夏洛克答应借给他两千个金币，但是有一个条件，若不能如期偿还，那么，担保人就要赔偿自己胸前的一磅肉给夏洛克，否则被认为不履行

契约，就得把全部财产没收，假使夏洛克不履行契约，夏洛克的财产也会被没收。不幸的是，到了期限，安东尼奥的朋友无力偿还。这时，夏洛克和安东尼奥在法庭见面了。安东尼奥朋友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女扮男装作为一个律师出席了这个审判会。在审判会上，这位女律师向夏洛克百般地要求，不要割安东尼奥胸前的那一磅肉，但夏洛克坚决不听。于是，她提出加倍偿还的条件，夏洛克说，迟还我一天，用加倍偿还也不干。她又提出，加两倍偿还怎样？夏洛克仍然不干。他说：“我只要他胸前这磅肉”。于是，女律师说：“那就请你到他胸前割吧，但是，你要保证一刀下去不能多割一点，也不能少割一点，否则就算不履行契约；而且不能流一滴血，因为契约上只提到割肉，没提到流血，这个条件你答应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凶狠残暴的夏洛克非常狼狈，无言可答，情愿放弃这部分债权。但女律师讲，如果你放弃债权，那就算你不履行契约，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就这样，最后以夏洛克的失败而告结束。这个剧本歌颂了善良，歌颂了智慧，鞭挞了贪婪和残暴。

就在但丁、达·芬奇等人文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的打击之下，教会的权威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便又涌现出了一批科学家和思想家。

哥白尼，是第一位出来向教会的神学统治进行冲击的科学家。哥白尼虽然是波兰人，但他求学于意大利，很早就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哥白尼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对教会世界观的基础即“创世纪”进行了冲击。按照《圣经》的说法，大地应该是宇宙的中心，大地的中心又是圣地耶路撒冷。可是哥白尼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大地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过去的说法，太阳围绕着大地旋转构成昼夜，不过是地球自转的结果；除去地球自转以外，地球还和其它的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按照哥白尼的理论，宇宙的中心不是大地而恰恰是太阳，以太阳作为圆心，以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作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正是地球运动的轨道。除地球以外，还有五个行星，那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望远镜，用肉眼还看不到。哥白尼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写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叫《天体运行论》。但是，他自己知道，这本书如果发表，是要触怒教会的，所以他在生前没有发表。

过了若干年，德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刻卜勒，证实了哥白尼的理论，但作了某些修正。按照刻卜勒的说法，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而且距离太阳越近的行星，它的运转速度越快。

哥白尼侥幸逃脱了教会的迫害，可是另一个发展了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就不那么幸运了。布鲁诺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绝对核心，宇宙是无限的，因而也是无所谓中心的。现代科学成果告诉我们：太阳也不过是银河系边缘上的一个比较小的恒星。在银河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恐怕将近两千亿个，而银河以外的像银河这样的星云有多少个呢？毛泽东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看来，远远超过了一千个。由于布鲁诺提出了一种与教会完全相抵触的学说，因而遭到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教会逮捕，在1600年，又被教会判处火刑。他，为真理而殉难了。

伽里略，也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他用自制的一个望远镜观察天体，看到整个银河里是点点繁星，遂证明了布鲁诺的说法。伽里略的成就涉及范围很广，如，他观察了月球，发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他观察了金星，说明金星有圆有缺，它的确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他观察了木星，发现木星周围有四

个卫星。

以上的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对教会世界观的基础进行了冲击。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奋斗，教会的所谓威信，一落千丈，再也不能照旧欺骗和统治人民了。在为真理献身的勇士布鲁诺牺牲四十年之后，在 1640 年，欧洲就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英格兰共和国，从而开始了世界近代史。

（巩固小结）

今天讲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也就是“文艺复兴”。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来记一记今天讲课的重点。

首先，我们说“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个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而不是古典奴隶社会文化的复活。再看，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人文主义”，就是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人为中心。“文艺复兴”时代的几个巨人有：但丁，他的名作是《神曲》；达·芬奇，他的名作是《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很多，流传至今的有三十七个剧本，例如，《威尼斯商人》；还有科学家和思想家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和伽利略。

（布置作业）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请同学们翻开课本第 140 页，看看最后的三个问题。希望同学们回去认真思考一下。

（北京市 165 中学时宗本）

内容与形式的完好统一——谈谈时宗本老师的课堂教学艺术

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的好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处理得好，从来是决定教学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评价文艺作品时，曾经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个标准同样适合于中学历史教学。只有内容好而又有好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并且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够算是一节好的历史课。时宗本老师的历史课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符合了这个标准。

我们看到，时老师的历史课，不是干巴巴的，而是非常丰满，有血有肉，具有深刻而充实的教学内容。

首先，时老师的课不是单纯的摆史实，讲故事，而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几乎，他的每一节课都是在内容上有一定深度的。例如，讲敦煌莫高窟，讲出它的地理位置对它成为佛教艺术圣地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贯穿了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辩证思想。讲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美国内战原因和唐代诗歌的发达，都是注意从其经济发展或政治制度去寻根溯源，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现象植根于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讲述希腊文化的繁荣、美国南北战争局势的扭转和中国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更是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光辉。这样，就使得学生听了讲课后，不是在课上感觉热热闹闹，下了课后却脑子里空空如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而是能够有所启发，受到教育，真正领悟到历史的真谛。

第二，时老师的历史课，在注意理论深度的同时，又绝不是在那里空洞地说教，而是能够始终把深邃的历史理论渗透在丰富、充实的历史事实中。正如许多同志所感受到的那样，时老师的课是真正的历史课，它体现了历史课具体和生动形象的特点。例如，他在讲古希腊时，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希腊“荷马史侍”时代是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而是生动具体地去讲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然后再透过史诗里提到的“铁器”、“农业”、“葡萄酒”和“女奴”等事实，分析、揭示出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在讲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时也是这样。他不是简单地去做一味解释这个有一定深度而又是学生所陌生的历史概念，而是先具体形象地讲述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光辉作品的深刻内容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的绘画艺术，然后结合着基督教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揭示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和本质。

讲课内容深刻、丰富，在教法上始终做到史论结合，遵循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概括的正确教学原则和教学途径，正是时老师教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从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看，为了讲清史实，加强时代感，再现历史形象，时老师十分注意教学的直观性原则。他长于讲述，主要是通过语言直观，给学生造成一种历史的环境，然后使学生去领略历史真实。如，时老师通过详细地介绍雕版印刷一页书籍的书写、刻字、着色、铺纸等工艺，并结合着对我国古代治印与拓碑技术的生动讲述，再现出隋唐时期劳动人民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历史事实。他又是在详细地描述了意大利威尼斯与米兰等城市的手工业、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再给学生再现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

策源地。不仅如此，时老师还非常善于使用直观教具。如，他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一课中，对于《最后的晚餐》挂图的使用与讲解，就是那样的生动形象、活灵活现，而堪称一绝。

时老师的教学也很注意系统性原则。他讲课的条理清晰，纵横联系紧密，给学生的历史知识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完整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他在课中穿插提问旧课，如讲“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先提问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欧基督教会的有关史实；讲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的“转化”时，联系到以往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结局总是归于失败的历史规律；有时则打乱、重新安排教材，如讲北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他没有先交待北朝的概念，而是先讲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孝文帝改革、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然后顺理成章地从起义打击讲到北魏分裂，再讲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的更替，最后交待出这一历史概念。为了增强教学的系统性，时老师有时还在一节课的开始，先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的目录，一步一步地追忆旧课，最后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上导入新课。如讲“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这样做的。运用比较方法进行讲授，在历史比较中加强知识的系统性，更是时老师在教学中所十分注意的。特别是在世界史教学中，他经常地于中外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之间进行广泛比较。大的方面，像中外封建社会历史的比较，小的方面像比较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埃及、印度等“古代东方”，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内战的双方，美国内战中共和、民主两党与今天的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等等，比比皆是。给学生系统的历史知识，就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联系，洞察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它不但发展了学生智力，而且教会学生掌握自学历史的重要方法，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发和教育。

组织教材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而且是从内容出发的重要教学方法。时老师在组织教材上同样是别具匠心的。在讲中国原始社会“原始人群”一课时，他不是一般地给学生介绍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古人类的遗址、遗骨和遗物，而是以北京人的考古发掘过程为线索，饶有风趣地讲述周口店考古发掘中的生动趣闻和解放前后周口店的辛酸与新生，然后带着讲述北京人的历史面貌；在古代希腊的讲课中，时老师提前讲述了它的部分文化知识，并联系其对于中国和世界现实的影响，以引起学生学习希腊历史的兴趣，然后再进行关于爱琴文化、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奴隶制历史的讲述，收到“由近及远”学好历史的效果。在讲述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政府保卫东北边疆的斗争时，时老师也是先交待当时西方的历史情况，介绍部分以后要讲述的世界史内容，以便使学生从殖民主义者东来的世界大势上，去认识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在组织教学上，时老师异乎寻常的例子还有很多。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时老师对于教材理解的纯熟和处处从学生着想的特点，都是教学方法上的创造。

为了讲好内容，时老师对教学方法的运用，有时达到了完美的艺术高度。如在讲述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国家从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朝政府，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就生动地以强盗拆掉一家的大门，从大门口到屋门的院子两侧站满强盗，又在这家的炕头上坐着一个端着机关枪的强盗，来形象地比喻《条约》中关于拆去了大沽口炮台，许可帝国主义在山海关到北京沿线驻军和在北京皇宫前面东交民巷“使馆界”驻扎

外兵的条文，而巧妙地运用了文学的比喻手法。不少课文中，时老师还用了评书中的“铺垫”手法，先讲一些“边沿”问题，待学生有了思想准备后，再进入中心内容的讲述。如讲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先讲北魏和鲜卑族的历史地位、族源、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叫魏的政权……，然后才讲述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和孝文帝的改革。这对于不太熟悉鲜卑族和北魏历史的初中学生来说，就非常实际，它不是生硬而是自然地把学生引入了新课。其它像古代埃及、古代希腊、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等课也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教法的妙用和它在教学上的效果。

恰当地在教学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和文艺作品，在时老师课堂教学中，更是屡见不鲜和新颖巧妙。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从根本上说是表现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上，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些精辟的话，往往是他们分析历史观点的生动体现，在历史教学上如果引用恰当，能给学生以很大启发，加深他们对于历史内容的理解。时老师正是善于这样做的，也正因此而加强了他教学内容的深度。如，他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一课里，引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语和对哥白尼等科学家的论述，就非常恰当，使学生对这课内容的理解有了新的升华。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历史真实，但是，却能够给历史增加形象感，在教学中予以引用，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接近历史，再现历史面貌。我们看到，时老师在讲述希腊奴隶被用于航海时，巧妙地引述自己看过的一部外国电影，为学生描绘出奴隶被整队地押上海船，把手铐在船桨上，集体划船与悲惨地在沉船时全部淹死的情景；讲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大种植园中黑人奴隶的痛苦生活时，引述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所描写的黑奴境地；讲华工被欺骗去美国西部开采金矿，从而帮助了美国经济繁荣时，引述了电影《海囚》的内容；甚至在讲赵州桥时，引述京剧《小放牛》中牧童与村姑的对唱：“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留啊？……”，给学生一种艺术感受，等等，是那样的纯熟，信手拈来，让人回味无穷。

总之，既重于教学内容，又考究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而且能够把二者完好地统一起来，是时老师的教学给人最深的印象，也是时老师的教学堪称艺术之真谛所在。我觉得，从教法角度讲，这也正是应该向时老师学习的主要地方。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老师能够在教学上达到炉火纯青和如此造诣，自有其“奥秘”之所在。当然，奥秘不是什么“天才”、“诀窍”，而是他几十年的“学而不厌”。

时老师解放前后曾就学于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两所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大学的努力攻读给他奠下了雄厚的专业功底。任中学历史教师后，他又总是在教学工作繁忙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学习。正因此，造就了时老师的知识渊博。他不仅古今中外的中学历史课都能拿得起来，教得很好，而且可以从北京人（中国古代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现代史），给中学历史老师进修班上课。他地理知识丰富，讲历史课时铺述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是那样地翔实而生动。他懂得不少自然科学知识，讲课中对于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都可以从其科学本身进行必要的介绍。他具有相当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创作过程到吴道子的绘画风格，从《神曲》、希腊神话、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到唐诗和京剧，他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够不费

力地背诵出其内容。他对于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各国、各地的文物古迹，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进行学习搜集，然后运用到历史教学的课堂上。他的大孩子在法国巴黎学习、深造声乐，他特地让孩子寄来巴黎的市区图，以备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时用，他关心时事，讲世界史时总是先从一些国家或地区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讲起，然后追溯到它们的历史渊源。他外文水平很高，能够在课堂上信手拈来，引用英文、拉丁文的词汇，从语言的形成角度，丰富历史内容。更可贵的是时老师有着浓厚的理论兴趣和较深的理论修养。且不说他的整个历史课的理论深度与功底，单就他课堂上引用的经典作家的话，就可以看出他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多么用功。从他的部分课堂教学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曾经精读过《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多部经典著作。

正是这样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修养，成为时老师从事历史教学的坚强后盾和有力支柱。“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只有教师有一桶水才可以教给学生一杯水。对于这个道理，时老师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确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脚注。

时老师还从不固步自封，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它优秀历史教师学习。我曾经和他一起审查过北京市优秀历史老师的录像，看见他总是那样全神贯注地观摩，用心地思考，观摩后在彼此交谈时，谈出他关于录像的优点和不同看法。私下，他也常常谈到哪一位老师的讲法对他有启发，哪一位老师值得他学习。对外国历史教学的好经验，时老师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坚持我们社会主义历史教学特点的情况下，从来都注意批判地吸收。他对“北京人”从考古发掘讲起的教法，是借鉴了一本法国教科书的写法；讲古希腊史先讲它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则是借鉴了一本美国的历史著作。正如蜜蜂那样，博采众花，才酿出了最甜的蜂蜜。时老师的历史教学，是在虚心学习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才最后锤炼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特色。

不言而喻，在“学而不厌”方面，时老师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很大的。

（孙恭恂）

第三节 历史课外活动

历史课外活动是历史课堂教学以外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它对历史课堂教学起着补充和辅助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又称它为历史课的“第二课堂”。

所以需要历史课外活动,是因为如前所述,历史课堂教学的主要特点是班级授课,要注意面向全班几十位学生,而不能只去个别关注对历史有着兴趣或特长的少数学生,不可能在课堂上搞什么“因材施教”。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所以于课堂教学以外,还必须适当地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即便是面对全班级的学生而言,有些历史课外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给课堂教学以某些配合和帮助,拓宽课堂教学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中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实践证明,一位好的历史教师往往不仅课堂教学优秀,成绩斐然,而且一定也是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历史课外活动的能手。“单打一”的历史教学不可能是全面优秀的历史教学。

一、历史课外活动的主要方式

组织参观(包括历史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历史遗址和遗迹等)和访问、举办历史报告会和故事会、阅读历史读物、观看历史影视片和戏剧等,都是历史课外活动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在前面讲到“历史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时已经做了阐述。作为学校教学工作组成部分的历史课外活动所不同的是,在运用这些方式时要更加密切地结合着学校教育的特点。可以配合历史教学的内容和进度,有计划地组织上述一些活动,如结合教科书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组织放映、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林则徐》、《甲午风云》、《火烧圆明园》、《孙中山》;根据教学进度,在讲完一个阶段的历史后,组织学生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也可以配合着学校对学生思想教育的中心工作,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像目前北京市乃至全国一些省市的学校正在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课即可以结合这些教育内容,组织学生听取一些有关历史的报告会、故事会,阅读《龙的传人》、《中国的脊梁》和前述龚书铎教授主编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组织参观北京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凭吊北京市西郊的圆明园遗址,组织学生观看电视台放映的百部优秀爱国主义影片,等等。再如,在学校开展以上形式的历史课外活动时,必须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及学校的整体教学计划,既要注意活动的实际效果,又要顾全大局,不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影响正课学习,增加学生的负担。

除以上一些方式外,学校历史课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课外活动方式。其中,历史墙报、历史文艺晚会和历史兴趣小组,是经常被采用的重要活动方式。

历史墙报,每个班都可以出,也可以全校或一个年级出。可以定期,也可以不定期。其内容可以是配合历史课堂教学的进度、内容,也可以是结合着学校或班级的中心思想工作,还可以结合着一些重大的节日、历史纪念日和国内外的时事。方式则可以由学生自己撰写历史小论文、编辑历史资料和历史人物的名言佳句,也可以剪辑一些报纸杂志上的材料、文章,要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这样的历史墙报,不但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给学生

以思想品德的教育，而且它对于学生特别是一些对于历史学习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的能力培养，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历史文艺晚会，常常结合学校或班级的中心思想工作或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它的内容可以有历史诗歌朗诵、历史短剧、历史歌曲演唱和放映短些的历史影视片等，寓教于乐，很受中小学生的欢迎、喜爱。

历史兴趣小组，是专门为那些对于历史学习有特殊兴趣、爱好的学生组织的。一般地，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组织活动的方便，以一个年级组织一个小组为宜。历史兴趣小组可以单独进行活动，如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开展以上一些方式的历史学习活动；也可以让其协助历史教师负责举办以上面对整个年级学生的活动，如出历史墙报、组织历史报告会、故事会和历史文艺晚会等。历史兴趣小组不可人数太多，活动亦不宜过频。以免不好组织开展活动，同时加重学生的负担。

二、组织历史课外活动应该注意的问题

1. 要加强计划性，除个别情况属于例外，一般地都要在制定学期（或学年）的历史教学计划时，做好通盘考虑，适当安排，使之真正成为历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2. 每一次（项）历史课外活动，都应该有明确的的目的性，不能只是为了组织课外活动而组织课外活动，或是仅仅为了满足某些学生的好奇心理去组织，而把历史课外活动降低成为简单的旅游活动或娱乐活动。

3. 应该加强历史教师对课外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组织前要有具体周密的计划，告诉学生活动的目的、主要内容、步骤和注意事项；活动中要注意给学生进行适当讲解，维持参观、报告会等的现场纪律；活动完毕则应该由教师加以总结，如果是配合教学内容的活动，还要结合活动让学生与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联系，加深印象，有时也可以由学生写出活动后的体会、收获、感想或调查笔记、历史小论文，进行展览或者在一定的集体活动中宣读，以巩固历史课外活动的效果。开展历史课外活动，绝对不应该放任自流，同样要在发挥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保证教师的主导作用。

4. 对组织历史课外活动，教师要和课堂教学一样，认真地进行准备。正式活动前，教师应该翻阅必要的有关资料，如是参观，则要自己先行参观一次；组织观看历史影视片或阅读历史读物前，自己也要先行观看、阅读一遍，并了解该片的有关历史背景和重要情节，然后写出文字的介绍和具体活动计划，活动后亦要写出小结，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不断提高历史课外活动的质量、效果。

第四节 历史乡土教学

一、历史乡土教学的作用

历史乡土教学指的是以本地方、本民族的历史为其内容的教学活动。

所以在全国统一《历史教学大纲》规定的历史教学内容以外，还需要有历史乡土教学，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地方、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悠久丰富的历史。这些历史有的可以写入按照统一《大纲》编写的各套历史教科书中，有的则很难写入；因为全国统一的《大纲》只能是着眼于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线索以及其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现象，而不可能把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历史尽情地给以囊括，这就需要各地方、各个民族的历史课在讲授、教好全国统一《大纲》所规定的历史内容外，还要辅之以历史乡土教学，作为适当的补充。

学生学习本地方史和本民族史，不仅可以很好地了解乡土的历史情况，了解昨天以更好地认识今天，积极地投身到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而且还可以由近及远，通过乡土历史的学习更好地学习、掌握祖国的历史，受到更加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国情教育。

正因如此，《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在中国历史教学中，各个地区可以补充进行地区史或民族史的教学，并且具体地提出了乡土史教学的课时数。

二、历史乡土教学的方式、方法

1. 穿插在中国通史教学中，补充乡土历史材料，使二者结合起来，既讲授了中国通史，同时亦进行了乡土教学。如，讲授中国历史“远古的人类”一课时，北京市学校的历史教师可以结合着“北京人”的题目，补充一些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的历史，把北京人讲得再丰满些；而陕西省的学校则可以补充一些“蓝田人”的材料；辽宁省的学校可以补充辽宁省营口市 1974 年至 1978 年发现的“金牛山人”的材料等，把中国“远古的人类”与乡土史结合起来，使之讲得更加充实和生动。同样，讲授抗日战争的历史，除教科书中已经讲到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徐州的“台儿庄战役”、南京的“南京大屠杀”、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等，还可以结合乡土史内容加以补充，引导学生既学习了中国通史也学习了乡土史。此外，对于教科书未提及而本地区、本民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亦可以在合适地方恰当地补充乡土史内容，对通史加以充实，同时讲授了乡土历史。如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以至海南等许多省区，都可以结合着教科书的相关内容，补充讲授本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的抗日业绩及发生过的重要战役、事件。

2. 在讲授中国通史后，专门辟出一定课时，较系统地讲授本地区、本民族的乡土历史。现在，许多省、市乃至区、县都编写了乡土史教材，历史教师即可以此为“本”，再根据本地区情况适当增删，加以讲授。这种方式能够给学生以乡土史较完整的面貌，印象会更加深刻，但是，需要在教学中注意乡土史与学生学习过的通史之间的关系，边系统地讲授乡土史，边让学生

把它与通史的相应部分联系起来，既不使乡土史孤立于通史之外，同时也能够通过乡土史的教学，加深学生对于中国通史的理解和认识。

3. 乡土史教学还可以与历史课外活动结合着进行。如参观、凭吊、访问等许多历史课外活动，都可以用乡土史作为内容，既开展了课外活动，又进行了乡土史的教学。北京市专门有一盘《历史课外活动》的教学录像带，共辑录了四个课外活动，有“参观历史博物馆”、“凭吊圆明园”、“走访周口店龙骨山”和“古钱币展览”；可以看到，其中两个都是与乡土史教学相结合的，其效果都很好。

三、历史乡土教学的备课

作为备课的步骤与内容，乡土史教学与通史教学是一致的，同样要有学期备课、课前备课；同样要钻研教学内容（乡土史教材）、组织教学内容和编写、制定教案。

应该注意的是，乡土史教学的备课对教师的要求更高。教师除了备有关乡土史的教材外，要注意与通史内容的联系，从通史的高度理解、掌握乡土史的内容。此外，教师还要特别留心搜集本地方和本民族的历史资料，如当地的历史遗址、遗迹，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和地方史志，有的要勤于走访、亲自调查史迹；有的则要勤于读书，收集、考据有关史实，日积月累，以备教学时使用。

历史乡土教学，同样地必须注意制定正确的教学目的，讲究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特点，注意教学方法和实际教学效果。特别是目前社会上有一股片面性的风气，过分于单纯地追求地方性，尽量把历史名人往自己地方上“拉”，尽量把本地方的历史写得早，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学风。这种情况，在乡土史教学中应该摒弃，对学生学习乡土史，同样要培养一种科学的态度，给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

第五节 历史课的复习与考试

一、历史课复习的意义

众所周知，按照心理学所揭示的规律，人的记忆必须不断地重复，才能够巩固，同时，人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必须经过不断地反复进行，才可以达到相对深刻的认识。学生对于人类历史的学习、认识亦是如此，也是须要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和“反复”中才能够真正地掌握。这就需要在不断地讲授新课的同时，穿插着进行复习工作，以期达到教学的预期效果。

历史课的复习，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重复，巩固已经学习的历史知识，使得学生的记忆更为牢固，而且能够通过复习，把已经学习的历史知识系统化，加深对于历史的理解，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那种只认为历史课复习就是进行简单的“重复”，只能够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记忆的看法，显然是降低了复习意义的片面认识。

二、历史课复习的种类和方法

历史课复习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历史课复习，是随堂复习，即教师边讲授新课边结合着与旧知识的联系，随着就进行了对旧知识的复习；而且一节历史课常常还有“小结巩固”新课的环节，其本身就是对新课的复习。

专门的历史课复习，往往称作复习课，有阶段复习课和总复习课，分别对一个阶段的历史内容和整本教科书或全中学阶段学习的历史内容，进行复习。全中学阶段历史课的复习又称“高考复习”。历史复习课有的占用一课时（如阶段复习），也有的需用许多课时乃至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如目前的“高考复习”）。

进行历史课复习的方法，主要有教师讲授（俗称“串讲”）和学生练习两种。

教师的讲授很重要，可以把历史知识加以整理，条分缕析而又有重点地给学生进行复习；讲授中还可以对学生过去没有学好或不易理解之处，进行适当的弥补。

教师串讲理线时，可以依据历史教科书的章节（或“课”）顺序，也可以按照历史中的专题，单独整理成新的历史线索，予以串讲。后者在“高考复习”中经常采用。

如对中国古代史，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农民战争、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几个专题，然后分别就每个专题从夏朝串到清朝（1840年以前），理出其基本线索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现象。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史，还可以再细分作政治制度（分封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重要的帝王政绩（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刘秀、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康熙等）、社会大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光武中兴等）、社会大乱（吴楚七国之乱、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安史之乱等）、政治变革（商鞅变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经济史则可以再分作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经济繁荣与残破等；文化史可以从哲学思想、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科学

技术等几个方面再加以细分，等等，复习串讲时亦可以就以上细分的“线索”及大事、人物加以整理讲授。对于世界历史，除了按专题（如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和日、俄、德、意等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分条串线外，还可以按照一些重要的国家（如英、美、法、日、德、俄等）分别地理出其“国别史”，等等。

教师的复习讲授，除对历史知识按照章节（或“课”）、专题、国别进行串讲外，还必须注意提高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如英、法、美三国资产阶级革命何以走的不同道路、各具不同的特点；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如何解决各自国家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其不同特点又对三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正确地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战争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等等。中外历史上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对之，教师在复习讲授中都应该着力地给学生讲清楚，帮助他们确实理解、掌握。

学生的练习，在历史课复习中，亦很重要。因为教师讲授的历史知识只有通过不断地让学生练习，才能够真正为学生所掌握，包括理解、记忆这些历史知识和提高运用这些历史知识，回答各种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练习应该分两步做，首先，要与教师讲授的内容、进度相一致，教师讲授一段或一个单元的历史内容，即让学生做一次相应的练习，以便及时巩固其复习的知识；第二步则是在教师复习讲授完一本教科书或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如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等等）后，给学生做综合练习，帮助学生系统地记忆、掌握历史知识，并且提高其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教师对于学生的练习，必须认真地给以批阅，并从中总结出学生历史复习中的缺陷、不足以及学习方法（含解题思路与方法）上的问题（包括全班级普遍性的问题和个别生的问题），然后分别情况在下边的复习中，给予弥补和指导。

三、历史考试

历史考试，又称历史考查、历史测验，是历史课用以检查学习成绩和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它可以督促学生对历史课的学习，并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提供重要的客观评估依据。

教师对学生书面作业的检查 and 随堂提问，也应该算作历史考查的一种方式，但是，系统地、有计划地检查学生学习历史课的情况则常常要通过专门的书面历史考试，它可以分作随堂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统考（又称会考，由区、县乃至省、市统一出题）和高考（由全国统一命题，作为高等学校文科考生的重要科目之一）等几种类型和方法。

历史考试，应该紧紧地依据于《历史教学大纲》和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要求，既注意考查学生对于史实的记忆，又注意考查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两者应该并重，不可偏废，还应该注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是依据以上的要求，历史考试的试题类型很多，有填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列举、名词解释、识图、填充历史地图、历史资料解析和问答等试题。无论哪种试题，在命题时都应该从内容到文字，认真推敲，既

要全面地考查学生的成绩，又要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适当拉开学生成绩的差距；试题还应该严谨，不要模棱两可，让学生回答时无所适从。

一般说，试卷出后应该同时编写出试题的答案要点，以便阅卷时参考。

对于历史考试的结果，教师要及时地作出评定，并从中检查自己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必要时，历史考试的结果，得向学生公布，并就试卷和学生成绩进行分析，指明学生历史课学习中的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